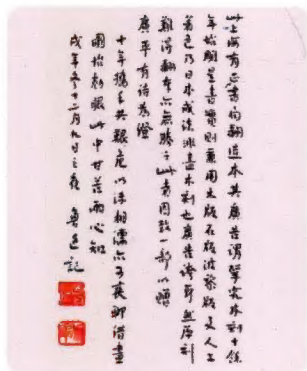


许广平传

陈漱渝◎著



许广平认为，学习鲁迅的精神，就是对鲁迅的最好纪念。

許廣平傳

陈漱渝◎著

以上所有近著均翻送本其原著均蒙家林和中
年松齡先生惠贈本版在版次前附文人之
著色乃日本或流本利也原著均無序刊
翻得翻本亦無勝于山書因註一初一
原平有請為檢
十年後生共難危以洋相漂亦多後即得書
開怡和紙山中廿五兩心知
戊午年二月九日之夜 書色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许广平传 / 陈漱渝著. —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1.11

(中华文化复兴方阵·陈漱渝作品系列)

ISBN 978-7-5115-0699-3

I. ①许… II. ①陈… III. ①许广平(1898~1968)
— 传记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25031号

书 名: 许广平传
作 者: 陈漱渝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银 河 陈志明
封面设计: 陈淑平 梁 宇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编辑热线: (010) 65369844
网 址: www.peopledaily.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兴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字 数: 210千字
印 张: 20
印 次: 2011年12月 第1版 2011年12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0699-3
定 价: 38.00元

中華文化復興方陣

陳漱渝

2011年11月16日

陈漱渝先生“中华文化复兴方阵”手迹

Dear Friend:

My right hand
has been hurt again, so the
wrist is unable to handle
Chinese brush properly -

I have a good suggestion
to make regarding this ~~factor~~
author's wish. 廖梦醒

Writes 中文 very well indeed,
besides she was a friend of
许广平's So it is more

fitting to ask Cynthia Lind
to write for him. Her address
is 厦門/國務院宿舍
7組 38号

I am sure she will feel
honored to do so for 許广平

On hoste
sol

08' 11. 142

目 录

第一章 旧礼教的叛逆者·····	001
第二章 五四运动的洗礼·····	013
第三章 女师大风潮中的“害马”·····	023
第四章 同行者·····	037
第五章 在大革命的风暴中·····	049
第六章 “十年携手共艰危”·····	063
第七章 围城中的斗争·····	079
第八章 中华民族的女战士·····	099
第九章 为和平民主而呼喊·····	113
第十章 在第二条战线上·····	127
第十一章 把一切献给党·····	143
第十二章 她活在鲁迅的事业中·····	161

附 录

许广平的家庭生活鳞爪·····	173
许广平活动简表·····	186
许广平著述编目·····	203

• 许广平 传

爱的思索：许广平的佚文《结婚的筵宴》	250
都是《魔崇》惹的祸	256
我读许广平《鲁迅回忆录》（手稿本）	285
初版后记	302
再版后记	307



第一章

旧礼教的叛逆者

云山巍峨，珠海奔涌。在繁花绿树丛中，屹立着一座饱阅沧桑的古城——广州。广州古城曾有“三山”：番山，禺山，坡山。番、禺二山位于今天的文德北路和北京路之间，在当时是市中心，故广州古称番禺。坡山，位于今天的向阳四路，即传说中“南海五仙”骑羊降落的地方。仙人们给广州人带来了一茎六穗的五谷良种，祝愿这块土地五谷丰登，永无饥馑。

然而，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仙人们的祝愿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那时候，白云山头罩乌云，珠海汹涌恶浪翻，广州人民在死亡线上受着煎熬。特别到了近代，帝国主义用炮舰敲开了南中国的大门，更给这块丰饶的土地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正如马克思愤怒揭露的那样：“……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荒唐的借口下发生的！”^①

广州人民是富于斗争传统的人民，他们决不能长期忍受中外黑暗势力的统治。那火焰般燃烧着的木棉、朱槿、凤凰木，

^① 马克思《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第一七七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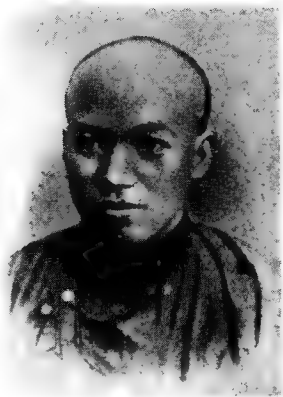


吸鸦片

正象征着广州人民炽烈的英雄性格。一八三八年六月，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了帝国主义倾销的鸦片，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坚强意志。一八三八年十二月，广州一万多愤怒的群众袭击了帝国主义的商馆，维护民族利益，强烈要求禁烟。一八四一年二月，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率部抗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几百名将士全部牺牲在虎门炮台。同年五月，广州西北郊三元里等一百零三乡的农民高擎“平英团”的战旗痛歼侵略者，“刀斧犁头在手皆成武器，儿童妇女喊声亦助兵威。”一八五一年一月，洪秀全领导“金田起义”，发动了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在此前后，洪秀全、冯云山、冯仁轩都曾以广州作为活动基地。一八九一年，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收徒讲学，鼓吹改良主义的维新变法，要求改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改良主义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但通过维新变法的宣传却大量传播



变法维新领导人康有为



变法维新领导人梁启超

了西方的思想和学说，使窒息待毙的中国人闻到了一些新鲜空气。一八九八年，光绪皇帝下诏变法，颁布维新政令，掀起了改良主义运动的高潮。但是，维新期间的任何一点微小改革都遭到了守旧顽固势力的拼死抵抗，“百日维新”就像一现的昙花，刹那间就凋谢了。这就促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在受到这一失败的强烈刺激之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一年，青年鲁迅抛弃了一般人认为是正路的读书应试，带着母亲筹集的八元川资离开故乡绍兴，进入了洋务派在南京创办的学堂，探寻救国济民的新路，也就在这一年的阴历正月二十二日，在广州高第街一所门前蹲着一对石狮子、门楣挂着红地金字“大夫第”横匾的宅院里^①，诞生了—一个性格像木棉花一样火红的女孩子，她就是许广平。

许广平不知道她的哪一位祖宗在哪朝哪代做过大夫，只

① 许广平诞生在今广州“许地”——这是一个聚族而居的大院落。其祖先在清乾隆年间由潮州迁往广州。祖父官至护理浙江巡抚，浙江布政使，死后诰授荣禄大夫。许广平幼名霞，因仰慕母亲才智，自号景宋。父亲给她取名广平，含祈望广东太平之意，又与唐玄宗时宰相宋广平之名相合。许广平有三位兄长，两个妹妹。



1933年摄于上海

听说她的叔祖许应骙做过两省的总督，是反对维新运动的著名顽固分子之一。鲁迅在南京求学时，他的一位本家长辈曾反对他看新书报，而强迫他读报上刊登的许应骙斥康有为奏折^①。后来鲁迅半开玩笑地对许广平说：“哼！我从小就吃过你们许家的亏。”^②许广平的祖父做过浙江巡抚，因此，

她的家可以算是“簪缨门第”、“仕宦之家”。不过，许广平出生时，她的家道已经渐趋没落。父亲许炳瑶，号朗甫，庶出，体弱，不善经营，在家庭中处于被歧视的地位。母亲姓宋，广东香山（现中山）县人，澳门商人的女儿，懂医道，擅诗词，常借债虚撑门面，苦苦维持封建旧习。

许广平生下来，曾遗尿于母腹，迷信说是剋生母，只有过继给别人才能祈免灾殃。于是许广平的母亲打算把她送给一个穷得食不果腹而仍旧抽大烟的本家，宁可每月贴送生活费用也在所不惜。这个计划后来不知为何并未实行。然而，她却从此失去了母亲的欢心。

八岁那年，许广平在生活道路上遇到了两件难忘的事情，一是缠足，二是入塾。

许广平母亲的老家是十分讲究缠足的。因此，她母亲虽然身材胖大，但却缠着一双小脚，走起路来摇摇晃晃，需要用双

^① 鲁迅《琐记》，见《朝花夕拾》。

^② 许广平《“五四前后”》，见《鲁迅回忆录》。

手支在两个丫头肩上。许广平的姐姐，人称“玉观音”，也裹着一双小脚，天天上书房都要由老妈子背。“玉观音”九岁病故，临死前口中还叨念着《孝经》、《四书》……缠足的厄运终于落到了许广平身上。母亲拿出尖头圆锥形的绣鞋，又拿出三尺来长、三寸来宽的白布条，在许广平足趾间涂一些药，而后就使劲地缠起来。母亲说：“两脚龙舟般大，会落得人家笑话。”许广平用瞪眼和放声大哭表示反抗。她的反抗得到了父亲的支持。父亲对母亲说：“你不见连日报上都登着各处设立戒缠足会的消息吗？人家放足，你却缠足！你忘了你缠足的苦处吗？她将来要嫁到乡下人家，缠了双足，岂不叫她活受罪？”就这样，父亲剪开了她的缠足布，把她抱到祖母那里躲起来。此后，母亲发誓不再见她。但不久，她得了一场重病，母亲才重新把她接回自己身边。

八岁这年的四月，许广平开始入家塾读书。在这个守旧的



晚期中国妇女的三寸金莲（1902）

封建家庭中，这是件异乎寻常的事情。因为这所家塾原是为家里的男孩子办的，女孩子跟男孩子同塾共读，据说会夺去男孩子的聪明。许广平的母亲在这件事上却表现得比较开明，因为她自幼生长在澳门的华侨家庭，男女界限并不十分严格。她自身说法道：“不要紧的。我在家里也跟兄弟们一起读书，并没有夺去他们的聪明。”她不仅允许许广平入塾，而且晚上还叫哥哥们帮她复习，每次酬金是一个铜板。

塾师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老秀才，旗人，曾经读过几天简易师范，所以能在大厅教学生练习“立正！开步——走！”但家塾的课程却是单调而陈腐的。每天清早写大小楷，然后背书、讲书，内容多是《四书》、《五经》之类。午后是温书，背书，再讲点二十四史或古文。每逢星期天，上午是做对子或学写信，下午再做一篇论说。如果时间早，先生也常带学生出去买点纸笔。他常常一手揪着男孩子的辫子，另一手揪着女孩子的辫子，大摇大摆在街上走。这时候，孩子们就会感到“皇恩大赦”似的愉快。

先生是尊孔的，对学生管束相当严。但许广平跟她的兄弟们往往不服管教。他们常趁先生未到之前先进书房，在门口安好“步哨”，而后开始在里面做各种各样的游戏：有时把猫、鸡、狗捉进屋里，大家一齐拍手高跳，直到吓得鸡飞狗走猫乱窜；有时将纸团挂在辫梢，沾油点着互相追逐，名曰“田单火牛”。每月初一、十五，先生照例率领学生叩拜孔子的牌位。许广平却故意做一个“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纸牌位放在抽屉里玩耍，气得先生大发雷霆：“你这是污辱圣人。孔子哪里会躲在你的小抽斗里？快快弄走！”

在家塾，许广平开始是跟男孩子一起用蓝青官话（即夹杂着方音的普通话）读书。父亲知道后对许广平的大哥说：“霞女（按：霞是许广平的小名）是一个女孩儿家，叫她读几句书，识几个字，能够在家记记账就足够了，读什么官话？你明天告诉老师，单用粤语教她读书就行了。”大哥果然把父亲的意思转告了先生。先生开始用粤语教许广平读书。对这种男女不平等的待遇，许广平机智巧妙地进行了抵制。先生用粤语教读时，许广平故意装出一副笨拙的样子，一天连八句课文都背不下来。而先生用官话教读时，许广平随即就能琅琅背诵，一字不差。原来先生用粤语教时，她早已烂熟于心了。先生对大哥说，“你看霞女学官话，一两次就会，可见官话是你们家风呢。”这样一来，父亲就只好收回成命。许广平后来回忆说：“这一胜利，给予我的前途影响非常之大，后来到了天津读书，虽然北方话同官话有些不同，大致上是比只懂广东话的同乡去到北方便利多了。听了一星期的教课，就能够贯通了，虽然蓝青官话时常被天津腔的小姐见笑，但是不要紧，我少讲话，多听书，没有很大的不方便。”^①

许广平大胆向旧礼教挑战的突出表现，是反抗包办婚姻。

她生下来刚三天，父亲外出赴宴，在酩酊大醉时，“碰杯为婚”，将她许配给一个姓马的劣绅家。这个劣绅参加了孔教会，常纵容家人在乡间拦路抢劫，敲诈勒索，民愤极大。父亲虽因醉后失言而反悔，但马家却送来了聘礼，为了“顾体面”、“讲信用”，也就只好收下了。刚刚懂事的时候，许广平从家中一

^① 景宋《我的小学时代》，载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海妇女》三卷十一期。

个叫旺姐的老妈子那里得知了这件事，就模糊地懂得了“所遇非人”的含义。以后每当别人跟她提起这件事，她就又急又难过，每当想到黯淡无光的前途，真恨不得死了落个痛快。十二三岁，她就向家人表示过反抗。马家来人，她就冲出去。马家给她包银，她连纸带银都扔到地上。面对父亲的严厉申斥，她公开表明自己的不满。后来读书渐多，她知道“死”不是解决问题的正当途径。只有自己有了独立工作和生活的能力，婚姻才可以不受家人摆布。因此她更加勤奋，一心想早日自立于社会。这种思想，成了她当时的生活动力。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许广平全家搬到澳门。这一年，母亲去世，父亲一度带着二哥前往北京，她由大哥许崇禧照顾。大哥曾在南京求学，热情鼓吹民族民主革命，经常向许广平介绍报纸上的新知识。在大哥帮助下，她知道了孙文、黄兴的革命事迹，知道了世界共和的趋势……自恨年幼不能投身革命。大局平定后，许广平全家仍迁回广州。在父亲所看的几份报纸中，她最感兴趣的是革命派在广东创办的《平民报》^①。通过《平民报》，又了解到某处出版有一种专门研究妇女问题的《妇女周刊》^②。许广平如饥似渴地搜求新书报，经常跟妹妹一同跑出十几里到城外购买《妇女周刊》和其它读物。《妇女周刊》宣传女人也可以像男人一样地做事、革命，还鼓吹妇女放足，不装饰，不搽粉，不戴耳环，婚姻自主……许广平读

① 《平日报》，广州民主革命派报刊之一，一九一〇年十月三十一日创刊，辛亥春停刊，八月改为《齐民报》。广东辛亥光复后又改名为《平民报》。总编辑为邓警亚。

② 疑为《岭南女学新报》，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创刊，主编冯活泉，内容分为德、智、体、新闻、杂著五类。

后大为叹服。她开始不穿绸衣，不带耳环，立志除旧布新。许广平家乡一带的习俗，亲丧三日之内才不戴耳环。父亲认为许广平不戴耳环是对他的诅咒，很不高兴。经宛转解释，才不再干涉。许广平幼年秉性豪爽粗犷，“又好读飞檐走壁，朱家郭解，扶弱锄强等故事，遂更幻想学得剑术，以除尽天下不平事”^①。一九一五年底，袁世凯窃国称帝，宣布改翌年为“洪宪元年”。许广平认为这是为国效命之时，便私自给一位女革命者庄君写信，希望能投入反袁斗争。这件事不慎泄密，遂为家所阻，后来常引为憾事。

一九一七年，许广平的父亲重病身亡。这时，马家在外大肆散布，说他们跟广州城内姓许的大户人家结了亲家，不久就要娶新媳妇过门了。许广平听后十分焦虑。这一年，二哥许崇



袁世凯

^① 许广平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六日致鲁迅信，见《两地书》。

欢从北京回家奔丧帮助她解除了婚约^①，办法大概是替马家娶一小妾作为替代。从此，她更坚定了北上读书以谋自立的决心。二哥怕她解除婚约后在广州找不到婆家，同意她北上，但不同意她念书，因为家道中落，无力承担她的学杂费。许广平于是投奔天津姑母家，得其资助，考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矢志苦读。第二年即以优异成绩获得公费。其时二哥将家藏古画出售，分给许广平二百元。这笔钱，就成了许广平在天津读书四年的费用。

① 据二〇〇三年《鲁迅研究月刊》第十一期刊登的《有关许广平抗婚的一组材料》，许广平彻底废除婚约应在一九二一年。其时马氏子马天星（香港大新公司影画部司理）以“已届壮年”为由来函逼婚，因许父一九一七年去世，许广平委托兄嫂出面废除了婚约。



第二章

五四运动的洗礼

直隶第一女子师范，是一九〇六年袁世凯总督直隶时创办的。辛亥革命前称“北洋女子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称“北洋女子师范学校”，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称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亦简称“天津女师”。^① 创办之初，学生寥寥无几，因为一般守旧的人们都不肯把女儿送来受“洋教育”。后来学校除供给学、膳、书籍、衣服费用之外，每月还津贴零花钱，这才拉伕似地拉到一批学生。其中多来自江浙一带，其中亦有四川、广东人。辛亥革命时期，该校进步学生曾积极支持地理教员白雅雨先生策划滦州起义，成为辛亥革命史上的佳话。但是学校的守旧势力仍十分顽固。学生平时不许外出；如需外出购买日用必需品，除请假登记外，还得乘坐放下车帘的马车，不许东张西望。直至五四运动的前夕，学校还发生了这样一场风波：体育老师维新，要求学生上体操课时改穿短裤，不穿裙子，许广平所在班的一位同学竟以退学相要挟。因为不被允许，这个学生就果然辍学了。

然而，时代的浪涛激扬飞溅，会冲刷到崖岸的每一粒砂石。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了中国，也在天津青年

^① 据河北省女子师范学院《师范中学部一览》。

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他们读到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加深了对旧社会的仇恨，开始寻求革命的方向。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爆发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的情况通过当天的晚报、号外和第二天的日报迅速传到了天津，天津立即沸腾起来。天津女师有血性的爱国青年人人心中燃起了一团火，争相传阅《北京全体学界通告》：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①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天津的学生迅速行动起来，誓保国土，誓挽国权，誓雪国耻，誓除国贼。五月六日，天津公、私立中等以上十校学生代表聚会，要求归还青岛，并请北京政府即刻开释拘留的爱国学生。五月七日，天津中等以上各校学生代表二十四人聚会，听取清

^①《北京特约通信》，见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天津《大公报》。

华学校代表介绍北京情况后，成立了天津学生临时联合会。五月十一日上午九时，直隶第一女子师范举行追悼郭钦光烈士大会，各女校女学生五百余人参加。五月十二日，天津绅、商、学、报各界在省会会场召开了直隶各界公民联合会。五月十四日，天津各校代表在北洋大学集会，商议抵制日货办法。同日下午五时，在直隶水产学校正式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五月二十三日起，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一万多人一律罢课，作为对北京学生五月十九日同盟罢课的响应。学生们纷纷组织讲演团、新剧团、义勇队，展开了形式多样的爱国活动。他们还派出代表到各地联系，号召各地和京津学生一致行动。五月二十五日，以天津女师的毕业生和在校生为主体又联合了中西、普育、竞存、贞淑等女校的学生以及一部分思想比较开通的职业妇女，在天津东门里仓敖街江苏会馆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①，会员中有六十多岁的老妇，也有十三四岁的天真热情的小学生。该会以“提倡国货并唤起女界之爱国心为宗旨”，会员恪守的规约是：“一、一切用品均需采用国货（惟书籍、教育用品及药品本国确无者不在此限）；二、应负劝导他人购用国货之责；三、应以文字或语言发表个人之意见，以唤起女界之爱国心。”^②该会下分总务、调查、讲演各股，负责发行杂志、书籍等事项。此外还组织了一个短期义务平民女学校，课程是识字（讲解注音字母）、谈话（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组织花边等，教员由女师同学义务担任，每天下午授课两小时，

①《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广告》，见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天津《益世报》。

②《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简章》，见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天津《大公报》。

为期两月，前来学习的家庭妇女很多。

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会长是刘清扬，邓颖超、郭隆真等任评议委员。该会后来跟原天津学生联合会合并，成立了新的学生联合会。这一行动，打破了“男女有别，授受不亲”的封建戒律，推动了北京男女学联会的建立，受到了李大钊的热情赞许。

许广平在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主要参加了三方面的活动：一是编辑会刊，二是讲演宣传，三是抵制日货。

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会刊名为《醒世周刊》。社址设在女师前院。“内容分社论、要闻、文艺、演说、余兴等门。关于妇女的问题，发表了许多意见”^①。至一九一九年底，该刊大约出版了二十六期（前二十余期为油印本，后几期为铅印本），行销到北京、上海、山东等地。许广平是该刊的编辑之一^②。此外，参加该刊编辑、采访、发行事务的还有蒋云、卢松泉、吴瑞容等。赵景深等校外人士曾义务售报，得到过该刊颁发的银牌奖^③。学生界、教育界、文化界都对这个刊物予以重视，妇女群众尤乐于订阅，在爱国运动和妇女运动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一九一九年六月，周恩来从日本回到天津，立即参加了学联的工作，并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在周恩来等领导下，《会报》跟女师的《醒世周刊》、南开的《南开日刊》、北洋大学的

①《天津学生最近三大活动》，见一九二〇年一月《少年世界》一卷一期。

②刘清扬在《觉醒了的天津人民》中说：“《醒世周刊》由当时女师同学许广平同志主编。”魏杰如在《回忆五四时期的演讲队》中说，女界爱国同志会当时推许广平、卢瑜瑜、蒋云、徐兰等负责主编《醒世周刊》。

③赵景深同志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九日致笔者函。

《北洋大学日刊》、直隶第一师范的《师范日刊》等学生刊物共同组成了天津学生报社联合会，互相交换新闻，分头设立阅报牌，对鼓舞天津青年学生和各界群众坚持爱国运动起了很大作用^①。

在五四运动中，许广平还多次参加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组织的讲演宣传活动。在初期，因受封建旧习束缚，女性不敢像男生那样在街巷抛头露面，只是定期在市内各宣传所、民教馆以及公共集会场合讲演，后来随着当局压迫的加剧，她们不顾一切地勇敢走上街头。她们在哪里讲演，哪里就筑起了一道人墙。那激昂慷慨的讲词，如同粒粒革命火种，播在了爱国民众的心田。有的会员不善于词令，就帮着找地方、扛板凳、维持秩序、呐喊助威。她们还不辞劳苦，深入偏僻的贫民区和四郊农村，敲开一家一户的大门，进行家庭讲演。大家说：“这算什么苦，比当亡国奴的苦要强得多呢。”许广平清楚地记得，讲演队队长邓颖超演说时，热情奔放，说理清晰，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许广平还清楚地记得，副队长郭隆真也掌握了十分高超的讲演艺术。她见到人家煮饭就从煮饭说起，见到人家做针线就从做针线活说起，而后巧妙地引入救亡图存、妇女解放等话题，听者无不动容^②。

“抵制日货，提倡国货”，是五四爱国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许广平也积极投入了这一斗争。那时天津各界人民团结一致，不买仇货。海关的搬运工人拒绝给日本商船卸货；各商号在学

① 《学生报社开会纪》，见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天津《大公报》。

② 当时讲演的宗旨是“使一般民众成为真正的国民”，具体内容有“国家与国民的关系”。“什么叫做国民”、“国耻”、“亡国之痛苦”、“平民主义”、“共和国民之权利义务”、“法律是什么”等项。

生影响下把日货一律封存。在南开广场，河北公园等地，多次举行了焚烧日货的公民大会，会场烈焰飞腾，烟冲霄汉，人心为之大振。许广平也跟同学们一起，收集装雪花膏的空瓶，制成“万年糊”，沿街廉价兜售，用石膏模子铸成空心的蜡囡囡、洋狗、狮子等小玩具，用绸子制成小手绢，代替充斥市场的洋货，并以收入作为天津学生联合会的费用。后来天津当局秉承北洋军阀政府的旨意，诬蔑爱国群众“徒尚意气，激生事端，招友邦之责言，貽国家以钜患”^①，严加取缔集会结社。十月十日下午，天津各界联合会在南开学校举行共和纪念会，与会群众达万余人。在邓颖超同志领导下，许广平和女界爱国同志会的会员手持用花竹竿糊的旗子，上书“提倡国货，抵制日货”、“一致对外，至死不屈”等标语，站在队伍最外层。下午二时许，与会全体结队出发游行。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派保安总队的武装警察强行阻拦。女学生队伍向外突围。她们往东冲，警察往东围；她们向西冲，警察向西拦，接着竟用枪托大打出手。女学生忍无可忍，使用旗竿作武器，奋起反击，在学联汽车宣传队的配合下，终于冲破了警察和马队的重围，经东马路，直奔东浮桥，把警察厅团团围住，声讨反动当局镇压手无寸铁的爱国民众的罪行，坚持到深夜才分批解散。

天津女师的学生运动不但受到反动当局的压迫，而且也受到反动校方的压迫。一九二〇年五月七日，许广平跟同学们一起，不顾校方阻拦，冲出校门，参加五七国耻纪念大会，并分为三队进行扩大的宣传讲演：一队在街头，一队在宣讲所，一队到各个角落的居民家庭里，对市民影响很大。返校后，校方

^①《天津警察厅布告》，见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天津《大公报》。

竟将全校二百多同学全数开除学籍，宣布“通学生（按：指走读生）及有亲长在津之寄宿生听其即日出校”，“津外之生则非家长来接不令出校”^①。同学们团结一致，全体搬出学校，以示抗议。经过十六天的斗争，在家长和社会进步舆论支持下，赢得了胜利，迫使校方收回了开除牌示。

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进一步激发了许广平的爱国热情，加深了她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狰狞面目的认识，使她在中国天空曙光初露的时候就跟先进的战士一起置身于斗争的洪流，在生命史上谱写了鲜红的第一页。她后来在谈到这一运动的意义时说：“五四运动是继辛亥革命之后的未完工作，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种种不法政治的清算运动；是青年学生首先起来反抗政府违反民意签订屈辱条件的救国运动，是全国商人、工人一致起来解决国事的运动，是徒手民众不避殴打，不畏拘捕的正义运动；是和平、民主得到胜利结果的运动，是全国人民值得纪念的一个运动。”^②

一九二一年，许广平以优异成绩在天津女师毕业，且已担任了教职。为了继续深造，她来到北京，投考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①《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致学生家长书》，见一九二〇年五月十日天津《大公报》。

② 景宋《造成五四的历史经过》，见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民主周刊》。



第三章

女师大风潮中的“害马”

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前身是创立于一九〇八年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一九一二年改称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一九一九年改组为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一九二四年五月一日改称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许广平曾在《十六周年纪念会颂辞》中写道：“惟我学校，设于京师。济济多士，四方来兹。历年十六，培植师资。发聋振聩，女学先师。提高程度，师大设施。中学附属，小学兼治。毕业设教，南北奔驰。海人恳恳，服务孳孳……”^①。

许广平当时之所以投考女高师，一方面是受求知欲的驱使，在初师毕业之后继续谋求深造，另一方面是受经济条件的限制，无法进入虽更近于理想但费用甚巨的学校。许广平回忆初入该校的情况时说：“那时是民国十一年，在天津，初师毕业就投考到北平女高师去了。因为向例师范学校有饭食，有住宿，而且又免收学费，讲义是油印，学校发的，书籍费也不必筹，只要每月有三两块钱够买纸笔，另外偶然添件蓝布大褂，也不过块把钱的经费，还不算难筹……而锦上添花的就是我们的校长

^① 许广平《十六周年纪念会颂辞》，见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三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十六周年纪念刊》。

许寿裳先生。他不但延聘了许多东西洋留学的人来校教书，还多方面邀请在北大任教的学者，使校内文理各系同学都有适当的满足于求知欲之感。”^① 鲁迅就是于一九二一年七月应许寿裳先生之聘来女高师兼课的。

然而，一九二三年八月，女高师发生了一场反对许寿裳的风波。反对者强加于许寿裳这位忠厚长者以“溺职务，害教育”的罪名^②，而其真实原因，乃是因为许先生为人清介，有些毕业生耽心在他治下得不到介绍好工作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并无瑕疵的许先生就宣布引退了。继任者杨荫榆曾任女高师附中的学监和女高师的英语系级任，是一个推行封建奴化教育的代表人物。她上靠北洋军阀政府撑腰，下靠一批主张女人治女校的“唯女权论”者捧场，于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日谋取了女高师校长的职位。同年八月一日，又被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函

聘为女师大校长。



杨荫榆像

杨荫榆上任后，立即网罗羽翼，排斥异己，强行拼凑御用的评议会组织，作为学校的最高立法机构，以施行她的独裁统治。在她看来，“学校犹家庭”。她是“婆婆”，学生只不过是她这位“苦节的婆婆”治下的“童养媳”。为了配合当时社会上的尊孔复古逆流，她四处网

① 景宋《我所敬爱的许寿裳先生》，见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人世闻》二卷四期。

② 《女高师学生自治会全体启事》，见一九二三年八月四日《晨报》。

罗八股腐儒和鸳鸯蝴蝶派的文人，极力主张兜售孔孟之道。对于学生参加爱国运动，她更横加阻拦，甚至连孙中山先生的追悼活动都不准参加。对于杨荫榆的这种治校方针，鲁迅曾愤怒地斥之为“寡妇主义”，并指出这种教育给青年女子造成的灾难，远甚于往日道学先生盘踞教育领域时的状况。每当迈进这所学校的大门，鲁迅就觉得阴惨惨如临地狱。

一九二四年秋，江浙战争爆发。女师大国文系预科二年级三名学生暑假回乡探亲，因东南一带交通被阻，秋季开学时未能如期返校。杨荫榆为了大逞专制魔王的威风，竟无视客观情况，违背学校章程，强行勒令这三位同学退学，从而激起全校公愤。酝酿已久的女师大风潮从此爆发，不可遏止。学生把这场驱逐杨荫榆的运动称之为“驱羊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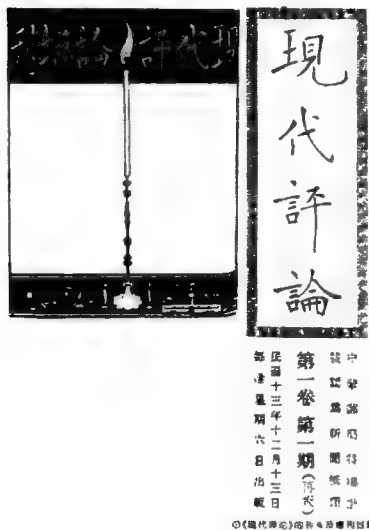
在“驱羊运动”中，许广平的态度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刚开始，她认为校内情况复杂，唯恐不明真相，被人利用，因此一度从旁观察，没有直接参与。不久，由于目睹了杨荫榆及其党羽的卑劣行径，许广平禁不住燃烧起愤怒的火焰，打算单独进行她“个人的驱羊运动”。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许广平跟广东同学林卓凤商议后，以“一个小学生”的身份跟教诲过她两年的老师鲁迅进行了第一次通讯。她向鲁迅陈述了“许多怀疑而愤懑不平的久蓄于中的话”，请求鲁迅给她以“真切的明白的指引”。鲁迅当天就热情地给许广平写了回信，希望她用“壕堑战”的方式，跟旧社会进行战斗。从此，许广平不断用拜谒和通讯的方式向鲁迅求教，也不断从鲁迅那里得到教益和鼓舞。鲁迅成了许广平的导师和领路人。在鲁迅的引导下，许广平完全改变了旁观和个人

反抗这两种态度。在女师大部分学生被杨荫榆软化而使运动一度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她挺身而出，以女师大学生会总干事的身份积极投入了这一群众运动，并成为斗争骨干。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八日，许广平用“持平”的笔名在《妇女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北京女界一部分问题”——这是她在女师大运动中射出的第一枪。文章尖锐批判了“女子而长女校、人地两宜”的资产阶级女权论，指出女师大的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是社会中的妇女问题”。许广平认为：“压迫之求解放”，“无须乎奔走于‘权贵要津’之门”，更不能泪流满面地“摇尾乞怜”，而只能“再接再厉”，“努力前进”，用“铁血”换来幸福。

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日，《现代评论》一卷十五期假借“一个女读者”的名义发表了一封题为“女师大的学潮”的来信，替杨荫榆辩护，诬蔑风潮的发生是“校内校外尚别有人在那里主使”所致。许广平忍无可忍，便以“正言”为笔名，在三



月二十四日的《京报副刊》第九十八号发表了《评现代评论“女师大的学潮”》一文，进行反击，勇敢地批驳了《现代评论》支持杨荫榆的种种荒谬论点和“莫须有的含有挑拨性”的言辞。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杨荫榆借召开女师大国耻纪念日讲演会为名，继续以女师大校长身份公开活动，并呼叫警



刘和珍

察恫吓反对她的学生。许广平抱定为大众而牺牲个人的决心，不畏强暴，跟战友们一起将杨荫榆驱逐出会场。当晚，杨荫榆令其死党威迫许广平和刘和珍代表大家认错，否则开除。许广平等断然拒绝，表示宁死不屈，头可断，无错可认。五月九日，杨荫榆贴出开除女师大六名学生干部的牌示，妄图对女师大学生进一步施加压力。布告全文是：

本校为全国策源之地，学风纯谨，最属要端。近数月来，查有学生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刘和珍、许广平、姜伯谛不守本分，违背校规，甚至鼓动风潮，妨碍公众学业。曾经累次宽容，予以自新之路，詎意前日礼堂开会来宾讲演之时，复敢群集守门，拦阻校长到会，并在会场哗噪，扰乱秩序，侮辱师长。如此怙恶不悛，目无规纪，不独自玷性行，实乃败坏学风。

兹提交评议会公同议决，将该生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刘和珍、许广平、姜伯谛等开除学籍，即令出校，以免害群。为此布告，仰该生等知照毋违，切切此布。

因为杨荫榆在开除布告中诬蔑许广平等是“害群之马”，所以鲁迅此后就给许广平起了一个“害马”的绰号。每当许广平来访，鲁迅就会幽默地说：“害马来了。”

杨荫榆的倒行逆施，使女师大“马上全体骚动起来，像平静的蜂房突然遭到重重的打击，到处听到不平的悲鸣，许多比较沉静的同学都被这非法的手段所激恼了。”^①同学们把开除布告取下来丢在教室讲台里的地板内，使杨荫榆四处搜索无着。当天，学生自治会还召开紧急会议，颁发致评议会诸先生公开信，宣布开除许广平等人的牌示“自归无效”。公开信全文是：

评议会诸先生钧鉴：

生等为尊重教育计，为本校前途计，为自身学业计，始终否认杨荫榆先生为校长，天下共闻。誓坚持到底，不惜牺牲一切，必达驱逐杨氏离校之目的而后止。谅诸先生久已闻悉。杨氏不学无术，对于校务，毫无成绩，众人皆知。在稍有爱护教育、爱护青年之心者，决不忍拥护杨氏一人之私位，而摧残教育于不顾耳。兹不料大学教授中之少数先生，竟出于人意料之外，乃凭感情，不审是非，屡有上歌功颂德之呈文于教部，以拥护杨氏为工具而不惜摧残青年、荒误青年，此种情为，实为任人闻之，莫不为教育界痛哭流涕者也。慨夫吾辈多数学生，

^① 许广平《鲁迅先生与女师大事件》。见《欣慰的纪念》。

不辞艰苦，负笈数千里外，缘为求学而来，岂愿荒废宝贵之光阴，而干预他事？无奈杨氏长校一年以来，校务沉沦，任情专横，生等终于绝望，屡婉劝其空位让贤，而其意为利禄所蒙，置若罔闻，希图在校，日延一日，以肆其摧残青年之愿，故于五七国耻纪念日讲演会中，强以校长名义，悍然登台为主席，事前不听自治会各部职员之婉劝，致有当场激动学生公愤，稍起冲突之事。尤可痛者，杨氏忍心置吾辈青年死于刀枪之下，厉声呼曰“叫警察来”，同时总务长吴沆，捋袖擦掌，势欲饱生等以老拳，幸经史郁诸先生之排解，生等始免流血。后见杨氏退席，众遂鼓掌欢迎来宾演讲。此当时经过之实情，亦生等本始终一致之态度，正大光明否认杨氏以校长名义自居之表示也。此次冲突，实非生等不尊重杨氏个人而无理取闹，乃杨氏既不爱人而复不知自爱有以取之也。今有少数先生未本爱护教育之精神，主持公道，竟听杨氏一人之主使，不审事实，复无会章可据（查评议会会章并无开除学生之权限），竟于西安饭店饷杨氏私宴。酒饭昏醉之余，妄开除自治会职员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刘和珍、许广平、姜伯谛六人。生等惊悉牌示之余，莫不公愤，一致起为后援，誓不惜牺牲一切，决死力与恶魔奋斗。此次开除学生之牌示自归无效，特此奉闻，敬祈亮察。专此顺颂

公绥

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学生自治会谨启

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①

^① 原载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一日《京报》。

五月十一日，女师大学生在操场召开了全体紧急大会，决议驱逐杨荫榆出校。同学们说：“校长早被学生会反对辞职出走的了，没有再开除学生的权力！全体学生是拥护我们的代表的，许广平是我们的总干事，要她亲手拿封条去封锁校长办公室！”^①许广平遵照同学的公意，封锁了杨荫榆的办公室、寝室、秘书办公室。学生会还派人轮流封锁校门，严禁杨荫榆入校，并在校门口张贴了一张布告：

杨荫榆先生注意！同人等早已否认先生为校长，请以人格为重，幸勿擅入校门。

学生自治会启五月十一日。

杨荫榆被逐出校后，并不善罢甘休。她一方面将开除学生的决定呈报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吁请支持；另一方面继续盗用女师大的名义连续发表《诤诫学生函》、《对于本校暴烈学生之感言》，诬蔑学生，开脱自己。她还发表《致学生家长函》，要求许广平等被开除学生的家长或保证人将他们领出学校。鲁迅以为“这些手段太毒了。教员之类该有一番宣言，说明事件的真相，几个人也可以的。”^②于是他亲自拟稿，邀集了其它六名教员联名，在同年五月二十七日的《京报》上发表了《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为许广平等无辜学生公开辩诬：

① 许广平《鲁迅先生与女师大事件》，见《欣慰的纪念》。

② 鲁迅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致许广平信，见《两地书》。

溯本校不安之状，盖已半载有余，时有隐显，以至现在，其间亦未见学校当局有所反省，竭诚处理，使之消弭。迨五月七日校内讲演时，学生劝校长杨荫榆先生退席后，杨先生乃于饭馆召集教员若干燕饮，继即以评议会名义，将学生自治会职员六人（文预科四人，理预科一人，国文系一人），揭示开除。由是全校哗然，有坚拒杨先生长校之事变。而杨先生亦遂遍送《感言》。又驰书学生家属，其文甚繁。第观其已经公表者，则大概谆谆以“品学”二字立言，使不谙此事始末者见之，一若此次风潮，为校整饬风纪之所致。然品性、学业，皆有可征，六人学业，俱非不良。至于品性一端，平素尤绝无惩戒记过之迹，以此与开除并论，而又若离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况六人俱为自治会职员，倘非长才，众人何由公举？不满于校长者倘非公意，则开除之后，全校何至哗然？所罚果当其罪，则本系之两主任（按：当时女师大国文系主任为马裕藻，由黎锦熙代理，故称“两主任”）何至事前并未与闻，继遂相率引退？可知公论尚在人心，曲直早经显现。偏私谬戾之举，究非空言曲说所能掩饰也。同人忝为教员，因知大概，义难默尔，敢布区区，惟关心教育者察焉。

《宣言》的发表，使女师大进步学生深受鼓舞。许广平当晚写信给鲁迅说：“今日（廿七）见报上发表的宣言，知道已有‘站出来说话的人’了，而且是七个之多。在力竭声嘶时，可以算是添了军火，加增气力。”^①

一九二五年五月，五卅惨案爆发，全国掀起了反帝反封建

^① 许广平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七日致鲁迅，见《两地书》。

的革命运动的高潮。女师大风潮成为了全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同时又鼓舞和声援了女师大的广大进步师生。六月二十四日，“女师大师生沪案后援会”成立。《后援会简章》由许广平等四名师生共同起草，议决自由认捐，慰劳五卅惨案的遇难者和烈士家属；组织讲演队分赴京内外宣传鼓动；组织红十字会，聘请医生来校讲授护理知识。杨荫榆为了破坏女师大学生的爱国运动，于八月一日带领保安警察打入女师大，妄图解散学生自治会和在“驱羊运动”中立场最为坚定的四个班级。杨荫榆还令军警截断电路，关闭伙房，并用铁链封锁校门，杜绝往来。许广平带领同学奋起自卫，毁锁开门，使亲友执手互庆重见。当晚，鲁迅和其它几位有声望的教职员来校值夜，保护学生，堵塞“正人君子”散播的女师大“男女学生混杂”的流言。八月五日下午，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召开全体大会，刘和珍任主席，许广平报告了“八一惨案”的经过，言时声泪俱下，群情为之激昂。当场议决敦请本校教职员及社会关心教育人士，与同学共同组织校务维持会，进行各项校务。^①

八月十三日，女师大校务维持会正式成立，作为全校的最高领导机构。校务维持会实行委员制。教员中公推了鲁迅等九人为委员；学生委员十二人，由许广平等学生自治会职员轮流担任。为了杀一儆百，镇压来势迅猛的革命群众运动，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于八月十七日决定将女师大改组为国立北京女子大学，由教育总长章士钊亲任女大筹备处处长。八月二十二日，北洋政府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秉承章士钊的旨意，率

^①《女师大学生请撤章杨》，见一九二五年八月六日《京报》。

领百余名军警、三河县的老妈子，武装占领女师大。许广平亲眼看到同学们像货物一样被拖走，像罪犯一样被毒打，悲愤交加。她立即离开女师大，跑到学生联合会告急，并向各界呼吁。当局在被囚禁的女师大学生中查点人数，发现许广平失踪。这一消息在报上披露后，鲁迅异常焦急。他极力托人向各方打听许广平的下落，担心她惨遭不测。接着，刘百昭又打算将许广平等六名学生领袖武装押解回原籍。在危急时刻，鲁迅冒着风险，掩护了几名无处投奔的女师大学生骨干。当时，许广平就是藏在鲁迅西三条胡同故居的南屋，躲过了最紧急的几天。事后听说，曾有几个警察到这里进行搜查，都被鲁迅义正词严地顶回去了。八月二十六日，许广平等二十三名女师大学生联名呈诉状于京师地方检察厅，控告章士钊、刘百昭等摧残女师大的暴行。同日，鲁迅等四十一名北大教员发表《反对章士钊的宣言》，进行强有力的声援。

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依靠武力强占了女师大校址，却不能摧折女师大进步师生的高昂斗志。在女师大校务维持会的领导下，经过近一月的筹备，女师大在北京西城宫门口里南小街宗帽胡同十四号租赁了一所临时校舍，坚持复课，跟北洋政府一手炮制的“女子大学”壁垒分明地展开了斗争。鲁迅等三十多名教师到此义务授课，给学生以全力支持。许寿裳先生不辞劳瘁，身兼了校长、教务长、教员三职。九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时，女师大在新址举行开学典礼，到会师生及各团体代表、学生家长共二百余人。鲁迅和许寿裳先生讲了话，学生自治会代表郑德音报告了女师大学潮经过。鲁迅先生用浓重的绍兴口音说，我相信被压迫的决不会灭亡，但看今天有许多同学和来宾，可

知压力是压不倒人的。礼毕，全体来宾和师生摄影留念。迁于宗帽胡同的女师大，不但设备条件差，而且随时有被解散的危险。尽管如此，学校还是招收了三十多名新生，加上旧生四十余人，共分五个班。学校没有经费，大家就募捐和自筹。在这里，师生结合，成立校委会。同学们既是学生，又是领导成员，也是勤杂人员。所有日常事务工作，如文书印刷、会计庶务、保管购买、接待联络等，全由同学们分担。食堂伙食也由大家轮流帮忙，校风既民主又集中。同学们体会到：几个月风雨历程，胜过几年寒窗苦读。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底，北京工人、学生、各界人民揭起“首都革命”大旗，多次集会游行，要求打倒军阀政府，惩办卖国贼，召集国民会议，取消帝国主义攫取中国海关主权的关税协定制度，实现关税自主。段祺瑞卵翼下的政客，在政潮激荡和人民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纷纷化装逃匿。十一月三十日，女师大学生在鲁迅、许寿裳护送下，整队由宗帽胡同步行回石驸马大街原址，胜利复校。第二天，许广平等二十四名女师大学生运动中的骨干合影留念。鲁迅为这张照片顶端的题辞拟稿，题为“偕行”，全文如下：

民国十四年八月一日，杨荫榆毁校，继而章士钊非法解散。刘百昭率匪徒袭击。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蒙从来未有之难。同人等敌忾同仇，外御其侮。诗云：“修我甲兵，与子偕行。”此之谓也。既复校，因摄影，以资纪念。十二月一日。



第四章

同行者

女师大学生运动的峥嵘岁月，在许广平的生活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这场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不仅使她又一次经受了革命风暴的洗礼，而且使她跟鲁迅在甘苦与共的过程中产生了纯真的爱情。这种爱情，是双方性格投契、意志融合的产物，它在感情沃土上播种，在革命理想中孕育，在并肩战斗中绽苞吐红。它像岩石一样坚不可摧，像号角一样鼓舞人向新的征途进击。

在旧中国，苦痛总是与人生相联系的。而许广平在爱情生活上曾经遭受的创伤，又远比一般人更为惨重。一生下来，包办婚姻的黑影就像魔掌一样时刻笼罩在她的周围，解除包办婚姻不久，初恋的悲剧又不幸降临到她的身上……

那是在刚入女高师的第一年，一位热情、任侠、豪爽、廉洁、聪明、好学的青年曾经敲开过她那纯净的心扉。这位青年叫李小辉，广东人，是她的表亲，因打算赴法勤工俭学来到北京，误了考期，改在北京大学读书，两人过从甚密。许广平当时在北京还有一位女友，叫常瑞麟，原是天津女师的学生，后考入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家住北京西城李阁老胡同四号。每逢

节假日，她总要到常瑞麟家去聚谈^①。一九二三年冬，常瑞麟的三妹毓麟和四妹应麟得了传染病，许广平自告奋勇像亲姐姐一般照料她们。这年除夕之夜，许广平参加女高师师生同乐会，正在兴高采烈地听故事、猜谜语、放烟火时，突然感到喉咙阵阵作痛。因为没有丰足的医药费，第二天她只好跑到常瑞麟学校的校医室去就诊，被诊断为扁桃腺炎。学校没有空余的病房，她就又来到了常瑞麟家休养。李小辉得悉她的病情，十分焦虑。年初五这天，李小辉连续三次前来探视，第三次还带来了一些西藏青果，说是可以医治喉症。他给许广平留下一半，自己留用一半，因为他也觉得有些喉痛了。

许广平的病一天天沉重起来，病后的第六天，竟由昏迷而进入弥留状态。常瑞麟的父亲出于好意，请了一位朋友义务诊治，让她服中药，然而病情更严重了。一星期后，请到同仁医院的一位日本医生出诊，才判明她得的根本不是扁桃腺炎，而是猩红热。经过开刀，从红肿的颈部挤出一盘脓液，这才复苏过来。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三日，旧历正月十九日，许广平身体略有好转，立即打听李小辉的情况，得到的答复却似晴天霹雳：原来李小辉因探视许广平也传染了猩红热，于一月七日结束了他年青的生命。

昊天难测，蕙荃早摧。李小辉的天亡，给许广平带来了巨大的打击。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过：“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座埋葬爱人的坟墓。他们在其中成年累月的睡着，什么也不来惊醒他们。可是早晚有一天，——我们知道的，——墓穴会重新打开。死者会从坟墓里出来，用他的嘴唇向爱人微笑；他们

^① 常瑞麟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日致笔者函。

原来潜伏在爱人胸中，像儿童睡在母腹里一样。”^① 李小辉在许广平心中，就留下了这种生命狂流冲刷不掉的影象。十八年之后，许广平怀着深沉的感情，写过一篇题为“新年”的散文，追忆起这段悲怆的往事，她说：“到了第十八周年纪念的今天，也许辉的家里都早已忘了他罢，然而每到此时此际，霞的怆痛，就像那患骨节酸痛者的遇到节气一样，自然会敏感到记忆到的，因为它曾经摧毁了一个处女纯净的心，永远没有苏转。”^②

生活的真谛告诉我们，人的初恋固然难忘，但第一次进入情感天地的异性其实并不一定就是最为理想的伴侣。在初恋中一度破灭的爱情，也不像那狂风吹落的花朵，永远不能在心灵的枝头重新绽放。许广平后来跟鲁迅的结合，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用通常的眼光看来，许广平跟鲁迅的结合有着许多不合谐的地方：论年龄，双方差异有十八岁之多；论外貌，鲁迅并无特殊的魅力；论金钱，鲁迅当时因家庭负担沉重以及购买西三条二十一号寓所而债台高筑；论地位，鲁迅当时固然在文坛和进步青年中享有盛誉，但他却因支持女师大学生运动而被免去了教育部佥事的职务，面临着被北洋军阀政府迫害的危险。最大的障碍，是一九〇六年夏天鲁迅曾由家庭包办跟山阴朱安女士成婚。由于有这样一位形式上的“周太太”存在，许广平跟鲁迅的结合就不仅需要抗拒守旧者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而且还要鼓足跟旧家庭决绝的勇气。如果没有超凡脱俗的眼光、坚忍倔强的精神，豁达无畏的性格，一个二十七岁的

① 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朵夫》第一卷。

② 景宋《新年》，见一九四〇年一月十日《上海妇女》四卷二期。

女性是很难承受即将面临的这一切的。

许广平说过，爱情的滋生，是漠漠混混、不知不觉的^①，她与鲁迅之间也是“不晓得怎么一来彼此爱上了”^②。其实，他们之间感情的产生和发展是有脉络可寻的。他们之间的爱情异于寻常爱情之处，就是并非单纯出于异性之间的互相倾慕，而是始于鲁迅身上所闪耀出来的真理之光的吸引。

鲁迅刚到女高师兼课，就给许广平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许广平后来回忆说，鲁迅当时虽然讲的是《中国小说史略》，但却说出了事物的普遍真理。鲁迅讲课的语言，就像他所写的文章一样，雄辩地驳斥了异端邪说，摈弃了弥漫世间的乌烟瘴气。当各种庸俗、荒诞的小说麻醉青年灵魂的时候，鲁迅的课程尤其具有清醒头脑的作用，听后有如初春的和风，从冰冷的世间吹拂着人们，阴森森中感到一丝丝暖气。许广平感到，鲁迅具有一种潜在的吸引力。他的光和热力，就像太阳的吸引万物，万物的欢迎太阳一样^③。在许广平心目中，鲁迅是可敬的，同时又是可亲的，所以她“曾经在课堂上一边听讲，一边把一个长发直竖、满身补丁、谈笑风生的鲁迅速写下来”^④。

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起，许广平跟鲁迅之间开始通信，至同年七月底，双方往返书信有四十余封^⑤。这些书信，“其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⑥，有的

① 维心《爱情定则的讨论》，见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五日《晨报副刊》。

② 景宋《从女性的立场说“新女性”》，见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二日《鲁迅风》第十期。

③ 参阅许广平《欣慰的纪念》、《鲁迅回忆录》。

④ 单也《两个许广平》，见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二日《文汇报》。

⑤ 《两地书》中仅收三十五封。

⑥ 鲁迅《两地书·序言》。

是对于人生广泛而严肃的探索。我们翻开《两地书》的第一集就可以看到，他们之间是如何热烈地讨论国内政治形势，认真地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深刻地思索改革社会的道路和方法，艰苦地寻求思想上的指南针。这就是他们之间爱情的萌发，也是他们爱情的牢固基石。许广平后来在《为了爱》一诗中写道：“……一切的经过，看《两地书》就成，那里没有灿烂的花，没有热恋的情，我们的心换着心，为人类工作，携手偕行。……”^①

“工作的相需相助，压迫的共同感受，时常会增加人们两心共鸣的急速发展”^②。在女师大学潮的日日夜夜里，许广平不仅在鲁迅的指引下置身于学生运动的最前列，而且还在鲁迅的激励下，勇猛地投入了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这种并肩战斗的生活，成为了他们感情溶合的催化剂。

对于鲁迅的创作和研究工作，许广平是一直热忱予以帮助的。比如鲁迅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致韦素园信中提到：“……景宋在京时，确实常来我寓，并替我校对，抄写过不少稿子，（《坟》的一部分，即她抄的）……”鲁迅在《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中也曾写道：“七月五日，晴，晨，景宋将《小说旧闻钞》的一部分清理送来。自己再看了一遍，到下午才毕，寄给小峰付印。”

一九二五年四月，鲁迅创办了《莽原》周刊，希望利用这个舆论阵地多登批评文字，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鲁迅在《华盖集·题记》中说：“我早就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

^① 景松《为了爱》，见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中流》一卷十一期。

^② 许广平《因校对〈三十年集〉而引起的话旧》，见《关于鲁迅的生活》。

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但是，当时写诗和小说的人多，杂文、政论方面的稿件非常缺乏，在这种情况下，许广平经常从当时的政治斗争中撷取题材，源源不断地给《莽原》撰稿，给鲁迅以全力支持。如《怀疑》、《内幕之一部》、《酒瘾》、《一生一死》、《瞎扯》、《过时的话》、《反抗下去》等杂文，就都是在《莽原》周刊上发表的。

一九二五年五月，陈源在《现代评论》一卷二十五期发表《闲话》，诬蔑鲁迅等七人《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偏袒一方”，“不大公允”，是“暗中挑剔风潮”，并挑唆北洋军阀政府对师大学生“加以相当的惩罚”。当晚，鲁迅写出了杂文《并非闲话》，揭露陈源的鬼蜮手段，并将他跟陈源进行第一次直接交锋的情况写信告诉了许广平。五月三十一日，许广平利用星期天的时间，写出了《六个学生该死》一文，指出杨荫榆对学生的迫害是因袭了封建专制者的故伎，揭露陈源对鲁迅等人的攻击是为了箝制进步舆论以便使杨荫榆遂其奸计。六月三日，这篇文章用“伤时”的笔名发表于《京报副刊》，有力地配合了鲁迅对现代评论派的斗争。五卅惨案发生之后，社会上特别是知识界中的一些人，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认识不清，他们或者单纯地站在辩诬的地位，幻想向世界搜求公道；或者主张对侵略者采取宽容态度，害怕发生武装冲突。针对这种倾向，鲁迅写出了《忽然想到》等杂文，号召中国人民“抽刃而起”，跟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要求‘以血偿血’”。许广平也写出了一些杂文，跟鲁迅配合。她在《罗素的话》一文中写道：“……我们还想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吗？还有些儿

未凉的血吗？则誓雪‘不敢以兵力反抗外国’之耻，起来作正义、人道、国权之战争，直至四万万人全没有一些儿气息然后止。我们为什么要‘固步自封’，在刀缝下偷活而仍然望‘和平’，不希望有战争呢？这种‘宽容’态度，是否可以对付狼子野心猛兽吃人的强悍的帝国主义者？……你虽则想‘互相让步’，无如人家得寸进尺，绝不放松。”

跟对待其它进步作者的来稿一样，对于许广平的文章，鲁迅也是认真修改；鲁迅还热忱地向许广平传授杂文写作经验，要求她改变“历举对手之语，从头至尾，逐一驳去”的写法，学会正对“论敌”之要害，仅以一击给与致命的重伤。

对鲁迅的同情和报答之心，是促使许广平跟鲁迅结合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共同战斗中产生的情谊，导致了许广平对鲁迅私生活的关心。在频繁的接触过程中，许广平亲眼看到，在斗争中叱咤风云的鲁迅，回到寂寞的家庭里却过着古寺僧人般的生活。由于鲁迅跟朱安的婚姻是全凭家长包办，彼此毫无感情，因此结婚第二夜鲁迅就搬出了新房。鲁迅多次对友人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①“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②但是，在朱安这方面，本来也没有过错，不过做了旧礼教的牺牲品，所以鲁迅并不责备她，只是准备陪着做一世牺牲，维持形式上的夫妇关系，过着实际上的独身生活，将全部心力倾注在工作、学习和斗争上。许广平感到她比鲁迅年纪轻些，有幸能解除包办婚姻的痛苦。因她自己的幸运，更觉鲁迅遭遇的不幸，于是

①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

② 内山完造《我认识鲁迅先生的经过》，见《文坛史料》。

对鲁迅产生了强烈的同情。特别是在鲁迅因支持女师大学生运动遭北洋军阀政府迫害而忧愤成疾之后，更使许广平下定了舍身相报的决心。她认为：“在这新旧过渡的社会，宁可丢弃名誉、地位、家庭、财富，忍受责骂，或委屈自己，男女两方把一切对自己有利的一面，都去牺牲了，来寻求至高无上的爱的建立，这才是真爱。”^①许广平对鲁迅产生的爱情，就是这样一种“真爱”。

一九二五年十月鲁迅与许广平确定了爱情关系。同月十二日，许广平以“平林”为笔名，在鲁迅主编的《国民新报》副刊乙刊发表了《同行者》一文。许广平在文章中热情歌颂鲁迅用“热烈的爱、伟大的工作，要给人类以光、力、血，使将来的世界璀璨而辉煌”，并表示她不畏惧“人世间的冷漠，压迫”，不畏惧“戴着‘道德’的面具专唱高调的人们”给予的“猛烈地袭击”，“一心一意向着爱的方向奔驰”。许广平在以“平林”为笔名写的另一篇散文《风子是我的爱》中，也用含蓄的方式表达了她对鲁迅的爱情，并向旧传统、旧礼教发出了挑战：“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与我们不相干。”后来，许广平在一封致友人信中，还回顾了她跟鲁迅建立爱情的过程：

“……老友尚忆在北京当我快毕业前学校之大风潮乎，其时亲戚舍弃，视为匪类，几不齿于人类。其中惟你们善意安慰，门外送饭，思之五中如炙，此属于友之一面；至于师之一面，则周先生（你当想起是谁）激于义愤（的确毫无私心）慷慨挽救，如非他则宗帽胡同之先生不能约来，学校不能开课，不能

^① 景宋《读〈黄花〉》，见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民主》周刊第八期。

恢复，我亦不能毕业，但因此而面面受敌，心力交悴，周先生病矣，病甚沉重，医生有最后警告，但他……置病不顾，旁人忧之，事关于我，我何人斯。你们同属有血气者，又与我相处久，宁不知人待我厚，我亦欲舍身相报……”^①

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之后，北洋军阀政府将鲁迅列入了通缉的黑名单。同年七月，鲁迅接受了厦门大学国文系的聘请，决定离开居住了十四年的北京去革命风暴席卷的南方。许广平在女师大国文系毕业后，经过熟人推荐，也打算回到她的母校——广东省立女子师范任职。在他们看来，比个人幸福更迫切、更重要的是投入火热的斗争。分手之前，他们曾交换过意见：“大家好好地给社会服务两年，一方面为事业，一方面也为自己生活积聚一点必需的钱，两年之后再相见面。”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在友人和女师大学生欢送下，鲁迅与许广平同车南下。他们决心奋然而前行，用战斗开拓未来生活的道路；因为他们深深地懂得：幸福是生活的开拓者创造的，也只有生活的开拓者才能享有幸福。

^① 许广平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三日致常瑞麟信。



第五章

在大革命的风暴中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晨七时，鲁迅与许广平乘火车沿京浦线抵沪，鲁迅寓沪宁旅馆（后移寓孟渊旅社），许广平在她的叔父许炳璈家暂住。九月二日晨七时，鲁迅乘“新宁”轮由上海赴厦门。同日晨八时十分，许广平乘“广大”轮由上海赴广州。旅途中，许广平两次在舱面发表讲演，向船上的工人和其他旅客揭露北京社会的黑暗情形。九月六日下午六时，许广平安抵广州。当她看到原来低檐窄巷的故乡在阔别十年之后已是层楼高耸、马路纵横时，心情一度异常激动。她很想在在这憧憬已久的地方追寻儿时的踪影。然而很快她就感到，这种想象中的美好踪影却如同水中的月亮，一旦伸手去捞取，所得到的只是一片荡漾的散光……

九月八日，许广平来到广东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报到。这所学校创立于一九〇七年（清光绪三十三年），位于广州市大石街（今吉祥路）太清宫旧址，以培养小学师资为目标。一九二三年，该校在广州市莲塘路（今教育南路）扩充校舍，将师范部迁入，原址改为师范部宿舍和附属小学宿舍，学制亦由四年制改为六年制，即初中、高中各三年。校长是国民党

左派廖仲恺之妹廖冰筠。许广平在北京曾加入国民党左派组织，因此被该校聘为训育主任兼舍监，从九月十三日起正式上班。训育主任的工作是十分繁琐的。根据校章规定，其权责共有十七项之多，如宣传党义、考查学生操行、调解学生纠纷、处理学生惩奖、审查学生集会、联络学生家庭、管理学生起居饮食，等等。^①此外，她每周又担任四个班的八小时课，因此从早上八时到下午五时，工作应接不暇，弄得精疲力尽。晚饭后，还要查看学生自习，直至晚十时学生就寝以后，才能预备教材或处理一些自己的事情。有时连星期日都不得闲。事情繁，收入却少。月薪名义上是一百八十元，但实际上只能领到三四成。此外还要从中减去公债票、国库券、北伐慰劳捐、学校建筑捐……所余寥寥无几。住宿条件亦差。许广平开始住在旧校舍楼上一间狭而暗的小屋里，连窗户都没有，后来搬到东面一处隔成田字形的楼房内。房间纵五步横六步，家具是从各处搜罗的破桌烂椅。特别使她难以忍受的，是毗邻的三家经常高朋满座，喧嚣吵闹，没有一时安静。

比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更令人失望的，是当时的政治环境。许广平到广州后，一方面为北伐战争的顺利进展而深感欢欣；另一方面，她又看到这里“反对赤化的势力”极为嚣张。十月十日那天，许广平带领学生参加游行集会。国民党右派在会上以欢庆北伐军攻克武汉为幌子，趁机别有用心地进行反革命煽动，妄图分裂革命统一战线。参加游行的一些所谓广州“新女性”，其实是娇滴滴的小姐。她们缺乏革命的“自决心”和“自动精神”，有的临出发前装病请假，有的到会后消极应付。如

^①《广东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生须知》，一九二六年八月编印。

果没有各团体的领队维持秩序，中途退场的还会不少。这时正巧周建人转托鲁迅向许广平约稿。十月十七、十八两日，许广平写了《新广东的新女性》一文，由鲁迅转寄上海《新女性》杂志，尖锐批评了广东妇女界存在的这种消极现象。该文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在《新女性》一卷十二期刊出时，编者在按语中正确指出：“至于景宋女士的那篇，一看好像对于本地的女界表示十分的不满，其实却充溢了满腔的热望。尤其难得的，使我们不曾到过广东的人，知道那里女子的实况。倘使各地的女子，都肯把本乡女界的情形，这样如实地记叙出来，对于研究妇女问题的人们，一定有极大的帮助，而且可使后进的女子得到正当的指导。”

许广平回广东后，也做了两件使她快意的事情：一是跟控制番禺县立中学的土豪劣绅作斗争，二是打击了广东女师的国民党右派势力。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许广平跟番禺县学界的进步人士曾联名控告包办该县中学的土豪劣绅。广东省教育厅令番禺县知事于十四日下午召集乡人和学界有资望人士二百余人讨论解决办法。许广平以乡人资格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进行途中，被控的十余名劣绅跟他们的党羽二三十人捣乱会场。县长胆小怕事，宣布改日开会。许广平据理力争，使得会议得以继续进行。会上提议：番禺县废除由土豪劣绅垄断中学领导权的校长制，改行有进步教职员代表参加领导的委员制。又议决登报指斥扰乱会议的封建顽固势力。有些胆怯的人不敢附议，希望取消这一决定。许广平又发言坚持，遂使这项决议得以通过。

在广东女师，许广平也经历了一场剧烈的斗争。这所学校

的学生分成三派，一部分倾向革命，一部分表示中立，而占优势的是“树的派”（“树的克”是英文 stick 译音，意即手杖，当时国民党右派学生常用手杖殴打进步学生，有似意大利棒喝团，所以叫他们“树的派”）。校内的学生会，全为反动学生把持，其核心人物是李秀梅和蒋仲簏（“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她们成了以反共为宗旨的广州女权运动大同盟的要员，李任文书部长，蒋任调查部长）。一九二六年十月，广州学生联合会召开例会，每校三十人中选出一名代表参加。为争夺广州学联的领导权，李秀梅未经校方允许，又未经级代表会议通过，私自利用上课时间，召集一部分私党违法选举大会代表。李的活动遭到革命学生的坚决反对。为了打击校内的右派反动势力，许广平组织了一个特别裁判委员会，当时国民政府的中央青年部、省、市青年部也派员到校协同裁判，一致同意采取断然措施，宣布选举无效，并开除李秀梅的学籍。当学校宣布这项决定时，右翼学生蒋仲簏在会场中站立高呼校长是“共产党”、“反革命”。根据校章侮辱校长应予开除的规定，蒋也被勒令退学。许广平到广东女师两个月，就接连制裁了校内的两个右翼头目。她感到十分高兴，并立即将这一消息告诉了远在厦门的鲁迅，让鲁迅也能分享斗争胜利的欢乐。

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李秀梅、蒋仲簏被开除之后，广东女师右翼学生的气焰并没有因此收敛。她们受国民党右派头目张静江等人的支持、操纵，死灰复燃，继续扩大事态，疯狂进行反扑。她们在夜间张贴辱骂学校、恐吓校长的标语，给校长写英文信，内画一剑一枪，以暗杀相威胁。她们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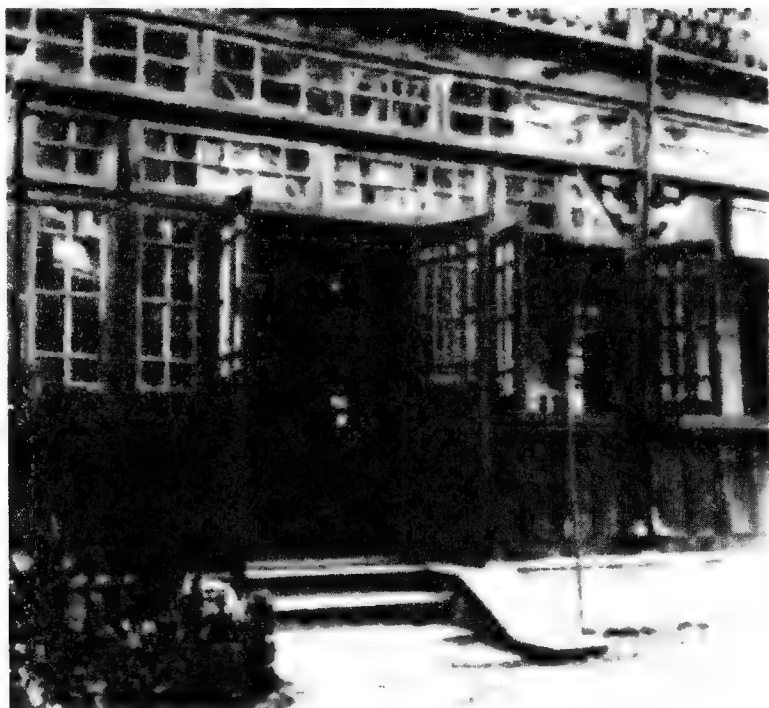
发表援助李、蒋的宣言，煽动罢课。在风潮之初，右翼势力以校长的职务为诱饵，妄图拉拢许广平。此计未果，就辱骂许广平是“共党走狗”。由于学校经费拮据，反动学生捣乱，校长被迫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七日离校，并在辞呈中推举许广平继任校长之职。接着，总务主任，教务主任另谋新职，溜之大吉。一部分教员因薪水不足以维持生活，也陆续引退。这样一来，校长及三主任四种职务就萃于许广平一身。由于“校中无款，总务无法办；无教员，教务无法办；学潮未平，训育无法办”^①，许广平难于独立支持，也于十二月十六日搬回嫂嫂家，辞去了校内一切职务。

许广平离开广州女师之后，邓颖超同志曾想推荐她任中山大学附中训育员。当时，出席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的汕头代表李春涛，也想约请她任汕头市妇女部长兼汕头女子中学校长。后来因鲁迅应广州中山大学之聘，任教务主任兼文学系主任，许广平就决定担任鲁迅的助教。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八日，鲁迅乘苏州号海轮抵达广州。但是一登岸，却遇到了一场比海上险恶得多的“陆上的风涛”。

鲁迅是抱着梦幻来到广州的，然而，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陷入了深沉的思索。这时，有人诬蔑鲁迅“不蓝不赤”，思想灰色，有人发表题为“鲁迅先生往那里躲”的文章，说鲁迅是“躲避了”，“跳出了现实社会去做旁观者了”。许广平挺身而出为保卫鲁迅辩护，帮助人们正确认识鲁迅。她写出了《鲁迅先生任那些地方躲》一文，介绍了鲁迅脚踏到广州之后的观感：“这是革命的策源地，然而是在后方。”“已

^① 许广平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致鲁迅信，见《两地书》。



花园庄旅馆鲁迅避难居处

经早已革命过的了，所以没有压迫。”“悲壮的大会开起来了，然而锣鼓喧天的活像杂耍场。”人们从许广平的文章中，看到了鲁迅对广州形势所作的深刻的分析，理解了鲁迅陷入愤懑的原因所在。

鲁迅到达广州时，正值寒假期间，中山大学还没有开学。利用这段时间，鲁迅应香港青年会邀请，带着不曾痊愈的脚伤，在许广平的陪同下，到香港发表讲演。原定讲演只作一次，因为听的人多，后来又要求再作一次，两次讲演的地点都在今天荷里活道文武庙侧必列嗜士街的青年会。

在英帝国主义统治下的香港，英国殖民当局和当地的封建

势力相勾结，大搞尊孔活动。“大英港督”就公开鼓动“中国人应该整理国故”，妄图利用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抵制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强化他们的殖民统治。鲁迅敏锐地识破了殖民主义者尊孔的真实用心，在讲演中深刻阐述了尊孔读经与崇洋卖国之间的内在联系。

鲁迅二月十八日的讲题为“无声之中国”，十九日的讲题为“老调子已经唱完”。当时香港的青年能听懂国语的远不及现在普遍，鲁迅说的普通话又带着浓重的绍兴口音，自然就更难听懂。为了扫除语言障碍，原是广东人而又最能领会鲁迅讲话神髓的许广平便真切传神地替鲁迅担任翻译，因而更增强了这两次讲演的宣传效果。

鲁迅的讲演在香港进步青年的心中燃起了反帝反封建的火焰，英国殖民当局惊恐万状。他们在讲演之前横加干涉，中途又派人索取近四分之一的入场券，妄图阻挠捣乱；讲演会冲破重重阻力获得成功之后，又不许将讲演稿登报，“经交涉的结果，是削去和改窜了许多”^①。

鲁迅到来之前，广州报纸的副刊上刊登的多是用广东方言写成的无聊小品，教科书中充斥着陈腐的文言文。正如共产党人毕磊指出的那样，“广州的文坛上，几乎可说如同一块沙漠连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冷静，只是沉寂”^②。为了使南方爱好文艺的青年们活跃起来，鲁迅不仅对南中国文学会的活动进行指导，而且垫付了六十元房租，在惠爱东路芳草街四十号的二楼上转租了两房一厨房，后房住人，前房用一长条柜隔开，

① 鲁迅《略谈香港》，见《而已集》。

② 毕磊《欢迎了鲁迅以后》，见钟敬文编《鲁迅在广东》。

约三分之二的地方放置书架，三分之一的地方供顾客站立选购书籍，这就是三月二十五日在广州出现的北新书屋。当时还流通不到南方的鲁迅作品以及北新、未名的出版物，陆续寄到这里来出售。许广平经常到这里帮忙，还让她的小妹许月平经营书屋的业务。三月二十六日，许广平写出了《北新书屋》一文，发表于三月三十一日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第三十五期。这篇文章产生了很好的广告效应，渴望进步文艺读物的广州青年纷纷到这里来买书，一时门庭若市。在文苑荒芜的广州，这家书屋在传播新思潮方面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鲁迅在广州最早住在中山大学大钟楼西面的二楼上。这座米黄色的钟楼原为清末两广优级师范学堂。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钟楼的礼堂举行。这座楼房外面虽被细叶婆娑的古榕和绿草如茵的广场环抱，但里面的居住环境却十分嘈杂。鲁迅在此，从早上十点至夜十点，都要接待源源不断的来客，有“访问的，研究的，谈文学的，侦探思想的，要作序，题签的，请演说的，闹得不亦乐乎”^①。清晨还未起床，三位工友响亮地唱起了他所听不懂的歌；入睡后，又有十多只头大如猫的老鼠四处驰骋。这样的住处显然不适于工作和创作。于是，三月底，鲁迅与许寿裳在广州东堤白云路白云楼二十六号二楼合租了一组房间，除了厨房、厕所、女工住房、饭厅兼客厅之外，还有三间卧室。鲁迅首先将一间较大而凉快的南房让给许寿裳先生住，自己挑了一间西晒的屋子。为了使用女工方便，以及语言关系，也分了一间房子给许广平住，请她管理柴米油盐的杂务。这里远望青山，前临小港，景色清幽。每天

^① 鲁迅《通信》，见《而已集》。

午餐、晚餐之后，他们常常一边吃着翠绿的杨桃，一边毫无拘束地漫谈，有时也同去茶楼消闲遣兴，去得最多的是陆园。鲁迅觉得，广州的茶清香可口，浅斟低酌，别有一般风味。而许寿裳则对广州茶馆建筑的精致和茶具的清洁留有深刻的印象。然而半个月之后，广州反动派的枪声打破了白云楼的宁静。惨绝人寰的“四一五”政变发生了！

四月十四日午夜，广州军政当局为响应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突下紧急戒严令，指挥警备司令部的军队及公安总队秘密出动，开始袭击工人纠察队及近郊农军，包围黄埔军校、省港罢工委员会、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中华全国铁路联合办事处、中华海员工会广州分会、济难会、妇女解放协会、妇女运动人员训练所等处，大批屠杀逮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公安局、戒严司令部、警察厅乃至南关戏院，均成监狱。十五日晨，全市电话不通，商店闭门，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味和血腥味。鲁迅在白云楼看到，反动军队在集合调动，对岸工会已被查抄，许多人被带走。忽然，许广平家的老工友“阿斗”惊慌失措地跑来，气喘吁吁地报告说，“树的党”头目带领荷枪实弹的反动军警冲进中山大学，照着黑名单搜捕进步学生。学校墙上贴满了标语，大骂共产党，其中也有牵涉鲁迅的。他叫鲁迅赶快躲藏起来。但是，鲁迅和许广平都没有听从这位善良人的忠告。鲁迅立即赶到中山大学，安排下午各主任紧急会议。许广平没有顾及自己的安危，而是首先想到了她深为景仰的邓颖超同志。前文已经提到，早在五四时期，许广平就受到了邓颖超同志的影响。到广州之后，她又在邓颖超同志领导下从事妇女运动，并与邓颖超同志一起在广东省妇女部下属

的妇女运动人员训练所任教，讲授《妇女与经济政治之关系》，彼此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当许广平一口气跑到邓颖超同志寓所时，得知邓颖超同志已安全转移，她才如释重负地回家。

“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鲁迅与许广平的处境十分险恶。他们不久前刚离开了北洋军阀盘踞的北京，“逃掉了五色旗下的‘铁窗斧钺风味’”；在“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他们又遭遇了青天白日旗下的“縲绁之忧”。香港的《工商报》上，刊出了鲁迅因“亲共”而逃亡的消息；一个学者，竟然命令鲁迅“暂勿离粤，以俟开审！”白云楼前，时而骄阳似火，时而暴雨如绳，时而阴雨连绵。在这风云变幻的岁月里，鲁迅经历了极为严酷的血的洗礼，进化论的思路因此摧毁，世界观终于发生了质的飞跃。他愤而辞去了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在白云楼的西窗下，相继编写整理了《野草》、《小约翰》、《朝花夕拾》、《而已集》、《唐宋传奇集》等著作，就像一杆火红的战旗，傲然屹立在大夜弥天的广州。许广平也坚定地跟鲁迅站在同一战线，任凭风浪起，相与渡横流。

七月十六日（星期天）中午十二时半，由许广平担任翻译，鲁迅在广州纸行街知用中学发表了题为“读书杂谈”的讲演。知用中学成立于一九二四年，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学校。当时的师生中，有不少是党团员。鲁迅在讲演中，针对“四一五”政变后国民党实行所谓“党化教育”，对青年进行思想禁锢的情况，公开号召学生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以冲决文化专制的罗网。他还用含蓄的语言教育青年重视实地经验，读书和实社会相接触，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鲁迅的这些谆谆教导，对于启发革命青年正视严酷现实，投入艰

苦卓绝的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七月二十三日上午和二十六日上午，仍由许广平担任翻译，鲁迅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发表了两次讲演，共计四小时。这次演讲会是由国民党广州市教育局举办的，担任讲演的有三十余人。开幕式上，广州市长林云陔、教育局长刘懋初先后发表了反共演说。他们胡说“国民党对于智识阶级是培植的”，“共产党对于智识阶级是要打倒的”，“若果无国民党把共产党来打倒，我们一般智识阶级，便无机会集合，在这来研究学术”。他们提出要依照国民党的主张去研究学术，妄图把这期演讲会纳入反共活动的轨道^①。鲁迅洞察了当局的用心，他特意选择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一讲题，跟敌人进行了一场巧妙迂回的战斗。鲁迅着重用司马昭之流捏造罪状、屠杀异己的事实，影射国民党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血腥暴行。正如他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致陈浚信中指出的那样：“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由于鲁迅与许广平密切配合，这次讲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广州将近九个月的战斗里，鲁迅和许广平又看到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血和泪并没有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征服、压倒，反而激起了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八月一日，在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等人的领导下，爆发了著名的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全国人民中树起第一面武装斗争的红旗；九月九日，毛泽东亲自领导了湘赣边区的秋收起义，开辟了建立农村革命根

^① 《广州教育局夏令学术演讲会开幕记》，见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二日香港《循环日报》。

根据地，由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新的战场开辟了，革命力量在重新积聚。鲁迅和许广平准备以新的姿态投入新的生活。他们决心离开被刽子手的血手污染了的广州，奔向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鲁迅余怒未息地对许广平说：“一同走吧！还有什么可留恋的！”

九月二十七日，鲁迅与许广平登上山东号海轮，经香港、汕头赴上海。他们在舱面遥望满天不断变幻的云霞，心中充满了对新生活的热切渴望。他们决心在大洋洪波中激流勇进，去迎接那即将来临的风雨雷电！



第六章

“十年携手共艰危”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日,鲁迅、许广平同抵上海,寓共和旅馆;十月十八日上午,移入东横浜路景云里第二弄二十三号,开始了同居生活^①。这是他们爱情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他们爱情深化的一个新的起点。他们的结合,在当时具有对封建礼教叛逆的明确性质。一九三七年,许广平与许寿裳、周作人共同编撰《鲁迅年谱》时,许寿裳曾写上鲁迅与许广平“以爱情相结合”一句,而许广平却认为不必把这句出于好意而其实是当然的事实的话记在纸上。她在《鲁迅年谱》改定稿“一九二七年十月”项下亲笔写下六个简单明了的字:“与许广平同居。”她解释道:“关于我和鲁迅先生的关系,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了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缚,而彼此间在情投意合,以同志一样相待,相亲相敬,互相信任,就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我们不是一切的旧礼教都要打破吗?所以,假使彼此

① 有人打着“还我真鲁迅”的旗号,“运用了一点近似于弗洛伊德的方法”,“考证”出鲁迅与许广平一九二五年“已开始同居”,后来又说什么“他们真实的同居时间是一九二六年五月”。周海婴在致倪墨炎信中说:“在我母亲与许寿裳先生等人共同编定的《鲁迅年谱》中,已写明我父母正式同居的时间是一九二七年十月。这是经过我母亲生前确定的一个日期,今天不能推翻臆断随意变更。”在《关于〈魔崇〉答倪墨炎先生》一文中,周海婴又斥责倪墨炎“公然侵犯我父母的隐私权”。

间某一方面不满意，绝不要争吵，也用不着法律解决，我自己是准备着始终能自立谋生的，如果遇到没有同住一起的必要，那么马上各走各的路……”^①

鲁迅与许广平建立的家庭是十分简朴的。他们购置的家具“每人仅止一床、一桌、二椅”，“没有用工人，吃饭也和建人先生及他的同事在一起”。不久，“鲁迅又向建人先生建议，两家合伙烧饭，以免和同事们一起诸多不便，一切柴米油盐等杂物，托王蕴如同志的一位亲戚兼管，就在二十三号楼下煮食”^②。一九二八年九月，他们迁居至景云里十八号；一九二九年二月，迁居至景云里十七号；一九三〇年五月，迁居北四川路北川公寓；一九三三年四月，迁居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大陆新村九号。住址虽然先后多次变更，但鲁迅与许广平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却始终如一。^③

鲁迅到上海后，决定停止教学活动，专心从事创作。许广平也提起笔，直接参加了斗争。她跟几个女师大的校友办了一个妇女杂志，名为《革命的妇女》。她在该刊发表的文章，首先揭露和控诉了蒋介石在“清党”名义下屠杀革命者和进步人士的血腥罪行。她尖锐指出：“……所谓国民党者，其中有一

① 景宋《〈鲁迅年谱〉的经过》，见一九四〇年九月十六日《宇宙风（正刊）》二卷九期。

② 许广平《景云深处是吾家》，见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文汇报》。

③ 许广平在文章中多次谈到鲁迅“囚首垢面而谈诗书”，他的生活是“精神胜于物质”：“吃的东西很朴素”，“对于衣服极不讲究”，常用废纸做信封……但有些地方却不愿节省，如住房要宽绰一点，不喜欢吃隔夜菜，最奢侈的享受是在上海时坐出租车看电影。现在又有人宣传鲁迅生活的“精致”，有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之虞。

派是专门反共，他们打着反共旗帜，但不少人却借此排除异己，实行升官发财、结党营私的利禄薰心的黑暗事业。……今年清共的成绩，是清一省，陪送多少忠实的同志，清一次，又陪送多少忠实同志。清的次数愈多，国民党愈不可收拾……这和北京卖刀剪的门口总挂着王麻子的招牌一样的法术，自负都是国民党忠实党员，各人捧着一本三民主义做圣经，然而注释经义的就随着那一派在舞台而生杀其余的同志。一年以来，死了还没有知道姓名，捕去还不知道下落，和清党凭了私仇清出杀掉，或硬派一个共产党三字头衔，或加上嫌疑等字捕杀的有多少？”^①许广平在文章中，还大胆反映了劳动妇女的悲惨遭遇，指出女工“是人间最黑暗地狱的囚徒。她们工作时间较男工长，佣值较低，子女牵累，在厂中工作时兼职育儿，较男工苦”^②。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上海闸北破旧的厂房倒塌，酿成三百多名女工葬身于瓦砾丛中的惨剧。许广平认为，靠慈悲的人们周赈几文抚恤金，举行几次追悼会，派几个不关痛痒者慰问一番，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只是哄骗小孩子的交易。她挺身而出，为惨死的闸北女工请命，呼吁把妇女问题和劳动问题联系起来解决，将妇女运动的重点移到无产妇女身上，救救那幸而未死的女工的活灵魂^③！

除了创作，许广平还托许寿裳先生设法替她在教育界找事，打算独立地服务于社会。这件事很快就有了眉目。鲁迅知道后，

① 景宋《惊魂甫定的心》，见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革命的妇女》第三期。

② 景宋《为惨死的闸北女工请命》，见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日《革命的妇女》第二期。

③ 同上。

很感为难地说：“这样，我的生活又要改变了，又要恢复到以前一个人干的生活中去了。”这话深深打动了许广平的心，她认识到，在又残酷又艰苦的斗争中，鲁迅不能缺少她的支持和助力。协同鲁迅进行战斗，也是她服务于社会和人民的一种方式。于是她决定不出去工作了。要做无名人物的心愿，就这样充满了她的胸怀。

在跟鲁迅旦夕相处的日子里，许广平对鲁迅披肝沥胆，忠贞不渝，确实以崇高的献身精神实践了她“做无名人物的心愿”。

许广平在工作上对鲁迅的帮助是多方面的。她替鲁迅购买参考书籍，查找有关材料。鲁迅每一种译著出版，总是与许广平共同校对：许广平主要校正错字，鲁迅主要校正编排格式。鲁迅的文章写成后，许广平往往是第一个热忱的读者。对于许广平提出的修改意见，鲁迅总是虚心采纳，绝不孤行己意。为鲁迅抄写稿件时，许广平极为仔细认真。对于鲁迅的重要活动与谈话，许广平曾想随时记录下来，编辑成帙，再由鲁迅校正，可惜这一工作开始不久，鲁迅竟重病不起。所以许广平在鲁迅生前所完成的，只有《关于鲁迅的生活》一书中所收的《片段的记录》。对于鲁迅的手稿，许广平总是竭尽全力地妥为保存。即使是鲁迅弃置的文稿，许广平也视为吉光片羽而予以珍视。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刊登于《奔流新集之一·直入》上的鲁迅佚文《势所必至，理有固然》，就是许广平从字纸篓里拾藏起来的。

对于鲁迅的起居饮食，许广平也是照顾得无微不至，尽力使鲁迅不致受到无谓的烦扰。海婴出生之后，鲁迅家中虽然请了保姆，但买米买炭等生活琐事都是许广平亲自动手。留客吃

饭，许广平没有不下厨的，比如陈赓将军来访，史沫特莱、肖红辞行……都是由许广平亲自治饌招待。就连鲁迅换洗衣服，许广平也总是代劳。鲁迅时常向人感叹似地说：“现在换衣服也不晓得向什么地方拿了。”对于那种涂脂抹粉、搔首弄姿把自己变成男人的寄生虫的女性，许广平极为蔑视、憎恶。为了不浪费鲁迅的有限收入，许广平精打细算，克勤克俭：棉鞋，是她自己做的；毛衣，是她自己织的；衣裳，是她自己缝的；用品，是她自己到便宜店铺和减价的地方选购的……一天到晚，许广平总是屋里屋外、楼上楼下地操劳着，有时坐在她旁边，都可以听到她急促的呼吸声。夜深了，许广平替鲁迅送走最后一批客人，轻轻地关上大门走进卧室就寝，鲁迅总是躺在床边说：“我陪你抽一支烟好吗？”这一支烟往往没有吸完，许广平却因极度疲乏而在床里边睡着了。就这样，在鲁迅上海时期的生活里，凝聚了许广平诚挚的感情和辛勤的劳动。许广平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说：“从广州到上海以后，虽然彼此朝夕相见，然而他整个的精神，都放在工作上，所以后期十年间的著作成绩，比较二十年前的著作生涯虽只占三分之一，而其成就，则以短短的十年而超过了二十年，这也许到了现在想起来，于万分自愧中稍可聊自慰藉的了。”^①

革命者忠贞的爱情花朵，要用双方感情的雨露浇灌，要用双方心灵的沃土培育。鲁迅对许广平也是竭尽忠诚的。鲁迅通过日文的《马克思读本》（神永文三著），深入浅出地向许广平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该文共分十讲：一、马克思的生涯及事业；二、唯物论辩证法；三、唯物史观；四、阶级斗争说；五、

^① 许广平《因校对〈三十年集〉而引起的话旧》，见《关于鲁迅的生活》。

马克思主义与国家；六、劳动价值说；七、剩余价值说；八、资本积蓄说；九、利润说；十、资本崩溃说。从一九二八年十月三十日开始，至一九二九年四月七日止，鲁迅共讲了五个多月，有时把整个句子拆除开来向她讲解，并且随时改正课本上的错字。许广平回忆说：“那课程的大概内容，它所包含的真理的光芒，以及鲁迅对我讲解这些革命真理时的声态，我还觉得像昨日上课一样地深印脑中。”^① 每当出版了新书，鲁迅常常持赠许广平，而且精心地用蜡光纸包好封面，并在扉页亲自题签。比如一九二八年三月十日，鲁迅就将倍倍尔的《妇人论》转赠许广平。脍炙人口的七绝《赠广平》，也是鲁迅在赠送给



《小彼得》封面

许广平的《芥子园画谱》三集首册扉页上亲笔题写的。为了帮助许广平学习日文，鲁迅付出了一年零五个月的劳动，甚至自编了二十七课教材。收入《鲁迅译文集》第四卷的《小彼得》，就是许广平在鲁迅指导下从日译本转译而后再由鲁迅认真校改的。在生活上，鲁迅对许广平的体贴也是十分感人的。海婴临产前，鲁

①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中写道，鲁迅希望许广平精通一两种外文，是使她可以独立谋生，无需去求助他人；但也可以借此用马列主义思想武装头脑，以便对新文化事业多做一些贡献。但许广平《鲁迅回忆录》（手稿本）的编者加注说，这是一种“拔高”。请问：鲁迅教许广平学日语时，偏偏选择《马克思读本》作为教材之一，难道就没有让许广平多接触一些新兴理论的动机在内吗？

迅不顾身体发烧，亲自替许广平办妥了住院的一切手续，然后又坚持亲自在旁照料。因为难产，医生向鲁迅征求“留孩子还是留大人”的意见。鲁迅不假思索地回答：“留大人。”为了纪念许广平付出的默默无闻的劳动，鲁迅发表自己的译作有时特意用“许霞”或“许遐”的笔名，因为许广平的小名叫做“霞姑”。鲁迅时常对许广平说：“我要好好地为中国做点事，才对得起你。”

在家庭生活中，鲁迅与许广平都有着坚定的原则性。凡牵涉到保密的一些事情，比如有关左联的活动以及与其他革命者的来往，鲁迅遵守铁的纪律，从不随意张扬，许广平也不冒昧打听。有时鲁迅让许广平焚毁一些重要信件，许广平不仅不看内容，而且自觉地连信封也不看。

定居上海的十年中，鲁迅与许广平在战斗劳苦之余虽然也曾有过简单的娱乐（比如看电影）和短暂的游憩（如一九二八年四天的杭州之行），但更多的却是经受旧习惯势力的压力和形形色色敌人的迫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鲁迅在《两地书·序言》中说过：“回想六七年来，环绕我们的风波也可谓不少了，在不断的挣扎中，相助的也有，下石的也有，笑骂诬蔑的也有，但我们咬紧了牙关，却也已经挣扎着生活了六七年。”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鲁迅与许广平在白色恐怖和兵燹战祸中共同度过的那些艰难岁月。一九三〇年，鲁迅因为参与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参加左联成立大会，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于三月十九日至四月一日、四月六日至四月十九日外出避难，寄寓内山完造先生家的假三层楼上。当时的空气极度紧张，在三月二十日的鲁迅日记中，就有“归途有形似学生者三人，追踪甚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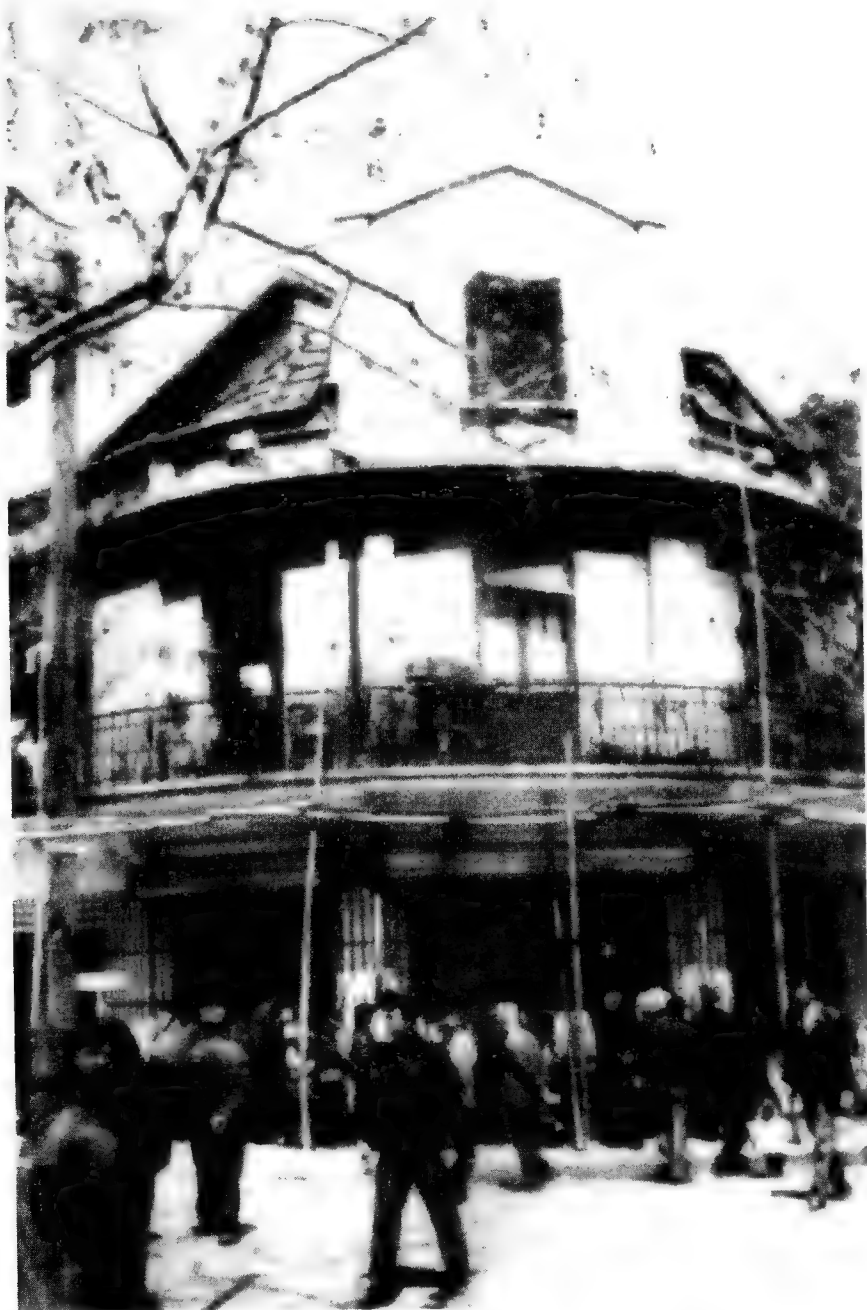
的记载。许广平冒着危险，几乎天天去探望鲁迅，并每隔三两天，带爱子海婴跟鲁迅相见一次。一九三一年一月，柔石等二十余名革命者在上海东方饭店被捕。因为柔石、冯铿都到过鲁迅家，捕房几次向柔石追问鲁迅的地址，鲁迅被迫避难。许广平当时对鲁迅只身出走很不放心，决定跟他在患难中同生共死。从一月二十日至二月二十八日，经内山完造介绍，鲁迅偕许广平携海婴并一位姓许的女工，移居黄陆路花园庄的一家日本旅馆。他们住在一间紧靠浴室的潮湿窄小的房间里，挤在靠门口的一张小床上，室内蒸气升腾，周围堆着破烂的杂物。就在这里，鲁迅与许广平度过了一个多月的避难生活。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战争发生，鲁迅当时所在的北川公寓正对着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司令部，周围环境纷扰，终日枪声不断，就在鲁迅的书桌旁边，一颗子弹洞穿而入。三十日黎明，大队日军闯入鲁迅家搜查，周建人也被日本海军陆战队捕押（后由内山完造保释）。在这种极度危险的情况下，鲁迅一家与周建人一家共十口人，携带着一点简单的衣被，于三十日下午避到内山书店的一间楼上，在用厚棉被遮窗的黑暗沉闷的斗室里，整整挤了一个星期。二月六日，正是春节，他们又避居三马路英租界内山书店支店，十人一室，席地而卧。因为夹在难民堆中，居住条件恶劣，三月十三日海婴染上疹子，鲁迅和许广平只得又举家移避至大江南饭店。生活的动荡劳苦，使得鲁迅、许广平也先后病倒。一九三三年八月，内山完造送其夫人到日本长崎治病，他们走后内山书店的两名中国职员因共产党嫌疑突然被警察局拘留。内山完造担心他们说出鲁迅的地址，便从日本打电报到上海，让鲁迅搬到他千爱里的住处。于是鲁迅只

得每天晚饭后外出避难，至九日始返寓。在鲁迅遭遇危险的时候，许广平跟鲁迅步步相随，决心用生命保卫鲁迅。“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以上这些真实的生活片断，为鲁迅这一诗句作了极为感人的注脚。

在晴朗的日子里，有时会有阵雨突降，然而雨过天晴，天空会显得更加澄碧，空气也会显得格外清新。在和睦的夫妻间，有时也会有矛盾冲突，然而隔阂消除，感情会变得更加融洽，心灵会变得更加贴近。鲁迅与许广平相处时，偶然也有过不愉快的时候。这往往是由于鲁迅在社会上受了磨难，心情不好，不免对许广平有所苛求。这时，许广平真不知应该如何自处。发怒吗？有违他们之间始终保持的师生之谊。讨饶吗？实在不知道要饶什么。痛哭吗？那是弱者的行径。于是，两人就不言不语，相对沉默，不过至多一天半天，就云消雾散了。鲁迅往往首先抱歉地说：“我这个人脾气真不好。”“因为你是先生，我多少让你些，如果是年龄相仿的对手，我不会这样的。”——这是许广平的回答。

在这里，还有必要补叙鲁迅夫妇与瞿秋白夫妇之间弥足珍贵的革命情谊。一九三二年春末夏初至一九三四年一月，鲁迅在上海结识了当时遭受王明打击和排斥的瞿秋白同志。他们是“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①，见面之后更如至亲相见，故友重逢。许广平则在女师大求学期间就听过瞿秋白同志的讲演，他讲演时那飞扬的神采给许广平留有深刻的印象。在白色恐怖之下，为了避开敌人的追踪，瞿秋白夫妇曾在鲁迅寓内度过了三次避难生活。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当时正值

^① 瞿秋白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五日致鲁迅信。



上海公啡咖啡馆在这里召开过左联筹备会议

鲁迅返回北京探亲。瞿秋白夫妇晚间来时，是由许广平热情接待的。许广平腾出鲁迅工作室兼卧室的那间大北房，把他们的双人床让给瞿秋白夫妇。第二次是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当时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抵沪访问。因为萧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伪善、贪欲、欺诈有所批判，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有所揭露，一批御用文人便在上海的中外报刊上对萧进行歪曲、诬蔑，并借此诋毁中国革命及左翼文艺运动。为了暴露文痞、政客、军阀、流氓、叭儿等各式各样人物的真相，许广平跑到北四川路一带搜购有关记载和评论萧的活动的报纸，而后由鲁迅和秋白同志选择圈定，再由许广平和杨之华同志共同剪贴，辑成了《萧伯纳在上海》一书，于同年三月由野草书局印成。这本具有重要文献意义的书，是他们共同劳动的结晶，也是他们战斗友谊的见证。不久秋白夫妇搬到北四川路底的东照里居住，许多日常生活事务都由许广平代劳。第三次是在一九三三年七月，那次因为我党地下机关被敌人发现，秋白夫妇深夜二时左右前来避难。许广平在这危急时刻，亲自下楼探听动静，两次出门迎接秋白夫妇。患难中结成的知己最难忘。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杨之华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她后来在新疆狱中经常怀念鲁迅一家人，当她知道许广平的下落时，兴奋得一晚不能合眼，十年前的景象，一幕幕复演在她的眼前……^①

在上海时期，虽然许广平对鲁迅体贴入微，照顾周到，但

① 但周海婴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说，许广平去世前几天“还在撰写文章批判瞿秋白对鲁迅思想的歪曲”。她觉得“瞿秋白认识鲁迅前，全盘否定五四运动，否定鲁迅，甚至说鲁迅是‘学阀’；认识鲁迅后，也始终不承认鲁迅是马克思主义者，只说鲁迅是‘同路人’”，她认为应当予以批判。

频繁的战斗，紧张的工作，艰苦的生活，终于严重地损害了鲁迅的健康。一九三六年三月，鲁迅骤患气喘病，他谢绝了亲友的敦劝，不肯转地疗养，仍旧继续工作。五月中旬，再发病，不言不食，直到处于“无欲望状态”，才在寓所就医。其间一度略有转机，鲁迅又挥笔上阵。他说：“我是要战斗，到死才完了。”八月，鲁迅痰中带血；十月，鲁迅体重减至八十八磅。在鲁迅重病期间，许广平十分操劳，她按时给鲁迅吃药，按时给鲁迅试体温，为了使鲁迅能略进饮食，哪怕是多吃一口饭，多饮一口茶，多喝一口汤，许广平都想尽了办法。菜拣嫩的，肉烧软的，鱼是挑完刺的，而后满怀期待，亲自端上楼送到鲁迅的病榻前。为了使鲁迅能安心静养，许广平代替鲁迅会客，代替鲁迅拆书、报、信，除非特殊要紧，绝不打扰鲁迅。在鲁迅面前，许广平以惊人的意志控制自己，不曾流过一滴眼泪，但是背着鲁迅，却禁不住常常暗中啜泣……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凌晨五时二十五分，鲁迅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临终前，鲁迅好几次紧握许广平的手，无言地跟他最忠诚的学生，最亲爱的夫人诀别。当天，成立了鲁迅治丧委员会。毛泽东同志列名于治丧委员会名单。十月二十日上午，上海各界人民纷纷带着黑纱，来到胶州路万国宾馆楼下的礼堂瞻仰鲁迅的遗容。同日，许广平与宋庆龄、沈钧儒等去看了墓地。上海《日日新闻》（晨刊）发布消息：“鲁迅氏的告别礼，今明两天中举行，毛泽东也是治丧委员。”

十月二十一日下午三时，鲁迅入殓。

十月二十二日下午一时十分，举行了启灵祭，两点三十分启行。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高唱悲壮的哀悼歌和救亡歌曲，

在骑车或徒步的印度巡捕以及全副武装的反动军警的严密监视下，经过胶州路，极思菲尔路，地丰路，大西路，虹桥路……于四点三十分抵达上海西郊万国公墓。人们看到许广平肃然伫立在鲁迅墓前，眉间带着缕缕哀思，两眼含着悲怆的泪水，手里捧着《致鲁迅夫子》的墓偈，上面写着：

鲁迅夫子：
悲哀的氛围笼罩了一切，
我们对你的死，有什么话说！
你曾对我说：
“我好象一只牛，
吃的是草，
挤出的是牛奶、血。”
你不晓得，什么是休息，
什么是娱乐。
工作，工作！
死的前一日还在执笔，
如今……
希望我们大众，
锲而不舍，跟着你的足迹。

下午六时，鲁迅的灵柩入穴。在灵柩上，覆盖着一面上海民众代表敬献的长二〇二厘米、宽一〇三厘米的旗子，旗子上由沈钧儒先生题写了“民族魂”三个大字。

当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苏维埃中央政府

发出了三份电报：《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致国民党与南京政府电》、《致许广平电》，其中《致许广平电》的全文是：

上海文化界救国联合会、转许广平女士鉴：

鲁迅先生逝世，噩耗传来，全国震悼。本党与苏维埃政府及全苏区人民，尤为我中华民族失去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领袖，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而同声哀悼。谨以至诚电唁，深信全国人民及优秀之文学家必能赓续鲁迅先生之事业，与一切侵略者、压迫势力作殊死的斗争，以达到中华民族及其被压迫的阶级之民族和社会的彻底解放。

肃此电达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苏维埃中央政府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在《致国民党与南京政府电》中，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提出了为鲁迅先生举行国葬、鲁迅家属与先烈家属享同等待遇，设立鲁迅研究院、废除鲁迅生前所颁布的一切禁止言论出版自由之法令等八项要求。当时，许广平很快地就读到了这些文件，心里充满了感激和力量。她知道，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下，上述要求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但是，她坚信：有人民在，有党在，人民的愿望总有一天会实现！



第七章

围城中的斗争

鲁迅的去世，对许广平的打击是异常沉重的。鲁迅临死前一个月，曾在—篇题为“死”的杂文中留下了这样的遗嘱：“忘记我，管自己生活。”然而，许广平岂能忘却跟她肝胆相照、休戚与共的导师和爱人？她对鲁迅的思念，好似那风车上的叶片，刚转下去，随即又升腾起来。



司徒乔绘鲁迅遗容像

鲁迅卧室里那铺满了各种参考书的书桌，那悬挂着破旧黑哔叽长袍的橱柜，那工作之余休憩所在的破藤躺椅，那鲁迅亲自购置的晶莹的鱼缸……都会唤起许广平对昔日生活的追怀。如今，内山完造先生赠送给病中鲁迅的十尾苏州鱼还在鱼缸中活泼地游动着，而曾经为它们铺沙、灌水、安放水草的鲁迅却永远停止了呼吸……

悲痛，时时在袭击着许广平碎裂的心。她的有生之日，成了长忆鲁迅之年。但是，许广平并没有整天以泪洗面，被悲痛压得抬不起头来，因为她知道眼泪并不能挽回鲁迅去世这一无



内山完造在书店书口设立的施茶桶，过路人均可免费喝茶

法补偿的损失。她懂得鲁迅的伟大事业并没有随其形骸的消亡而终止，要继承鲁迅的遗志、赓续鲁迅的事业，她就必须以非凡的毅力克制自己的感情，勇敢地承担起学习、宣传、保卫鲁迅的重任；她就必须坚持鲁迅的严正立场，对旧中国一切反动、落后的势力绝不妥协，为革命事业和新文化运动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她必须将鲁迅的崇高思想渗入自己的血液，用鲁迅的言行指导自己立身处世，使鲁迅的精神像种子一样在自己身上发芽、滋长、生根、结实。就这样，许广平在悲痛中挺起身来，在生命的征途中迈出了新的坚实的步伐。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许广平刊登了《征集鲁迅先生书信启事》，深刻指明了鲁迅书信不但是编写鲁迅传记的必要材料，而且亦将成为一代思想史文艺史的宝贵文献，呼吁鲁迅书信的受信人将原信挂号惠寄。征集结果，得鲁迅书信八百余封，计通讯者七十余位。这就为今天的《鲁迅书信集》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即鲁迅逝世后三个月又五天，许广平将鲁迅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的杂文十四篇编成《夜记》，于同年四月交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从而实现了鲁迅的遗愿。

同年六月，许广平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了《鲁迅书简》（影印本）。该书择取了鲁迅与国内外几十位友人的通信六十七封，使鲁迅有代表性的书信的影印件得以与世人相见。

同年七月，许广平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了《且介亭杂文末编》。该书辑录了《且介亭杂文》一、二两集中未及编入的杂文三十五篇。这些杂文是鲁迅生命最后时刻的心声，在鲁迅的整个文化遗产中占有独特的重要地位。

七月十七日，有许广平参加的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在上海华安大厦正式成立。各界人士和友好募集了三千余元的文学奖金，准备加强鲁迅的纪念工作。

同年十月十八日下午，上海战时文艺家协会在女青年会召开了鲁迅逝世周年纪念演讲会。当时上海正在进行着神圣的抗日战争。许广平在隆隆的炮声中，穿过败壁颓垣，迈过高低不平的瓦砾丛，出席这次有数以千计的爱国青年参加的集会。在唱完《义勇军进行曲》和《鲁迅纪念歌》之后，许广平登上用金黄色菊花装饰的讲坛，满怀激情地报告了鲁迅生平，受到了听众的热烈欢迎。郭沫若在会上发表了《鲁迅并没有死》的著名讲演，指出对于恶势力决不妥协的鲁迅精神，已经成了我们的民族精神。目前的浴血抗战，就是这种精神的再现。他用高亢激越的声音说：“大哉鲁迅！鲁迅之前，无一鲁迅。鲁迅之后，

无数鲁迅。”^①

十月十九日上午，上海二十余青年救亡团体在南市新桥路台州会馆举行了鲁迅逝世周年联合纪念会，到会者千余人。会场悬挂的挽联上写着：“先生精神不死，中华民族永生。”许广平在会上介绍了鲁迅生平。同日下午，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和上海战时文艺家协会在浦东大厦七楼联合发起座谈会。许广平携海婴出席。莅会的还有郭沫若、沈钧儒、田汉、郑振铎、傅东华、胡愈之、陈望道、王统照、巴金、欧阳予倩等一百余人。巴金将十本刚刚装订好的大型纪念册《鲁迅先生纪念集》放在许广平的座位面前^②。这本书中“所有照片，墨迹，自传，译著目录等的搜集整理编制；挽联辞的选录及其它各项材料供给等，均由许景宋先生负责”^③。该书的印刷费二百元也是许广平垫付的。这次会上，作出了组织文艺界救亡协会的决定，并临时提议：催促商务印书馆出版《鲁迅全集》，邀集现有一切文艺作家及团体为文艺界救亡协会会员，联名请政府即日宣布对日绝交^④。同日，许广平发表了《纪念鲁迅与抗日战争》一文。文章分析了当时“东北沦亡，绥察继陷，平津已失，晋北垂危，淞沪心腹，沦为血战，边疆要塞，尽饱鲸吞”的严重形势，指出在挽救民族危亡的神圣抗日战争中，应该认真领会鲁迅总结的战斗经验，提供的战斗方法。这些经验和方法主要是：要有

① 艾芜《你放下的笔，我们要勇敢地拿起来》，见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五日《四川文学》第七期。

② 巴金《纪念雪峰》，见《随想录》第一集。

③ 见《鲁迅先生纪念集·后记》，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一九三七年初版。

④ 《学习鲁迅精神，文艺家大团结》，见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日《救亡日报》。

毅力，空口喊冤没有用处；要反抗，复仇；这反抗须坚决持久，战线扩大，添造战士；敌人是怯的，不足畏，我们应注意民力，不要讲面子。在国外，要联合我们的友人；在国内，要欢迎任何抗日力量。只有这样，才能保存民族生存，争取民族复苏。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国民党军队撤出上海。上海四周沦于日寇铁蹄之下，只有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依然维持着“中立国”的“超然”地位，恰如海上的孤岛一般。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租界，上海完全沦陷。这一段时间前后共四年零一个月，被称为上海“孤岛”时期。不过，被比喻为“孤岛”的上海租界，四周并不是一片白茫茫的汪洋，而是洋溢着千百万不愿做奴隶的人民的血泪；被比喻为“孤岛”的上海租界也不像海中的孤岛那样与世隔绝，在这里，党的领导和影响依然存在，人民的斗争依然存在，只不过斗争更为复杂，更为艰巨罢了。在“孤岛”时期的抗日救亡、民族自卫爱国运动中，许广平置身于斗争的前沿阵地，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投入了战斗。

当时居留在“孤岛”的妇女，固然有的害怕艰苦、危险，以“苟且偷安”和“明哲保身”为国难时期的处世哲学，有的出卖自己的肉体 and 灵魂，在红灯绿酒和爵士乐声中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然而更多的“孤岛”姊妹却在全民族抗战的炮声中觉醒。她们以陕北革命根据地和广大沦陷区的革命妇女为榜样，决心做大时代的苏菲亚，用鲜血和生命浇开民族解放的鲜花。她们积极参加慰劳、救护、征募、救济、战地服务等工作，表现了鲜明的民族意识和高昂的抗战情绪，使“孤岛”的妇女运动成为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一翼。当年曾有“害马”之称的许广平，

这时又像她学生时代那样,走上十字街头。她参加的战斗团体,公开的,秘密的,上层的,下层的,几乎包罗了政治、文化、群众、妇女各个领域。比如,她参加了以何香凝为首的抗日救国后援会(何香凝被法租界驱逐出境退走香港之后,她成为留守的三骨干之一)她参加了由教育、宗教界上层人士组成的聚餐会,常在觉林吃素餐,请来自延安的刘少文等同志分析形势,传达党的政策。她参加了茅丽英主持的妇女俱乐部。茅丽英后被敌伪暗杀,群众为她举行追悼会。许广平不顾情势的险恶,不顾朋友们的劝告,毅然赶去参加,就像鲁迅当年冒着生命危险参加杨杏佛的入殓式一样。她还参加了有孙冶方、何封等参加的读书会,有张宗麟、李平心等数十人参加的地下国民会议。她担任过中华女子职业学校校长,上海妇女救亡组织——中华妇女节制会的主席委员……她自始至终关怀和支持上海地下党领导下的两个妇女刊物——《上海妇女》月刊和《妇女界》半月刊。这两个刊物就像屹立在“孤岛”的一对姐妹哨兵,在联系妇女、团结妇女、推动妇女救亡运动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她带着羸弱多病的海婴到处奔走,义卖手工艺品,办难民收容所……为了捐助内地抗战将士,鼓舞沦陷区的人心,她还参加售卖国旗徽章。结果妇女界在一两天之内就把预定的数额销去了十分之八九,情绪空前热烈^①。

一九三七年冬,新四军在皖南宣告成立。由于蒋介石明着合作,暗中多方限制、破坏,新四军的物资极端困难。许广平在米价由伪币一千元一担狂涨至两百万元一担的艰难岁月

^① 参阅景宋《日帝占领下的血和泪》,见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现代妇女》十二期,以及柯灵《〈遭难前后〉新版序》。

中,购买了一百只手电筒捐赠给跟日寇浴血奋战的新四军将士。一九三九年二月,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逝世。许广平在党领导的《文献》杂志第六期撰文敬悼,“借资景仰,而作式崇”。她深深地缅怀列宁夫人七十年的革命生涯,勉励广大妇女学习列宁夫人超卓的能力、谦逊的态度、坚定的信仰、非凡的勇气及其为国家服务的最崇高的精神。

“孤岛”时期,比物资生活更为贫乏的是精神生活。由于日寇的文化统治,凡属与抗日有关的书籍、杂志和报纸均被查禁,甚至连包东西的报纸上有了抗日的记载也会被追究、遭捕捉。《救亡日报》、《文学》、《烽火》、《七月》、《抗战三日刊》等,首先停刊或移地出版。日本新闻检查所设立以后,《大公报》、《时事新报》和《民报》,也不能继续发行。留下的只有几家挂着外商招牌的报纸^①。著名的北新书店变成了酒菜馆,开明书店变成了“五金店”和“桐油店”^②。在日寇“钦定”的书刊上充斥着吹捧“大东亚共荣圈”的汉奸文字或描写变态性欲的色情狂文字。仅一九三九年,“孤岛”上演的六十多部影片中,色情、武侠、神怪古装片就多达五十四部,遭到广大群众唾弃。这一时期,许广平称之为“文艺工作者万劫不复的蒙尘时代”^③。

为了打破这种万马齐喑的岑寂局面,上海文化界地下党通过《每日译报》的《燭火》(后来是《大家谈》),《导报》的《晨钟》、《文汇报》的《世纪风》等副刊,团结了一批尚未撤离上

① 白屋《一年来上海文化界的总检讨》,见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译报周刊》一卷十二、十三期。

② 白华《变色的文化之街》,见一九三八年八月十八日《文汇报》。

③ 景宋《一封平常的信》,见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文艺复兴》一卷二期。

海的进步作家和文化人，开展了“孤岛”时期的文学运动。这一运动逐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国统区文学运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据不完全统计，“孤岛”时期许广平共在二十多个报刊上发表过约七十篇文章。与许广平发生关系的刊物中，有党领导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会刊《抗战文艺》，也有党领导下的“孤岛”进步报刊如《文献》、《鲁迅风》、《文艺新闻》、《译报周刊》等等。许广平跟“孤岛”时期上海文艺界的地下党组织联系十分密切。一九三九年春，“孤岛”上海有一个党领导下的“文艺中心小组”，召集人为王任叔，成员有戴万平、林淡秋、蒋天佐、钟望阳、蒋锡金等，每周定期在霞飞路路北的大三元茶室以茶会的形式开会，讨论“孤岛”文艺运动中的种种问题。许广平跟该组的成员王任叔、蒋锡金等保持了频繁的接触。一九四〇年冬，由于“文艺中心小组”有一半成员离沪，这一组织遂不复存在。于是，上海地下党变换了对文艺运动的领导方式，改为每周定期在翻译家满涛的寓所举行扩大的包括非党同志参加的“文艺座谈会”。这个座谈会，一直维持到太平洋战争发生。据楼适夷同志回忆，许广平也参加了“文艺座谈会”的活动。

许广平对党领导下“孤岛”文艺运动是大力支持的。当出版《鲁迅风》的金星书店收到署名“铁血扫共团”附有两粒手枪子弹的恐吓信之后，该刊原来出面的一些编辑人、发行人害怕了，要求在刊物上取消他们的名字，刊物面临着停刊的危机，而许广平仍将别人补译的《死魂灵》第二部译稿交该刊的终刊号发表，以示支持到底。又如上海文化界地下党创办的《奔流

文艺丛刊》创刊后，稿源、资金均感缺乏，渐渐出现了不景气。为了坚持这一阵地，有关同志决定将刊物改名为《奔流新集》，用征求预约户、收取预定费的方式继续出版。许广平对这一计划表示支持。她说：“发行预约的办法太渺茫了，你们缺少钱，可以从我这里拿去；要多少，开个口好了。总之要办起来，办好它。”后来，她又将鲁迅的佚文《势所必至，理所固然》以及“鲁迅雪峰及家属合影”交该刊发表，还亲自为该刊撰写了《鲁迅先生对批评的态度》《鲁迅先生在北平的反帝斗争》等文。这个刊物出版后一度在社会上引起了热烈反响。国民党顽固派恼羞成怒，扬言要用“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办法来加以“惩治”^①。

“孤岛”时期，许广平还在南洋的报刊上发表过一些文章和书简。自一九三九年一月至一九四一年一月，郁达夫受聘于新加坡《星洲日报》，占领了在海外宣传抗战的一个重要阵地。当时，许广平曾为《星洲日报》撰稿并代郁达夫在上海的进步文人中约稿，沟通了南洋文化和国内作家、文艺团体之间的联系，交流了海内外救亡运动的情况。比如，一九四〇年二月一日，她在《星洲日报》副刊《晨星》上发表了一则通信，题为“孤寡之声”。文章揭露那些国民党顽固派分子，在日寇入侵后摇身变为汉奸，在“孤岛”上海鱼肉人民，迫害爱国志士：“目前此地较一九二七年以后更不堪言。主持动手者，似仍为一九二七年以后的那一批人，真是驾轻就熟，再兼泰山重压，小民真如卵之易碎。目前有一蔡女士，不过做些妇女职业的要

^① 锡金《“左联”解散以后党对国统区文艺工作领导的亲历侧记》，见一九七九年八月《新文学史料》第四辑。

求，及为救济难民举办了一次义卖，也被惨致击毙。自此人人自危，大有生命不知何日丧之感。”

许广平“孤岛”时期的作品，内容大多是回忆鲁迅生平，研究鲁迅著作，阐发鲁迅思想，但也有一些是直接配合抗日救亡的宣传。比如当时“孤岛”的青年，有些人埋头苦干，每天做八小时以上的工，却不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有的阔气的公子哥儿，却穿着漂亮的西服，梳着油光的头，挨挨挤挤地在溜冰场、跳舞厅、游泳池、电影院出入。正如一首歌揭露的那样：“孤岛是困苦颠连者的地狱，孤岛是醉生梦死者的天堂。”许广平在文章中，号召那些“不知亡国恨”的苟安者抛弃眼前的享乐生活，在救国的过程中自救，争取做未来光明社会的主人。她要求这些青年人以延安陕北公学的青年为榜样，树立起自我改造的信心：“难道诸君怕吃不起苦吗？太没有自信了！眼前的事实，陕北公学等通信消息不是曾经告诉过我们，那边也不少昔日是阔气的公子哥儿，时髦小姐，初到时一切都比别人觉得辛苦，不多天就会都改变了，——不，得救了——和大家伙儿一同吃得起苦，一同坚强了意志，清楚了认识，武勇了体力了吗？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就在于是否能下决心。不肯抛弃目前的享乐，就没有资格参加未来的光明的社会。”^①一九三九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为母亲节，许广平撰文号召：“纪念母亲节，家庭妇女一致起来参加抗战工作，争取最后胜利。这是今年最急需的任务。”^②一九三九年四月十四日，上海《文汇报》

^① 许广平《给上海的青年朋友》，见一九三八年十月十日《译报周刊》。

^② 景宋《纪念母亲节》，见一九三九年五月十四日《星洲日报·妇女界》。

副刊《世纪风》发动过一次热烈广泛的“献金运动”，号召作家义务写稿，用稿酬支援抗日部队的战士和救济颠沛流离的难民，名为“文艺工作者义卖周”。这一倡议首先得到了许广平的响应，四月十五日夜，她投寄了一篇描写各界人士踊跃募捐物品支援抗战的散文——《输将》，声明要将该文的稿酬捐献。她还把这几天节省的菜金十元随稿附呈，作为捐款。许广平在给该刊编者信中诚恳而谦虚地说：

××先生：

顷奉到十四日征稿启事，刚刚在患感冒伤风，限期又只两天，不能拖延，而且既然由先生起来号召这《义卖特刊》，站在公义友情两方面，都不能推却的，就在今晚胡乱写些塞责，写得不好自是问题。

为补救计，文稿太不成样子，则径行抽下，好在这些天节下菜钱拾元，现并附呈，当作《义卖特刊》稿费何如？

许广平上

四月十五日晚^①

许广平的行动，带动了广大文艺工作者。正如白曙、锡金等在《义卖运动》一诗中所说的那样，是用“自己的慷慨，感应更多人的慷慨”^②。编辑部收到的义卖稿件源源不断，“义卖周”活动欲罢不能。直到五月十八日《文汇报》被迫停刊，

①《景宋先生来信——捐款十元》，见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四日《文汇报·世纪风》。

②《义卖运动——向全上海市民号召》，出处同上。

这一持续了四周的活动才只好中止。

许广平“孤岛”时期的最大贡献，是不但在兵燹战祸中历尽艰辛地保存了鲁迅遗物，而且还编辑出版了堪称皇皇巨制的《鲁迅全集》和《鲁迅三十年集》。特别是《鲁迅全集》的出版，震撼了上海和全国出版界，博得了广大读者的崇高赞誉。

鲁迅去世不久，许广平携海婴迁居至上海霞飞路霞飞坊六十四号。抗战全面爆发后，她冒着生命危险毅然留在沦为“孤岛”的上海。当时，党组织考虑到许广平的安全，曾经建议她转移至苏北新四军开辟的根据地。也有友人劝她以教书作为掩护，到南洋去搞党的工作。但许广平坚持留在上海。她不止一次地说：“我这一个家，丝毫没有贵重的物品，在有些人眼里是看不起的。但我把这里的一桌一椅，一书一物，凡是鲁迅先生留下来的，都好好地保存起来。这不是我的私产，这是革命的财富，是全中国人民的财富，是要了解这一时代的文化，要了解鲁迅生平和业迹的人们的财富。当然请别人看守也许有可能的，但是倘使连我也不能看守而要求别人冒着生命危险看守这些遗物，是没有理由的。由此我不敢在任何危难的时候交托任何人。”

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保存鲁迅文稿的最好方式是出版。正如俗语所说：“纸张寿于金石。”早在一九三六年，鲁迅即有意自行编印《三十年集》，包括他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三六年间的著述，共二十九种，计三十巨册。为此，鲁迅曾手定其著述目录二纸。鲁迅去世之后，“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就曾考虑以《三十年集》目录为基础，补充鲁迅译著及《汉文学史纲要》、《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等早期著作，准备刊行二十卷的《鲁

迅全集》。《全集》目录由许广平编好，于同年十一月报送国民党内政部审核登记。但由于国民党宣传当局妄图对《全集》拟收的有些文集（如《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二心集》、《毁灭》）和有些文章（如《华盖集》中的《十四年的读经》，《三闲集》中的《太平歌诀》、《铲共大观》等）横加砍伐，有些杂文集也被勒令改名（如《准风月谈》改为《短评七集》，《花边文学》改为《短评八集》），公开、完整地出版《鲁迅全集》已不能如愿。鲁迅去世周年纪念日，出席上海浦东大厦座谈会的人士希望能在最短时期内促成《全集》的出版。会后不到一月，上海即遭沦陷，《全集》出版工作又被搁置。虑及鲁迅手稿遗物有可能在炮火中毁于一旦，许广平忧心如焚，焦虑万状。

最后完成出版《鲁迅全集》这一浩大工程的，是党领导下的出版机关——复社。

复社成立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它的倡议者是胡愈之，成员有许广平、周建人、郑振铎、胡仲持、张宗麟、黄幼雄等二十人。它没有铺面，也没有老板和伙计。成立之初，社员每人拿出五十元，凑成一千元，作为该社开始活动的经费^①。当时，上海租界有雄厚的印刷技术力量。由于战争的进行，许多印刷工厂关门，大批印刷工人失业，纸张也随之跌价。利用印刷成本降低这一特殊情况，复社冒着风险，尽力出版了一些进步读物。它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史诗般的报告文学作品——《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这部二十万字的巨帙，从翻译到出版，仅用了二个多月时间，共销售了两千部，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这一成功，奠定了

^① 郑振铎《记复社》，见《蛰居散记》。

复社在文化出版界的地位，进一步鼓舞了复社成员的斗志。这就为后来出版《鲁迅全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做好了必要的准备。

出版《鲁迅全集》的决策，得到了上海地下党组织的积极赞助。当时在上海联系这项工作的是从延安派来的刘少文同志。他专为此事请示过党中央，得到党中央的同意。但是，出版《鲁迅全集》的困难远比出版《西行漫记》大得多：这套书最初估计字数不过五百万字，编成之后增加至六七百万字，在编辑出版过程中，纸价又涨了一倍。因此，出版《全集》所需的昂贵成本费，就复社本身的经济力量来说，是很难承担的。为了克服这一困难，复社采用了预约售书的办法。除发行预约价八元，售价十二元的普及本外，又另印两种纪念本：甲种本布面精装，每部五十元；乙种本皮背烫金，每部一百元。纪念本的盈余，用来弥补普及本的亏损。预约售书的办法得到了数百位进步读者的热情支持。当时周恩来同志领导的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也努力推销，一次就售了二三百部，得到了几百块钱。最后，普及本预约达二千三百部（其中上海约一千部，内地各处一千三百部），纪念本共销去一百五十部，这样就顺利解决了出版《鲁迅全集》的经费问题^①。

《鲁迅全集》的编校工作是从一九三八年四月开始的，主持编校的是许广平和王任叔。出版《全集》首先要做搜辑工作。当时许广平在各方面人士的大力协助下，很快搜集到许多已刊、未刊的鲁迅著作，并加以分类、整理、抄写、编辑。而主要依

^① 复生《〈鲁迅全集〉刊行的经过》，见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九日汉口《新华日报》。

据的就是鲁迅生前手订的“三十年集”编目，加上搜集起来的翻译作品，按各书的性质分作二十册。除了一部分用原稿抄件发排外，大部分是用初版本发排的。据当时参加校对工作的蒯斯曛回忆：“担任校对工作的十个人，五个是业余的，五个是专职的，各个校次和看清样也恰巧都是业余和专职各半……专职的五个人中，许广平先生最忙，她日夜校着二校，还不断地为我们找鲁迅先生的原稿或作品的初版本，来解决疑难。她那种对鲁迅先生作品的每一个字的负责精神，她那种细致认真的工作态度，常常使我十分感动和佩服。”^①

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五日，一部收集完备、售价低廉的二十巨册《鲁迅全集》，经过百余名学者、文化人、工人四个多月的共同努力，终于在敌伪环伺侦察下奇迹般地全部出齐了。不仅《全集》的纪念本堪称中国印刷术上的美谈，而且普及本也达到了朴实、美观、实用的境界。这部《全集》是围城之中的思想灵光，是“孤岛”文艺沙漠上的甘泉。它虽然不是编辑出版者本身的著作或译品，但它给编辑出版者带来的欢欣却远远超过了出版他们本人的译著。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九日，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上海的许多作家、编辑，文化人仍旧在一座小洋房里坚持召开了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会场布置庄严肃穆。在鲁迅遗像前，放着一只用夜来香扎成的花篮。遗像旁的书架上，放着《鲁迅全集》甲、乙两种纪念本^②。许广平致词，她说：鲁迅先生生在压迫里，

^① 蒯斯曛《回忆〈鲁迅全集〉的校对》见一九五六年十月《文艺月报》。

^② 乃一《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会》，见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申报·春秋》。



死在压迫里。他逝世二周年纪念日到了，但我们却不能到他墓前去凭悼。他的墓地，非到抗战胜利收回失地之后我们才能自由祭扫。在先生棺木上面覆盖着一面“民族魂”的旗子。那就是说：他的整个生命，就是为唤醒和发扬民族魂。抗战到今天，已经十五个月了。在这伟大的抗战中，我们继承他的遗志，不投降，不屈服，一直在工作，工作……试看：《鲁迅全集》在重重困苦的环境中靠了许多朋友的合作帮忙，居然出版了，这就是很好的说明。^①

同日，周恩来在武汉出席了由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鲁迅先生纪念会共同召集的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号召大家学习鲁迅为真理正义而倔强奋斗，至死不屈的精神，坚持长期抗战，坚信最后胜利^②。也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向许广平拍发了慰问电：“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开会中，适逢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日，扩大会全体追念先生对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与对文化运动伟大的贡献，深切表示敬意。当此民族危急之际，除全体静默追悼外，特电慰问。”^③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许广平在同月出版的《文献》第二期上发表了《关于汉唐石刻画像》一文，而在同期杂志上，首次公开发表了毛泽东一年前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词。毛泽东在讲演中分析了鲁迅的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指出这三个特点形成了一

① 桂芳《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见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上海妇女》二卷二期。

② 《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昨日下午在青年会举行》，见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日汉口《新华日报》。

③ 原载一九三八年十月三十一日延安《解放》半月刊第五十五期。

种伟大的“鲁迅精神”。“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使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党的领导人的教导、慰勉,像宝石般灿烂的明星,闪耀在“孤岛”的茫茫夜空。它照亮了许广平的心,给她以继续战斗的勇气、信心和力量……



第八章

中华民族的女战士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飞机偷袭美国海军重要基地珍珠港，同时又进攻马尼拉、上海、马来、暹罗、香港。太平洋战争由此揭开序幕。八日，日军在马来东北部登陆，并由法属安南侵入暹罗。同日，日军开进上海租界，上海全部沦陷，“孤岛”时期结束。十二月十一日，上海各报刊登了日方发表的谈话，表示此次作战的目标是英美，对中国人予以“优待”，即使抗日分子也可以“宽容”，云云。有些友人对许广平说：“你可以不走，因为你向来就没有做甚么事，而且日本人对鲁迅先生也很尊重，绝不会对你怎么样。”但是，灾难的预感像一片乌云时刻笼罩在许广平的头顶。她没有被敌人的花言巧语所蒙蔽，也没有因友人的好心宽慰而放松警惕。为了防止灾难的突然袭击，她事先做好了两方面的准备：一是把亲友的通讯处转移到别处，倘有意外，可使他人不受牵连；二是把小海婴托付给朋友照顾，如有变故，免得敌人斩草除根。

事态的发展证明许广平所做的准备并不是过虑之举。十二月十五日凌晨五时，即日军进驻上海租界一星期之后，十余名日本宪兵队的便衣和若干旧法租界巡捕房直辖人员，共二十三人，在一个叫佐佐木德正的戴眼镜的日本宪兵带领下，狼奔豕

突，冲进了许广平霞飞路寓所。

“你姓什么？”“眼镜”用中国话发问。

“姓许。”许广平沉静地回答。

“叫什么名字？”

“逸尘。”

“还有什么名字？”

“广平。”

“另外还有没有？”

“景宋。”

“还有没有？”

“没有了。”

其实，许广平还有其它一些写抗日文章时使用的化名。为了不給这些野兽增添材料，她第一次开始“撒谎”。“撒谎”，本来是为真诚纯厚的人们所不耻，但鲁迅说过：“压迫者指为被压迫者的不德之一的这虚伪，对于同类，是恶，而对于压迫者，却是道德的。”^①许广平记住了这一至理名言。在被捕过程中，“撒谎”就成了她迷惑敌人，保全同志的斗争武器。“眼镜”把许广平的“谎言”当成了真话，满足地说一声：“对了。”接着开始搜查。

第一个搜查目标是那一米多高的书橱。这里放着许广平随手翻看的新书以及朋友们赠送的译著——上面有他们的亲笔签名。另有一部《鲁迅三十年集》和一包《鲁迅日记》（一九一二至一九三六年）手稿。当时李霁野先生准备在北方筹备一个文艺刊物，他要求许广平将鲁迅日记的誊抄件寄一份来发表，一

^① 鲁迅《陀思妥夫斯基的事》，见《且介亭杂文二集》。

来可以给北方的爱国青年以精神感召，二来可以使得鲁迅日记长远流传，免遭不测^①。为此，许广平特意找出鲁迅日记来抄录，已抄至一九一四年，且在上海报刊上发表了一小部分，不料这次却被敌人拿走了。后来发还时，竟丢失了其中一九二二年的一本。出于保存鲁迅日记的目的，反使日记遭到损失，许广平和李霁野为此久久感到不安。

搜完书橱，敌人又逐一搜查了抽屉，前后长达两小时之久。晨七时，敌人把许广平押上了一辆无篷的空货车，还抄走了两大包东西，里面除了《鲁迅日记》手稿，还有一部《鲁迅三十年集》，鲁迅、许广平和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的十余枚图章，以及《上海妇女》等书刊，就连海婴的一本简陋的集邮簿也成了侦察的资料——因为里面搜集了各国邮票（发还时有一些苏、英、法等国的稀有邮票被敌人撕了）。

利用被捕前的间隙，许广平赶快拿出一瓶治气喘的药，走到尚未起床的海婴跟前，嘱咐他发病时及时服用；同时趁机暗示他，一旦出事，就按预先准备立即告诉王任叔同志的爱人——她跟很多进步文化人熟识，可以通知大家迅速转移。后来王任叔的爱人用电话通知有关朋友时，被她的二房东听见。二房东怕牵连，逼她搬家，她只好带着两个孩子回乡去了。

押解着犯人的空货车在金神父路的一所大宅前停下来，“犯人”们被驱遣到这里先进行一次登记。接着重新押上车，兜了好几个圈子，开到了阴森森的日本宪兵队总部。这是人间的地狱，是禁锢和死亡的世界；也是反抗者的栈房，冶炼钢铁意志的炉膛。

^① 李霁野《关于鲁迅先生的日记和手迹》，见《纪念鲁迅先生》。

许广平先被押进一间普通亭子间大小的房间，重新填写了一张表格，交出了手套、手表，随身带的一百多块钱，最后连裤带也给收了。办完这些手续，许广平作为“囚徒”被领到另一间办公室。大约上午九点钟，一个满脸横肉的叫奥谷的曹长开始对她进行审讯，照例先从姓名、籍贯、学历问起，一问一答，一答一写，一直持续到晚九时。“横肉”疲惫了，把许广平押出办公室，推进了后院朝北有两扇漆黑铁门的牢房。

关押许广平的是五号囚室。里面只有上海普通客堂间一般大，但关押着四十六七个囚徒，男女混杂，像沙汀鱼一样并排躺在地板也是铺板上。囚室北面是厕所，南面躺着一个遍体水肿、脓血直流的垂死的犯人。许广平挤在西面四五个女囚徒之间，左面传来毛厕的臭味，右面传来脓血的臭味。闻着这种回想起来都叫人呕心的奇臭，本身就是一种难熬的苦刑。晚上，犯人盖的是一层薄薄的破旧棉布毡。清晨四点起床后，犯人集体围着两个装酱油的旧木桶洗漱。吃饭用的是齷齪的筷子和脱了磁的洋磁碗，吃的是米麦混合物，冷冰冰的，每餐一小碗。改善伙食的时候，偶尔也吃些鱼肉，不过鱼的肠肚都没有清除，放在饭上腥臭扑鼻；肉是死军马肉，黑而且硬，每人只能分到一两小块。囚徒中也有破格受到优待的，大多是日、韩籍人。据老囚徒说，他们往往并不是因为犯法被关押，而是负有监视其他囚徒的秘密使命。在五号囚室，有一个二十多岁的中国士兵，因为暗杀日本宪兵而被捕，被打得晕死过去六次，但什么真情都没说。他向许广平介绍对付敌人的经验：“最要紧的是前后口供一致。实在应付不了的时候，就是哭哭啼啼或夸大些痛苦也不要紧，像你们女人最好应付。”这种从书本上学不到

的东西，给许广平以极大的启发。

每天上午九时左右，是提审的时间。许广平被捕的头四天，敌人轮番施展了“欺，吓，哄，诱”种种手法，毫无效果。第五天，“横肉”开始动武了。他先用拳头猛击许广平的头部，接着用他那黄皮马靴狠踢过来。最后强迫许广平脱去外衣，只剩小衫裤，用皮鞭狠命抽打。受刑之后，许广平两眼肿得像青紫色的核桃，被马靴踢过的大腿结成硬块淤血，身上留下了道道鞭痕。敌人疯狂跳踉，使许广平知道了她被捕的真实原因：原来是要通过她追查抗日知识分子和出版家的线索。许广平与进步文化界的广泛联系和她不堪刑辱的体质，使敌人把她当成了理想的突破口（翻译偷偷对许广平说，只要她能提供上海进步文化人的情况，就可以被释放）。然而，利令智昏的敌人错误地估计了对手。即使在受刑最苦的时候，许广平也始终恪守着“牺牲自己，保全别人，牺牲个人，保存团体”的信念。当“横肉”把三尺长的军刀架在她脖子上的时候，她心想：“大不了一死！决不能出卖那些对祖国竭尽忠贞的义士。”当敌人以“剥光衣服拉到南京路游街”相威胁的时候，她料定这不过是恐吓。她想：如果有血性的中国人看到自己的儿女，姊妹，被敌人凌辱到一丝不挂去示众，这将是暴露敌人、唤起民众的宣传资料。真有这种机会，她不怕！这样，敌人进行了一天刑讯，结果是一无所获。

第八天的上午，许广平经受了一场更为严酷的考验，这就是受电刑。“横肉”在许广平的手脚上套上一双马蹄形的铁圈，连上两条电线，接在一个六寸高的黄木匣上，而后通电。电流带着滋滋声通过马蹄形的铁圈传遍了许广平的全身，她的每个

细胞都遭到电的炙烧,每条神经都遭到电的刺激。每一阵通电,她都感到一阵剧痛,一阵昏眩。电流在加强,许广平的怒火也在升腾。她下定决心:“去罢,大不了一死,敌人别想从我这里得到一点情报!”敌人施一次电刑,逼一次口供,前后共十几次,从上午九点一直审到下午,许广平没有牵连一个朋友,没有供出一个组织;没有说出一个刊物的内容和背景,充分表现了临危不惧,凛然不可侵犯的革命骨气。一个在旁观看的日本军曹恼羞成怒,把电流加到了最大限度。这时,许广平反而觉得平静下来,因为她已处于濒死状态。无计可施的敌人,只得恶狠狠地再把许广平拖进囚室。受过电刑之后,许广平总想呕吐,但又吐不出来;头痛欲裂,几乎抬不起来;全身骨节发酸,喉咙干痛,两个膝关节各留下了一块橄榄一样大小的焦痕。

第十天的夜里,许广平被转押到一号囚室。这里只关了三十多个人,比五号囚室干净一些,也宽松一些。但敌人的审讯并没有放松。“横肉”问得越来越广泛,越来越仔细。凡是一本作者签名赠送的书,他一定要追问作者的情况,跟作者认识的过程,作者当时的住址,等等。如果一位作者赠送了两本书,他就要追问哪本书送在前,哪本书送在后。如果许广平的回答和书的出版年月不符,那就会成为莫大的把柄。这样,每问一书就如同过一关,十本书就得过十关。对每本书都要预先编造一套应付之词,而且要经得起敌人反复盘问。不然,稍有漏洞,前面的口供就会被全盘推翻。为了有效地跟敌人斗智,许广平吸取了那位中国士兵的经验:“最要紧的是前后口供一致。”在受过电刑头昏脑胀的情况下,许广平每天晚上仍坚持将白天的口供重温一次,把它背得滚瓜烂熟,像私塾的生徒将书本倒背

如流一样。即使敌人突然发问，她也能做到应付裕如，不露破绽。因为她的嘴就是战友的安全线。她要竭尽全力守住这条安全线！

从十二月十五日开始，到十二月三十日为止，审讯在翻来复去地进行。最后，“横肉”拿出一张纸，一支笔，叫许广平写下被捕后的“感想”。写什么呢？悔过？绝对不！服辩？更不！许广平只在纸上写了这样的话：“我从来没有做坏事，只望快快恢复自由，使得我可以好好去照顾孩子。”敌人实在榨不出什么口供，只得将为期半月的审讯暂时告一段落。^①

十二月底，许广平从一号囚室迁到了关押刑期较长的政治犯的新囚室。这里房间较小，关的人也较少。跟许广平同室的是十来个女犯，其中有一个英国人，一个美国人。一九四二年元旦，每个犯人喝了一碗红豆汤，十几个人分吃了两只橘子算是度岁。喘息了两三天之后，许广平就被带去“参观”审讯其他犯人。这一阶段，敌人正在外面调查她的材料，核对她的口供。

一月下旬，许广平又迁到一间旧式楼房改建的囚室。女囚室只有八九个人。每天上下午，有两次到天井放风的时间。这时可以跑步，也可以做操。抓紧这一时机，许广平使劲活动她的肌肉和筋骨，就像笼里的鹰，为迎接飞翔的日子而梳理羽翼。她认为，没到非死不可的时候，就应该排除万难活下去，争取

^① 许广平一位难友陈正一九六八年三月四日在悼念许广平的文章中写道：“那时，有一个北京大学生，还有一个姑娘杨影，我们三人盘坐在你的身边，你老人家的态度是多么明朗、乐观！意志是那么底坚定不移！我们与日本军国主义势不两立，决不低头屈服，何论威胁利诱都不起作用！任可受他们皮鞭的抽打，上电刑也没什么可怕！关进高过人头的猪犬笼子里，也不会动摇我们的爱国立场！”

最后胜利的前途，争取亲眼看到敌人的末日。这跟在敌人严刑逼供时持“大不了一死”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

春节到了。大年初一，一连三顿都是酸臭的剩饭，据说是为了让犯人在春节中能更好地反省。同室的犯人一个个被叫走了，后来只剩下了三几个人。终于有一天，即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许广平被带出了囚室，发还了她带来的物品和抄走的两包东西，而后跟七个男难友一道被便衣宪兵押上了一辆货车。车子循着四川路朝南开，到了南京路转向西，驶到了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一个叫“调查统计局驻沪办事处”的汉奸特务机构。日本宪兵把许广平移交给了一个穿黑长袍的小个子就走了。

下午，“小个子”——像是直接负责的人物——叫许广平十个手指都按上油墨，在一张表格纸上打上手印。然后拍照，拍完正面，又拍侧面。“小个子”问话了：“你有没有熟识的店铺可以做保？”许广平想，中国店铺不适宜给这种地方做保，于是说：“我在上海这些年，最熟的是内山先生，他做保可以吗？”“小个子”说：“顶好不要东洋人做保，你再想想看。”这时，许广平虽然希望尽快获释，但为了不使同胞受到牵连，坚持说：“想好了，还是只有内山先生认得，因为我是一个女人，认不得许多商店。”“小个子”投有法，只好允许许广平跟内山书店通了电话。当晚，“小个子”又把许广平带进一间房，里面有七八个人。他们叫许广平写下被捕经过。许广平想，如果敌人将她写的东西加以窜改，改成服罪自白之类的东西发表出来，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她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什么东西也不想写。”

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两三点钟，“小个子”又来提许广平，说是对保。这时，许广平看见了内山完造先生和内山书店的中国店员王宝良。她再也遏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水就像开了闸一样，涌出了眼眶。内山先生和王宝良也情不自禁，热泪夺眶而出。办完保释手续，又过了一天，在三月一日下午，被关押了七十六天的许广平终于恢复了自由。这一天，正巧是阴历元宵佳节。^①

回到家中，许广平先用热水洗净那长满虱子的头发，浑身感到轻松了许多。夜幕低垂，她偷偷来到周建人先生家，请建人先生通知一切朋友暂时不要来看她，她也暂时不到其它地方去，以免被暗中监视的敌人发现。在建人先生家里，许广平跟分别两个半月的爱子海婴团聚了。原来王任叔同志的爱人下乡后，海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住到了建人先生家里，使用一个假名——周渊，入学读书了。母子重逢，悲喜交加。许广平接回海婴，就开始焚烧那些可能再招惹麻烦的书籍、照片和文稿。为了继续斗争，她还请来杨素兰医生治疗坐牢、受刑后的后遗症：心脏衰弱，血压高、精神兴奋、贫血……她要坚持治疗下去，使身体逐渐强壮起来，去承担她应该担负的工作。

四年后，许广平将她狱中的这段经历写成了《遭难前后》一书，连载于一九四六年的《民主》周刊。一九四七年，又由上海出版公司印成单行本。书中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夸张的情节，但通过朴素的语言和真实的叙述，却把许广平坚贞的政

^① 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手稿本）中谈到，她出狱后，内山完造骗她出席了一次有汉奸文人参加的茶话会。经费由汪伪政权给内山完造颁发的文化奖金中支出。

治节操、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及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栩栩如生地勾画出来。书中的一字一句，有如一个个高亢的音符，奏出了革命正气歌的壮美的旋律，谱成了大时代乐章中的一个动人音节。郑振铎在该书《序言》中对许广平的英雄事迹给予了崇高评价：“她以超人的力量，伟大的牺牲精神，拼着一己的生命，来卫护着无数的朋友们的。这是一位先驱者的大无畏的表现！这是中华儿女们的最圣洁的精神的实型！她在抗战初期的时候，曾尽了说不尽的力量，加入了好些重要的团体，其中之一是复社，还有一个上海人民团体的联合的救亡组织。这些组织的分子，人数很多，全靠了她的勇气和牺牲，得以保全着。”这本书也激起了广大读者对法西斯的仇恨和对许广平的钦仰。一位读者说，许广平用她忠贞不屈的行为向敌人明确而严正的宣示：“中华儿女是不受刑戮的威吓的。”^①另一位读者联系许广平后来跟国民党当局斗争中的表现说：“我想，在现在民主运动中，她所以显得那样英勇，那根源实在是深远的。”^②广大读者还表示要学习许广平的崇高品质和斗争经验，以“死的决心”和“韧的磨炼”来迎接民主革命艰难阶段的严峻考验。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夏衍带来了一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慰问上海文艺界书，代表大后方及解放区的作家和文艺工作者向许广平等在敌人铁蹄下坚持斗争的上海文艺战士表示敬意。信中说：“八年以来，诸位先生在敌人包围之中，继而是在敌人的直接的屠杀威胁之下不屈不移，备尝辛苦，为

^① 田枫《〈遭难前后〉教给我们的》，见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文汇报》。

^② 海宇《以景宋先生为师》，见一九四七年六月九日《时代日报》。

中华民族保存了崇高的气节，中国人民以诸位为光荣，中国文艺界以诸位为骄傲。”^①同年十月十九日，姜椿芳、许杰等十人在致许广平信中说：“……自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占了上海这一串灾祸的日子，你屹立在斗争线上，受尽了艰难，尝尽了辛苦，进过了牢狱，做过了人质。我们敬佩你，我们爱护你，我们一时一刻没有忘记你，像我们永远纪念鲁迅先生一样。目前中国革命的道路虽然仍旧艰苦，将来还更艰苦，但我们青年必定能够克服任何一切艰苦，使鲁迅先生未竟的革命事业彻底完成，以报偿你以及全国革命先烈所遭受的苦难与牺牲。”

^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慰问上海文艺界书》，见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周报》第四期。



第九章

为和平民主而呼喊

夜茫茫。没有月，也没有星。死样的沉寂，勾起了人们的睡意。突然，一阵喊声把这空虚的夜幕突然掀起，从各家窗口探出了一双双好奇的眼睛。接着，弄堂里传出了嘈杂的人声。敏感的海婴对许广平说：“一定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母子俩再也睡不着了，一同走出了家门。

“甚么事这样热闹？”他们好奇地询问。

“和平了！胜利了！日本政府发出了乞降照会。听说是晚上六点签的字！”人群中传来了回答。

这一天大的喜讯，像一股春风，顿时吹散了许广平脸上的愁云。她笑了，开心地笑了，一边流淌着百感交集的眼泪。海婴在旁扯着她的衣袖，关切地问道：“怎么啦？妈妈，你……”

是啊，年少的海婴怎能全部理解许广平此刻潮水般奔涌的感情：整整八年了，好像是一场连续不断的恶梦。在梦中，她饱尝了种种酸辛、磨难、痛苦、压迫，在梦中，她也无时无刻不在憧憬着胜利一天的到来。那一天，她可以亲临墓草萋萋的鲁迅坟地凭吊，向鲁迅倾诉她八年的一切遭遇，她可以把冒着生命危险大致保全下来的鲁迅遗物运到北平，在鲁迅生前手置的寓所里集中陈列，供人们瞻仰、研究；她可以跟共过患难的

朋友们握手叙旧，畅谈斗争的经历与感受……这在脑海中酝酿已久的美丽的一幕，就要真正展现在她的眼前了。在这民族复兴的曙光初露的时候，许广平甜蜜的泪水怎能不伴随她巨大的欢乐夺眶而出呢？

人们发狂似地涌上街头，欢呼跳跃。数不清的笑脸，望不尽的胜利旗帜。欢声笑语，鼓掌声，鞭炮声，汇成了一支胜利的凯歌，在这狂欢之夜高奏。这时，大约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晚十点左右。

然而，抗战胜利后的现实，使在敌后长期坚持斗争的上海人民很快就陷入了深沉的失望。痛历沧桑、饱经忧患的人民原本希望能过上自由幸福的日子，建立起一个人民大众的、和平、民主、独立的新中国。但是，在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而又尚未实行投降之际，蒋介石就在美帝国主义武力援助下，垄断接受日本投降的权利，并且借口受降，调运大军向解放区进逼，妄图把人民重新推入内战的血海，以实行其法西斯独裁的一党专政。那些蝗虫般飞到上海的接收（劫收）大员只要“五子”（金子、车子、房子、女子、票子）登科，不顾人民死活。大小汉奸一个也不拿办，有的甚至摇身一变，重新飞扬跋扈起来。物价在一天天狂涨，米每石价逾五万，煤每斤亦超百元，就连号称富庶之区的上海，也有朝不保暮之虑。许广平家的房租，原来每月两万中储卷，到一九四五年十月，竟增至二千五百元法币——折合中储卷五十万，即增加了二十五倍。每当夜间，离许广平寓所不远的林森路一带，常常传来濒死的饥民凄厉的呼救声。这声音像利刃般地戳着她的心，使她感到凌迟似的痛楚。

面临这种严重局势，上海地下党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进行了两方面的准备：“一方面开展广泛的爱国民主的统一战线，团结上海各阶层人民，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反对国民党独裁，要求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另一方面准备应付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配合解放军的自卫战争，保卫解放区，保卫上海人民的生存、生活和民主权利，保卫抗战胜利的果实。”^①在党的领导下，鲁迅生前不大公开露面的许广平以社会活动家的身份积极投入了战斗。由于她跟鲁迅“千年携手”的光荣经历以及在沦陷时期的英勇表现，成为了上海妇女运动、民主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抗战胜利之后，许广平首先投入了肃清日本法西斯残余势力的斗争。她指出，急不可缓地肃清日本法西斯的残余势力，好比及时消灭潜伏于人体的癌细胞。如果姑息养奸，必将贻患无穷^②。为此，她呼吁尚未解除武装的百余万日军赶紧从中国领土上撤除干净，“严惩那一批惨无人道的战争罪犯”，要求他们“充分赔偿国内文物图籍与财产土地的损失”^③。根据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的委托，许广平、郑振铎、李健吾三人负责约集上海文艺界进步人士，着手调查文化汉奸的罪行。许广平等二十四人在复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信中说：“至于调查文化汉奸，我们正在设法进行，并在各刊物中发动言论，严

① 张承宗《解放战争时期上海的人民革命运动》，见上海《文史资料选辑》《上海解放三十周年专辑》（上册），一九七九年五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 景宋《中国的癌》，见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民主》周刊第九期。

③ 许广平等三人《我们对于处置敌日在华军商人的意见》，见一九四五年十月六日《周报》第五期。

正检举。我们相信，只要全中国人民不忘记这八年的苦战，创巨痛深，绝不会轻易饶恕汉奸的，尤其文化汉奸，以其歪曲言论，毒害国民思想，强颜事敌，卑鄙恶劣，无所不用其极，此间文艺界同人深明除恶务尽之理；撻奸发伏，不敢后人，誓当为中华民国洗涤这一奇耻大辱。”^①同一时期，许广平在刊物上发表了《不要中计》《因纪念想起》《中国的癌》等文，为惩奸工作大造舆论。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云南昆明的国民党军队和特务屠杀反对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学生和教员，南菁中学教员于再，西南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昆华工校学生荀极中四人惨遭牺牲，被暴徒狙击围打致伤者尚有十余人，酿成了震动全国的“一二·一惨案”。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上午九时，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三万余人在沪西戈登路玉佛寺大雄宝殿前的广场上公祭昆明死难烈士。柳亚子主祭。主席团由宋庆龄、马叙伦、许广平、郑振铎、金仲华等组成。与会群众悲愤填膺，要求严惩凶手，制止内战，消灭法西斯，实现真民主。会上散发了许广平撰写的《挽于再先生》：

.....

安息吧，

于再先生。

争自由的火炬由你燃烧起来了！

我们会继续接取你的火炬，

^① 许广平等《上海文艺界复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书》，见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周报》第七期。

而奔驰的。

为民主的光，亮起来了，

我们不再在黑暗里摸索而行。

把我们领向光明路前进的，是你！

于再先生，我们永远记得你的。

会后举行了游行，四人一排，绵延两里。许广平高呼着“反对特务统治”“建立联合政府”等口号行进在洪流般的队伍中。这场斗争，揭开了解放战争时期上海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序幕。

进步妇女运动，历来是人民革命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妇女运动的中心在重庆。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五日，中国妇女联谊会在重庆成立，主张坚持抗战到底，结束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实行民主政治。参加该团体的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民主妇女三百多人。抗战胜利后，该团体的骨干分子分赴各地（其中大部分人到了上海），相继在上海、重庆、北平、南京及香港成立了五个分会。中国妇女联谊会总会基本上停止了活动，国统区妇女运动的中心由重庆转移到了上海。中国妇女联谊会上海分会有一百多名会员，有组织机构，有经常工作，是一个严密的政治实体。许广平被举为中国妇女联谊会上海分会负责人，分会核心小组成员还有胡耐秋、郑倚虹（德音）、罗叔章、胡绣枫等，大部分都是当时的地下党员。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下属的工委、学委、妇委领导支持下，又成立了上海市妇女联谊会。这是一个广泛的群众性的妇女

团体，参加者不是个人会员，而是团体会员（包括四十二个单位，下属女工、职业妇女、女学生、家庭妇女五万多人）。该会也推举许广平为负责人。与该会联系的地下党员有王辛南、蒋学杰等。

一九四六年三月八日上午八时，由上海妇女联谊会主持，在兆丰公园召开了一个盛况空前的妇女集会，参加者有女工、女生，家庭妇女、职业妇女数万人。许广平担任大会主席。她在开会词中说：这是抗战胜利后第一次纪念三八节。参加者如此踊跃，令人极为振奋。希望广大妇女团结起来，坚持和平，积极建设，加速生产，遏止战祸，为实现民主政治，建设一个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而努力。上午十一时，与会群众举行了大游行。队伍整齐严密，浩浩荡荡；歌声口号，响彻云霄。许广平走在队伍的最前列，表现了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在这种紧张热烈的群众情绪之下，妄图破坏游行的军警特务束手无策。下午三时，队伍一直走到外滩公园，才唱歌散会。这次游行，不仅在长期生活于沦陷区的上海妇女身上注入新鲜的政治血液，同时也给国统区的广大妇女姊妹以巨大的鼓舞。许广平在上海妇女运动中的主持者地位也由此奠定。

周日，上海妇女联谊会发出致全国妇女电，提出了十项政治主张，包括：拥护政治协商会议五大决议；彻底执行停战协定，用和平民主的政治方式解决东北问题，提高劳工妇女之教育，救济失学女生；救济失业女工；妇女要有参政权利；大规模举办妇女福利事业，等等。电文说：“新中国的建设急待全国人民的努力，占着人口半数的妇女无疑负有一半责任，如果妇女仍处在被压迫的地位，中国的民主建设就无法完成。……

我们愿追随全国姊妹们之后，为中国的和平建设、与妇女之自由解放而努力奋斗。”^①

一九四六年三月，国民党召开二中全会，公开推翻同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有利于和平、民主、团结的决议，并准备在同年五月召开分裂的独裁的伪国民大会（后来伪国大于同年十月召开）。他们物色的伪国大妇女代表，大多数是右派和中间偏右的人物，根本不能代表广大进步妇女。为了揭露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国大、公布宪法的阴谋，用事实说明国民党政府确定的国大妇女代表不合法，不能代表民意，在上海地下党的支持下，三月三十一日成立了一个“上海国大妇女代表选举运动筹备委员会”。该会由女青年会、中国妇女联谊会上海分会、上海妇女联谊会、中华妇女互助会、女作家团体等五单位的代表以及社会妇女贤达共数十人组成，决定学习解放区的经验，“以普通，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之方式”选出人民信赖的妇女代表。四月十四日，上海一万多名女工、女生、职业妇女等分十二选区参加了选举，从二百四十二名候选人中选出了三十五名代表。许广平得票最多，共获一万零八百二十九票。被选出的妇女代表还有宋庆龄、何香凝、罗叔章、沈兹九、韩幽桐、王辛南、廖梦醒、李德全、胡子婴、雷洁琼、胡耐秋、瞿希贤、郑倚虹、蒋学洁等，其中有五名女工，代表范围相当广泛^②。选举结束后，由许广平、胡子婴、雷洁琼、罗叔章、胡耐秋五人组成宪法草纲研究会，对宪法大纲草案中有关妇女

①《上海妇女联谊会致全国妇女电》，见一九四六年三月九日上海《文汇报》。

②《沪妇女界昨选国大代表》，见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五日上海《文汇报》。

的各项条款进行了讨论和修改^①。这次选举的结果，当然得不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承认。但这一活动却达到了它的预期目的——使广大妇女得到一次民主生活的学习，同时，也戳穿了国民党强奸民意、妄图通过国大把一党专政合法化的用心。

为了“替人民说话，替穷苦无告者说话，替真理说话，替民主运动坚强奋斗者说话”^②，许广平于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主编了《文汇报》副刊《妇友》（胡耐秋助编）；同年六月七日又主编了《上海联合日报晚刊》的副刊《妇讯》。在《妇友》发刊词中，许广平指出妇女“是整个民族要求进步中的一环”，是“促成民主政治”的重要力量。在《妇讯》发刊词中，许广平指出：“拥护民主、和平与安全，是我们今天与食宿一样急迫而不可离弃的需要。……我们不但要把自己的讯息报导出来，同时也要求借这刊物作国内和世界朋友们与我们通信息、齐步伐的媒介。”由于许广平坚持了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内战的编辑方针，因而团结、教育了广大进步读者。上海地下党对《文汇报》与《联合晚报》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周恩来曾与《文汇报》与《联合晚报》的工作人员亲切交谈，做过多次重要指示^③。

同一时期，许广平还在《民主》周刊、《周报》等进步刊物上发表了大量鲜明、泼辣的杂文政论，为争取和平、民主而

① 《沪国大女代表举行宪草讨论》，见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上海《文汇报》。

② 景宋《为〈联合晚报〉周年纪念题词》，见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五日《联合晚报》。

③ 陆诒《周恩来同志指引〈联合晚报〉进行战斗》，见一九七九年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亦见徐铸成《周恩来同志对〈文汇报〉的关怀》，出处同前。

大声疾呼。比如，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调动一百万正规军并指挥七十万日伪军进攻解放区，把战火燃及十一个省份。同月十七日，许广平在《民主》周刊第六期发表了《我的呼喊》一文，厉声责问国民党当局：“许多军队，在对日寇的抗战中望风而逃的，这回反而非常勇敢的在打自己同胞了。难道养精蓄锐为的是今天一役？国家亡在异族之手不要紧，让自己兄弟、亲戚、朋友来共管国事倒不愿意？”她号召广大人民行动起来，弃绝那些发动内战的人，扑灭燃烧到眼前的战火，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来保卫人民用鲜血换来的和平。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至三十一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举行，与会的中共代表和民主人士强烈要求打破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走上国家制度民主化的道路。同月二十六日，许广平在《民主》周刊第十六期发表《让人民站起来》一文，无情地批判国民党蒋介石的“一党专政”和“一人独裁”。她援引历史事例说：“凡是不自私，为公众谋福利的，我相信会获得拥护。沙皇的专制，世界有名的了，终于倒在人民的脚底下，希特勒的不可一世，也败亡了。人民是会选择的。当选择好了的时候，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止。”一九四六年五月，国民党当局为强化法西斯统治，继颁行保甲制度之后，在上海又实行“警员警管区制”，即每八十至一百二十户派一名警员负责管理，有权随时进行“户口突击检查”“特种户口调查”，其目的在于把侵犯人民居住自由权的行径合法化。同月十七日，许广平在《文汇报》副刊《妇友》上发表《顺从不得》一文，发出了“不自由毋宁死”和“官逼民反”的呐喊。她尖锐指出：“压力越大，反抗力越甚……如果更甚一些，那就是‘官逼民反’！横竖自由没有了，众怒之

下,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我不知道。还是让那批坚持‘警员警管区制’的家伙考虑,这不是恫吓!”今天我们重读这些洋溢着战斗激情的文字,对许广平在白色恐怖之下所表现出来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仍会肃然起敬。

一九四六年六月,美国政府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完成了发动全面内战的主要准备步骤,内战危机迫在眉睫。同月马叙伦等一六四人上书蒋介石呼吁和平,许广平列名。《呼吁书》分析了当时每况愈下的社会状况:“日寇既降,兵火犹炽,和平之望,等于泡影,劳于运输者不息,死于枪炮者相踵,搜粟如竭泽而渔,用财若东流之水,未生肉于白骨,转失命于战场,父母惨号,妻儿痛哭……”为了避免产生“外召凌侮,内致崩离”的局面,《呼吁书》要求国民党反动派“偃息干戈”,“使人民保生命于锋镝之余,谋安宁于憔悴之际”^①,六月二十三日,马叙伦、胡厥文、雷洁琼等九位上海人民代表(多数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领导成员)赴南京为民请命,学生代表陈震中、陈立复同行。上海学生、工人、职员、教师、市民十万人^②举行欢送代表和平请愿大游行,其中妇女约占百分之六十。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副书记刘长胜亲赴现场指挥。游行群众第一次喊出了“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战”的口号。当天,许广平前往上海北火车站欢送人民代表,接着又同广大群众一道进入市区游行示威,经过五六小时,直到“法国公园”(即今复兴公园)才散。当晚,上海人民代表抵达南京下关车站,被伪装成“苏北难民”的国民党特

^①《上海各界呼吁和平》,见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五日《民主》周刊第三十五期。

^②有的报上说五万余人,也有的说七八万人。

务包围殴打，受伤多人，有的被打晕。六月二十八日，许广平在《文汇报》副刊《妇友》发表致雷洁琼的慰问信，愤怒谴责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皇皇首都，任令出此凶暴，职责所在，难辞其咎。先生等为国受伤，沪上人士，悲愤填膺，饮泣痛恨。青天白日之下，使贤者如此折磨，国纪何存？国法何在？”六月二十九日，许广平又在《民主》周刊第三十七期发表《为下关遭难代表向美国人进言》一文，指出“这是昆明事件、校场口事件的又一次翻版”，国民党政府应承担这一事件的全部责任，并抗议美国“支持中国的黠武者”。她以德、日法西斯的垮台为例，说明“武力不能达到一切野心的企图”。

“六二三”反内战大示威，是抗战胜利以后上海人民运动的一次大检阅。它撕开了国民党政府的“和平”伪装，扩大和巩固了反美反蒋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表明人民的觉醒与团结已普及于社会的各个阶层，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在“六二三”事件之后，许广平在徐伯昕同志邀请下，毅然参加了中国民主促进会^①。她决心在今后的民主运动中继续英勇战斗，做一个坚定的促进派！

^① 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原是上海一部分学者、作家及工业界人士组成的进步团体，解放后由地区性的组织扩大为全国性的民主党派。



第十章

在第二条战线上

一九四六年七月，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公然撕毁墨迹未干的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以四百三十万军队的优势兵力，悍然向解放区大举进攻。解放区军民团结一致，以自卫战争反击蒋介石的进攻。全面内战由此爆发。在三年解放战争中，中国境内相继开辟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国民党统治区内逐步高涨的人民运动，这是第二条战线。第二条战线的斗争，有力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进攻，使蒋介石政府陷于全民的包围之中，起到了伟大的历史作用。在中国黎明前这一重要而困难的时期，许广平英勇战斗在第二条线上，为迎来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民盟领袖之一李公朴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用美制无声手枪刺杀。十五日，在李公朴烈士纪念会之后，另一位民盟的领导人、西南联大著名教授闻一多又被国民党特务用美制冲锋枪打死。同一天，上海华夏书店被查抄；次日，上海《文汇报》被勒令停刊一周。接着，国民党当局又在上海拟了黑名单，阴谋用恐怖手段吓退手无寸铁的民主人士，扼杀各阶层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无边的黑幕遮没大地，风在吼，

树在折，人在奔跑，胆怯的早在深藏，恍若天翻地覆”^①。然而在这黑云压城、逆流翻滚的严峻时刻，许广平却如疾风中的劲草，傲然挺立。她正确指出，血腥气可以使一小撮参加过和平民主运动的政客低垂着头，偷偷溜出革命营垒；然而更多的人，却会踏着烈士的血迹继续前进，争取民主、自由的队伍会在斗争中愈益壮大。这就是出乎暗杀者意料之外的结果^②。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许广平清醒地看到，“凡是争取民主自由的人都可能走李、闻两先生的路”^③。但是，民主的逆流，须以热血抗衡。她抱定了牺牲的决心，决不在光明与黑暗生死搏斗的关头有丝毫退缩。

李闻事件发生之后，上海各民主党派、进步团体被迫转入地下，继续斗争。当时在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下，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各界民主人士为了交流情况，研究形势，统一认识，开展工作，纷纷以聚餐会形式进行集会。许广平也在法租界赵主教路（现五原路）包达三的住宅——大通别墅参加了一个聚餐会，每周一次，与会者还有陈叔通、马寅初、马叙伦、周建人、王绍鏊等。在聚餐会上，还学习过秘密传到国统区的毛泽东同志著作。有了党的坚强领导，许广平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就明确了方向，提高了水平，增强了信心和勇气^④。

① 景宋《还不是可以痛哭的时候》，见一九四六年十月四日上海《文汇报》。

② 景宋《清晨漫笔》，见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七日《民主》周刊第四十一期。

③ 景宋《还不是可以痛哭的时候》，见一九四六年十月四日上海《文汇报》。

④ 范尧峰《记上海大通别墅聚餐会》，见一九七九年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

抗日战争刚结束时，上海的杂志、出版物有过为时大约半年的相对活跃时期。当时讨论政治问题的刊物有十几种，文艺刊物有七八种；其中《周报》、《民主》周刊，还有北平版、重庆版、香港版。但是，全面内战爆发之后，国民党对进步舆论界进行了有计划的压迫与摧残，其规模之巨大，手段之毒辣，为向所罕见。一九四六年八月，上海《周报》被勒令停止发行。据八月三十一日上海《大公报》披露，上海反动当局查禁书刊名单竟达一百零九种。一些进步书店先后被查抄或停业，一些设摊营业的书报贩也横遭迫害。同年十月，《民主》周刊也被迫休刊。这样，刚想破土而出的一点点文化萌芽就被扼杀殆尽了^①。面对这种“言语道断”的状况，许广平发出了悲愤的抗议，她指出国民党奉行的法西斯政策，超过了历史上的一切专制暴君。因为历史上虽然有过“钳口结舌”的生活，但毕竟还能“道路以目”，即用眼睛来表示个人的不满。而当时国民党的特务对路上行人的表情都进行窥探了，他们竭力维持的是一种“不准人民作声”的“猪猡生活”^②。同年十月，许广平在由沈钧儒领衔签署的一份《呼吁书》上签名，要求国民党反动派切实保障言论自由。《呼吁书》指出：“人民的口是终归封锁不住的，文化是终归虐杀不了的”，并警告国民党政府“不要不顾一切的走上自绝于民的末路上去”^③。

① 《上海杂志界联谊会致政协第三方面代表备忘录》，见一九四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民主》周刊二卷三、四期合刊。

② 景宋《猪猡的生活》，见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周报》第四十九、五十期合刊。

③ 沈钧儒等三十九人《我们要求政府切实保障言论自由》，见一九四六年十月十日《民主》周刊二卷一、二期合刊。

反对美蒋勾结扩大内战的阴谋，是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的重要内容。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日，许广平、胡乔木、田汉、马叙伦等八人参加上海《文汇报》举行的第三十九次星期座谈，呼吁美军退出中国。许广平在发言中，希望美国人民跟各国人民联合起来，共同纠正美国错误的外交政策。九月二十三日，美国进步人士和若干人民团体反对美国政府援蒋反共，在美国三十五个重要城市举行“美军退出中国周”。上海十个人民团体群起响应。九月二十八日，许广平在《民主》周刊第五十期发表《〈从中国撤退〉锦集》。该文辑录了美国人士关于敦促美军撤出中国的言论，希望中美两国人民能够真诚合作。同年十月，为响应美国芝加哥人民发起的“美军退出中国周”运动，上海各界也举行了一个宣传周，中间有一天是妇女宣传日。上海妇女在这天召开座谈会，决定在妇女界进行一次时事测验。许广平参加了这一活动的筹备工作：拟题，审题，分发试卷。参加测验的妇女共二千四百零二人，绝大多数都主张停止内战，要求美军立即撤走。这一活动，充分表达了中国广大进步妇女鲜明的政治态度，是一次成功的民意测验。

一九四六年，在许广平政治生活中最难忘的事件，是多次会见了她敬爱的周恩来。这年七至十月，周恩来在率领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至南京跟国民党政府进行针锋相对的谈判斗争期间，曾先后四次来到上海，广泛接触中外人士，大力宣传我党各项政治主张，积极支持各界人民的正义斗争，无情揭露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狰狞面目。周恩来一九四六年的上海之行，对上海人民的革命运动和整个解放战争的形势都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十月十九日下午，周恩来出席了中华全国文艺协会等十二个文化团体在上海辣斐大戏院（今长城电影院）举行的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大会在《由于你，新中国在成长》的颂歌声中开始。邵力子致开幕词。白杨朗诵许广平的《十周年祭》。祭文愤怒控诉了当时“烽火复燃、生灵涂炭、民怨以呈、死亡无日”的黑暗现实，表达了许广平紧随真理、绝不怠懈的坚强决心。周恩来在鲁迅遗像前慷慨陈词：“多少年来，全国人民个个祈求民主、独立、团结、统一，日本投降已经一年多了，这一个愿望还未能达到，怎么叫人不失望、悲痛？鲁迅先生逝世那年，国内就已进行谈判，到今天是足谈了十年了，还不能为人民谈出一点和平来。我个人对此有说不出的难过。但是人民既然一致的有了这个要求，只要能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和平民主统一争取到的。”许广平最后发言。她说：“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应该打倒黑暗，推开黑暗，寻求光明！”^①次日上午，许广平携海婴参加了鲁迅墓前的扫墓礼，参加者有郭沫若、茅盾、沈钧儒、叶圣陶、冯雪峰、田汉等。许广平对来宾表示深深的谢意。她感慨万端地说：“鲁迅先生生前因为各种困难，想同大家见面，总是很难的，而今天大家都来看他，可是他却看不见大家了。”^②

十月二十一日，周恩来离上海飞抵南京，临行前他曾约清上海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来旧法租界马思南路一〇七号（今思南路七十三号）“周公馆”举行座谈，依依惜别。许广

①《鲁迅精神不死！》，见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日上海《文汇报》。

②《踏着鲁迅的道路前进》，见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一日上海《文汇报》。

平、郭沫若、马叙伦、马寅初等应邀出席。周恩来说：“蒋介石已经撕毁和平协定，向解放区全面进攻，我们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坚决自卫还击，粉碎蒋介石的进攻，胜利一定是属于人民的。”周恩来又指出：“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中共代表团将要撤回延安，不论是南京还是上海，我们一定要回来的。回来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请回来，再继续谈判，另一种是打回来，就是我们胜利以后回来。后一种可能比前一种大。”^①周恩来一席赠别词，使许广平进一步认清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坚定了必胜的信心。为了灿烂的明天，她决心坚持进步，多做工作，学鲁迅的榜样，像牛一样地为人民去努力奋斗。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在会见了周恩来同志之后，许广平乘机飞抵北平，来到了使她依恋而看见之后又肝肠欲断的西三条二十一号——鲁迅故居。从一九二六年至今，她离别北平已经整整二十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她曾几度想要北上，但始终未能成行。如今，在鲁迅逝世十周年的日子里，她终于回来了。

许广平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整理鲁迅北平故居的藏书。这批书以前大部分存放在故居南屋，后因南屋出借给鲁迅的亲戚阮和荪住，便又搬到北屋靠西的一间房里，共有二十三箱另三书橱，其中收藏有鲁迅北平、广州、上海各个时期购置的书籍、碑帖、古董等。一九四四年秋，堕落为汉奸的周作人指使当时北平图书馆的几个职员，到西三条去把鲁迅的藏书编成中文、

^① 夏顺奎《周恩来同志一九四六年四次来上海》，见一九七九年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

外文、日文书目三种，印出交人带到南京、上海各地的汉奸组织处待价而沽。大汉奸陈群已允全部包下^①。许广平获悉这一情况，一方面在报上刊登启事，声明“如鲁迅先生在家属确有私擅出售遗产事实，广平等决不承认”^②；另一方面她又辗转托人买下全部书籍，从而制止了出售这批珍贵文物。从十月二十四日至十一月五日，许广平花了近两周时间整理藏书，她将书箱逐只打开，去尘，包裹，再投些樟脑丸，然后重行封锁。对于鲁迅生前亲笔签字、亲自包扎的期刊如《奔流》、《萌芽》等，许广平总设法再加上一层包装纸，格外珍惜。经过这一番整理，鲁迅藏书得到了更为妥善的保存。工作完毕，许广平又看望了一些朋友，稍稍休息了几天，就携带着鲁迅的一些手稿本、抄本、字画乘飞机返回上海了。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圣诞夜，北平东单操场发生了美国士兵皮尔逊强奸北京大学女生沈崇的事件，引起了全国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退出中国的爱国运动。运动席卷了北平、上海、南京、重庆、武汉、广州等几十个大中城市，参加的学生有五十万以上。这一斗争迅速获得了工人、教员和其它各阶层爱国群众的支持，其规模超过了“一二·九”抗日学生运动。许广平也置身于这一波澜壮阔的斗争之中。

早在抗战胜利之初，许广平就不断撰文抨击美国扶蒋侵华的行径。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她在《民主》周刊第三期发表了随笔《上海人》，揭露美军在中国“闹酒吧间，咖啡室”，

① 许广平《所谓兄弟》，见《鲁迅回忆录》。

② 《许广平关于鲁迅藏书出售问题启事》，见一九四四年九月十日《申报》。

恣意破坏社会治安，揭露美国吉普满街横冲直闯，酿成无数惨祸。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五日，她在《民主》周刊第三十五期发表《谁有仲裁权？》一文，抗议美国通过贷款，“援助”军用物资甚至直接动用军队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强烈反对蒋介石把中国内争的仲裁权交给美国特使马歇尔、让美国明火执仗地干涉中国内政。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三日，许广平在《民主》周刊第三十九期发表《认清时局》一文。该文援引大量事实撕开了美国政府的“中立”伪装，明确区分了要求“美军退出中国”与“反美”的原则界限。许广平深刻指出，要求“美军退出中国”，“正是酷爱中美友谊的良好维系，深怕由一时的‘国策’所误，结成万劫不复的中美恶感，并且使目前的中国黷武分子有所依恃而濒中国于灭亡之路。而且这不但是明白是非的中国人民应该如此，就是外国的有识者也如此的。”“沈崇事件”发生，更激起了许广平强烈的爱国义愤。她公开发表谈话，坚决抗议美军污辱中国妇女的兽行^①。同时，她还主持了由上海各民主妇女团体联合成立的“妇女界抗议驻华美军暴行联合会”，扩大反对美军暴行的宣传，跟上海各界人士所组织的“抗暴联”一致行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晚，中国妇女联谊会和上海妇女联谊会的姐妹一百余人举行“妇女岁暮同乐会”，许广平致词。她说：“这两天各报登载的北平女生被美军强奸的事，全国都在愤怒，我们妇女亲眼看自己姊妹受污辱，怎能不愤怒呢？同时，从明年起，全国征兵令又下了。姊妹们，这不是又叫我们的兄弟、父子、丈夫都去在内战中送死吗？这两件事，都是我们妇女们最切身之痛呀？大家有什么意见，我们妇

^①《美军暴行引起公愤》，见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上海《文汇报》。

女联谊会一定要表示。”^①在许广平号召下，当场通过了一份联合抗议书：“自从美军来到中国，他们到什么地方，暴行就发生在什么地方，尤其我们妇女受到的更多更惨酷。最近在北平竟在公共场所强奸女学生，我们妇女界已经到了不能忍受的时候，一切赔偿道歉不足以卸他们的责任，也不足以平我们的愤怒。我们坚决主张飭令在华全体美军立刻离开中国。”^②这场因抗议美军暴行而引起的伟大的人民运动，标志着国民党统治区革命群众运动的新高涨；预示着中国新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民大革命毫无疑问地将要到来，并将要取得胜利。

一九四七年五月，正当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接连被粉碎的时候，党又积极放手发动和领导群众，展开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把政治斗争跟广大群众切身相关的经济斗争密切结合起来，在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起反卖国、内战、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③。

那时，国统区的广大人民不仅政治上受尽压迫和限制，而且由于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物价如同断线风筝一样飞涨，广大劳动人民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由于当时的教育经费只占国家预算的百分之三点五，使得广大教职员生的生活也非常困难。一个大学生每天的菜金，只够买两根半油条。这就迫使广大学生愤怒喊出了“向炮口要饭吃”的口号。

对于人民群众争取生存权的斗争，许广平一贯积极参与，全力声援。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二日，许广平在《文萃》第

①《妇女岁暮团聚》，见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上海《文汇报》。

②《妇女界忍无可忍》，见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上海《文汇报》。

③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指示《在白区对国民党对策》。

十五、十六期合刊发表《局面怎样变好?》一文,揭露国民党政府“一面玩之不厌的侈言和平,一面征实抽丁,急于星火,致使实无可征,举家自杀;民不愿战,母刺儿目。”据她统计,当时上海市民每人每年平均要纳捐六万元,临时增加的还不在于内。其中百分之八十五的款项都用于内战。许广平在其它文章中,还将国统区的“灾荒遍地,粒米不给”和解放区的连年丰收进行对比,说明内战将驱使人民走向革命,国民党当局只能得到与其主观愿望相反的结果。

一九四七年五月四日,上海学生举行反内战反饥饿游行示威,这一爱国运动迅速扩及南京、杭州、北平、沈阳、青岛、开封等地。五月十五日,全国学联在上海成立,各地区也组织了区域性的学联,统一领导学生运动,并酝酿举行全国性的大示威。许广平对这一运动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新五四运动”。她说:“面临着第三次大战就要到来的叫嚣,中国人民首先体味到自己从第二次大战后所尝着的苦果——内战——全国普遍的饥饿,壮丁被抽,粮食被征,税收倍增,面前是无穷尽的死,无边际的黑暗,无可防避的失踪与动辄数千百的捉捕,学生抗暴运动委员会全国性的组织起来了,虽则受着强力的禁止,然而无疑是新的五四运动,反对外来的束缚与内在的压迫。从学生运动到商界的爱用国货运动已经陆续发生了,由各阶层的苦于生活的迫压的不安状态中,这一运动很容易蔓延扩大。”^①为了给学生运动以切实的物质支援,许广平在生活艰难中多次慷慨捐款。她还在妇女界广泛募捐,由她统一交给有关学生团体。当学生运动遭到国民党当局残酷镇压时,许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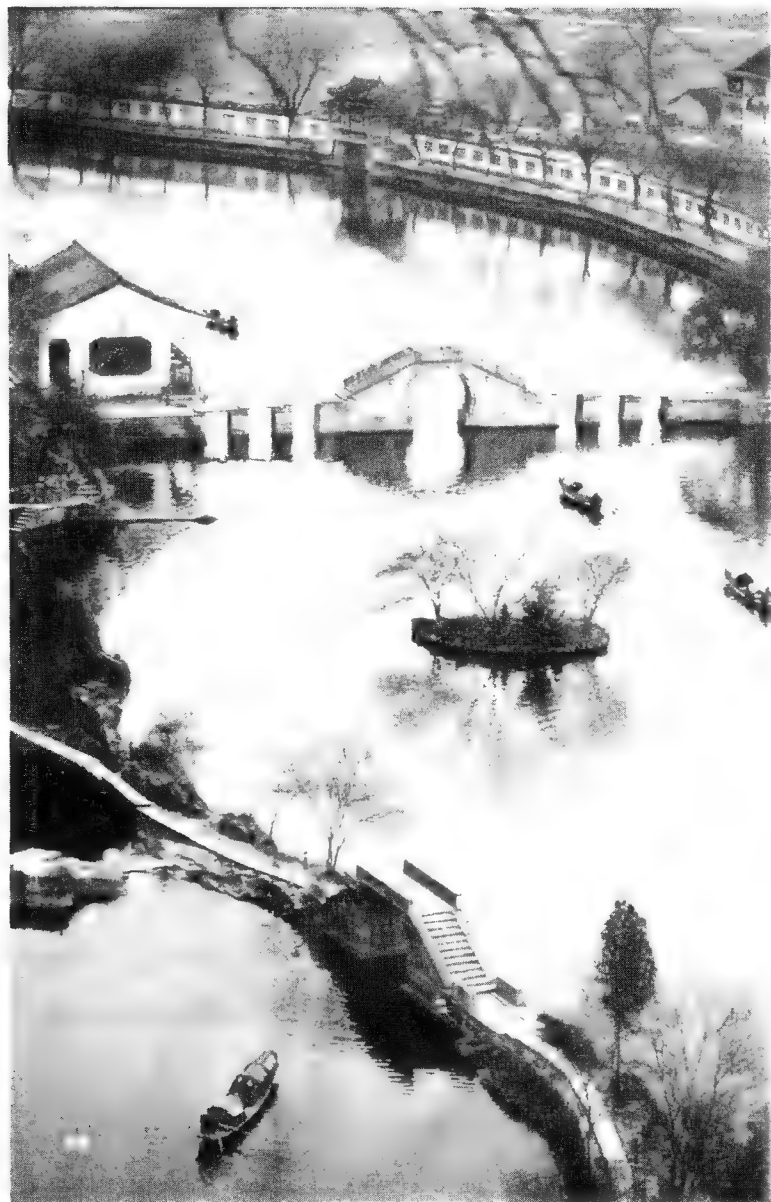
^① 景宋《新五四运动》,见一九四七年六月四日上海《文汇报》。

平还曾撰文予以支持，为之申张正义。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许广平一行七人赴鲁迅的故乡绍兴作了一次短期旅行。她在未到上海之前就憧憬着绍兴，旅沪的二十年间，每年都有几回讲起它，积而久之，觉得似乎成了她的一种精神负债。每当想到未能遂愿，总感到有一种疚歉。如今，在这春意盎然的季节，她终于有机会踏上孕育了鲁迅的这块土地了。

火车当天过午就到了杭州。午后，许广平一行改乘小包车，出杭州，过萧山，下午三点多就置身于绍兴城了。“行山阴道上，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令人应接不暇。”这是蔡元培先生为《鲁迅全集》作序时引用的古人名句。但是身历其境的许广平，在神往于绍兴民风淳朴、景色宜人的同时，却发现这座古城破瓦颓垣，触目皆是。那石山林立的东湖，竟成了私人独占的处所；陆放翁的旧宅——快阁，木石充斥，虫鼠为营；龙山上的望海亭，本可供游人眺望绍兴全境，因年久失修，胆怯的人都不敢登临；禹王殿内石碑前的栏杆，也已破损不堪。许广平询问沿途农民的生活状况。农民说：“日本人来了之后就没过好日子，日本人走了之后更苦。”由于时间仓促，未及游览香炉峰、南镇、兰亭这些名胜，许广平就返回了上海。临行前，她在心底默默为鲁迅的故乡祝福，祈愿下次再来时，这种破败崩颓的景象不会再入眼底。

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根据毛泽东同志倡议，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口号对将国民党区域一切民主党派、



绍兴水乡

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团结在我党周围，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六月一日，在上海大通别墅民主人士的聚餐会上，许广平发言拥护关于召开新政协的号召，得到陈叔通、张絅伯等人的拍案赞许。席上还商定分头去联系各民主党派、进步团体在沪的其他负责人，后来也得到了他们的热烈响应。同年八月十二日，清华大学名教授朱自清因贫病去世。临终前，他曾签名于抗议美国扶植日本和拒绝领取“美援”面粉的宣言，并再三嘱咐家人不要购买国民党政府配售的美国面粉，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八月三十日下午，许广平在上海文协与清华同学会联合举行的朱自清先生追悼会上发言，赞扬朱先生“保持了中国士大夫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高风亮节”，并指出他的事迹是对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指引^①。同年十月，我党组织民主人士赴解放区，准备在一九四九年召集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许广平也经香港来到了东北解放区。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就要像朝阳那样喷薄而出了，许广平举起双手在热情地迎接它！

^① 许景宋《朱自清先生纪念》，见一九四八年十月一日《文潮月刊》五卷六期。



第十一章

把一切献给党

一九四八年，正是高粱如火、大豆吐银的季节，许广平带着满身的灰尘，噙着激动的泪水，跟郭沫若等爱国人士联袂由香港到安东，秘密进入东北解放区，一头扑向党的母亲般温暖的怀抱。在这里，她看到了洒满阳光的蓝天；在这里，她读到了雪片般飞来的捷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淮海战役正式打响！毛泽东对中国军事形势的发展作出了科学的预见：“现在看来，只需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①光明的前景鼓舞着许广平。她决心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不害怕困难，不松懈斗志，为建立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一九四九年，是中国革命进程中极为重要的一年。这年一月底，北平和平解放。二月，许广平等民主人士由东北抵平，受到了党和人民的盛大欢迎。年过半百的许广平重新焕发了革命青春，以饱满的热情和充沛的精力投入了紧张繁忙的工作；三月，她以国统区妇女代表团正团长的身份参加了中华全国妇女第一届代表大会，被选为妇联执行委员；四月，她赴捷克首府布拉格参加了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六月，她作为妇联工作小

^① 毛泽东《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

组成员赴上海参加中国妇联上海分会的筹建工作。七月四日下午，上海文艺工作者三千人在逸园体育场举行庆祝解放大会，许广平为主席团成员。有一位朋友亲切地对她说：“在这个会场里，我们好像有鲁迅先生和我们在一起。”听了这句话，许广平热泪盈眶，竭力控制着，不让它淌下来。是的，鲁迅当年播下的希望的种子如今已经破土而出，她怎能不为之感到欣慰呢！同月，第一次文代会召开，许广平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委员。九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许广平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参加了《共同纲领》的起草工作。这一纲领，以法律形式确定了我党在建国初期的一系列基本政策。会上，许广平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十月十九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不到二十天工夫，北京各界一千余人在充满着光明、象征着胜利的首都举行了鲁迅逝世十三周年大会。聂荣臻莅会。许广平在会上讲话。她说：“鲁迅毕生的生活告诉我们，文艺工作者离不开革命，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像鲁迅一样地忠诚于共产党的领导。”^①大会一致通过决议，请人民政府在北京和上海的适当地点建立鲁迅铜像和整理鲁迅的故居，建立鲁迅纪念馆。为纪念鲁迅逝世十三周年，许广平在《人民日报》发表《在欣慰下纪念》一文。她回忆在鲁迅十周年祭的时候，她曾在祭文中写道：“民主自由，是所信赖，必期有成，再行告慰！魂兮有知，鉴此寸在。”她感到，现在，真是可以告慰于鲁迅在天之灵了。同日，中央人民政府召集第三次会议，任命了政务院的副总理、政务委员、秘书长、副秘书长。许广平等五人被任命为副秘书长。

^①《首都庄严纪念鲁迅》，见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日《人民日报》。

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对纪念鲁迅、研究鲁迅的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正如许广平所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我们对鲁迅得以尽量纪念、研究、展开批评、学习，使文学遗产、斗争经验可以获得适当的评价，以从事吸收或扬弃了。”^①一九五〇年七月，许广平将北京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鲁迅故居及寓内全部鲁迅遗物捐献国家。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对许广平颁发了褒奖状，并在保存故居原貌的原则下，对故居加以彻底的保固性的修缮。一九五〇年八月，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拟筹设上海鲁迅纪念馆，许广平完全同意这一计划，她主动献出鲁迅在沪期间的用品，以资陈列，并于八月三日致函国家文物局表示：“大陆新村房屋若整理了，需要我回沪亲自布置，请先期告知，以便酌量工作情况向上级要求批准给假，即行南下。”由于许广平的积极赞助，上海鲁迅纪念馆于次年一月七日正式成立。同年十月，许广平断然将鲁迅著作的出版权和全部版税上交国家出版总署，自己不取分文。她希望通过捐献版税达到降低鲁迅作品售价的目的。在绍兴鲁迅纪念馆的筹建过程中，许广平也做出了贡献。她将一九一九年鲁迅举家北迁时寄存在绍兴故居的家具杂物的账本送给绍兴鲁迅纪念馆，该馆根据账本找回了近一半家具，使绍兴故居基本上恢复了原状。^②

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日。为纪念这一光辉的节日，许广平在民主促进会会刊《民进》第

① 许广平《欣慰的纪念》，见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② 对于许广平的捐赠行为，周海婴后来谈了他的理解和看法。可参阅《我与鲁迅七十年》中《父亲的遗产》一章，南海出版公司二〇〇一年九月第一版。

二期发表《向中国共产党学习》一文，指出：“我们要想不但有革命的心愿，还能在革命过程中少犯错误，坚持到底，就必须紧紧地依靠着中国共产党。”她向民进成员发出号召：在庆祝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的时候，第一件大事就是向中国共产党学习、再学习。^①

为了履行“紧紧依靠着中国共产党”这一庄严誓言，许广平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参加了建国初期党领导下的一系列政治运动：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许广平率领由北京市机关干部、教授、曲艺人员、知识分子等一百余人组成的人民政协参加广东省土地改革工作团，奔赴广东的四会、新兴和恩平等县。在土改运动中，她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坚定不移地贯彻了党的土改政策。当时，广东新会县的贫苦农民对一个倚仗伪势力残酷压迫、剥削农民的恶霸地主陈鹤琴展开了说理斗争，遭到陈鹤琴的女婿、伪广东省参议李宏业的诬蔑和攻击。他从香港写信给许广平进行“申诉”，胡说假如鲁迅仍然健在，看到土改的情形会“使他摇头与叹息”。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六日，许广平在香港《大公报》和香港《文汇报》对李宏业的来信予以公开答复。她说：“鲁迅对被压迫的农民‘闰土’，是深深寄予同情的，是站在被压迫那一方面的。但‘闰土’的生活，鲁迅笔下所写的还没有我现在所见所闻的深刻。我们的土改队看到农民没有棉被，盖的是层层破碎的麻包；没有棉衣，冷起来两手相搓缩做一团；饥荒年儿女抵押给地主做马牛。今年算是丰收年了，和土改队一同吃到的还不过是番薯稀粥；穷苦的人，一

^① 手稿本第二页。



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

天不去割山草，就得不到食物。这些情况，更鼓励我们土改工作要快快完成，使得百分之七十的贫雇农兄弟早日能够翻身，使这伟大的队伍能够脱离剥削，走向新中国的建设大业的行列中。这正是鲁迅生前寤寐求之、奋斗不懈的目标！如果他仍健在，看到今天的土改，一定是会兴奋和高兴的。因为他有分明的是非，他痛恶反动派、蒋匪帮、特务之流，绝不会看到农民翻身，斗争与反动派勾结的地主恶霸而‘摇头与叹惜’。也即是绝不会站在地主方面替地主说那‘恶意的诬蔑’的话。鲁迅的方向，难道不是我应该照着走的方向吗？我曾不止一次听到过地主方面的狡诈，向农民进行分化，这是活生生的事实。想不到李宏业却会用死了的人来向我进行分化。拿着鲁迅的名义替自己遮羞，自己摇头与叹惜，却硬栽在死了的鲁迅身上。

.....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人，虽然从鲁迅那里学到些分明的是非，学到些有用解剖刀解剖自己的必要，但觉得还应该更加锻炼，所以自愿参加土改工作，以便给广大的农民服务，向农民学习，以便给自己思想彻底改造。也许李宏业以为在我正希望从土改中改造自己思想的时候，会愚蠢到给反动的地主恶霸方面的花言巧语分化诬蔑所蒙蔽吧，绝不会的。我将藉此更加警惕，更加深入，向农民兄弟的队伍去靠拢些。这就是我的答复！”

一九五四年三月至五月，许广平参加全国人民慰问解放军代表团赴新疆进行慰问活动，担任了慰问团副总团长和第二总分团副团长的职务。通过这一活动，她受到了一次生动、具体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她亲眼看到了英雄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守卫在海拔五千公尺以上的帕米尔高原上，终年与风雪和瘴气搏斗，警惕地防备着胆敢来侵犯的帝国主义者及间谍分子，忠诚地捍卫着我们可爱的祖国，她亲眼看到解放军指战员用自己的双手在一望无际的、荒凉的戈壁滩上，盖起了高大楼房，并使长满着芦苇和芨芨草的荒滩，变成了水渠纵横、用拖拉机耕作的大片良田。许广平由此懂得了一个真理：哪里有了人民解放军，哪里就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哪里有了人民解放军，哪里就会创造出奇迹来。通过这次慰问工作，她对毛泽东所说的“没有一个人民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句话体会得更深刻了。^①

一九五四年九至十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① 许广平《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教育了我们》，见一九五四年五月四日《新疆日报》。

议和全国政协第二届全体会议先后召开。许广平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许广平担任了领导职务之后，仍然克己奉公，始终保持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按照规定，人大常委委员可有四个工作人员。但在一九五七年四月组织上为她安排一名秘书之前，许广平名下只有一个汽车司机的编制。其余工作人员的薪金，一律从她自己的工资中支付。对于公家调配的小汽车，许广平一般在外出工作时才乘坐。偶尔看病用车，她一定按章付款。冬天，公家调拨了烧暖气的烟煤，当时，许广平家中有一个烧洗澡水的小锅炉，也需使用烟煤。每当烧洗澡水之前，许广平总是将所用的烟煤过称，按价付款。就连办公的纸张文具，许广平也绝不浪费。凡用过的旧信封，她都按鲁迅当年的习惯，重新翻制，加以利用。解放初期，许广平将她上海寓所的家具全部捐给了国家。来京之后，她请章川岛先生帮忙，从小市的旧货店中买来一些旧家具使用，尽量不向公家伸手。为了替国家节约点滴的开支，许广平始终用“人民公仆”的标准严格要求着自己。

一九五六年十月八日，在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日前夕，许广平携海婴和儿媳马新云乘火车南下，十日抵达鲁迅故乡绍兴。八年前许广平初到绍兴时，这里还是一片破败崩颓景象。而今，绍兴烟囱高耸，晚稻半熟。虽是深秋时分，却仍满眼鹅黄嫩绿，一派生机，跟鲁迅当年所描写的“没有一些活气”的故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绍兴，许广平一行仔细地参观了绍兴鲁迅纪念馆，又冒着秋风秋雨，乘坐乌篷船访问了鲁迅外婆家的旧宅。为了参加十四日将在上海举行的鲁迅墓迁葬仪式，他们怀着依恋的心情离开了绍兴。

十四日清晨，上海虹口公园内用著名的苏州金山花岗石筑成的鲁迅新墓脚下，摆着中共中央敬献的花环，上面写着“鲁迅先生永垂不朽”。十公尺宽、七公尺高的墓碑上铭刻着毛泽东题写的“鲁迅先生之墓”六个大字。墓旁移植有周恩来与许广平十年前在万国公墓鲁迅墓前所种的两株桧柏。墓的面积有一千六百平方公尺，墓前是一片五六千平方公尺铺有天鹅绒草的草坪。墓的中央有一座安详的鲁迅雕塑象，出自名雕刻家萧传玖之手。墓地前面建有鲁迅先生纪念亭一座。上午九时，阳光灿烂，丹桂飘香。鲁迅灵柩由宋庆龄、茅盾、周扬、许广平、巴金、唐弢等十一人从公园大门迎至新墓安葬。灵柩上覆盖着复制的“民族魂”三字的大旗。一阵秋风，卷起这面旗子的一角，许广平取下胸前的一朵彩色水钻扣花，把旗子牢牢扣住。当灵柩带着这朵扣花徐徐落入墓穴的时候，许广平满眼热泪夺眶而出。在迁葬仪式上，许广平发表了言简意赅的讲话。她指出：“鲁迅是中国人民当中的一个。由于他一生的劳动，都是为了祖国和人民，这就使他成为中国人民最优秀、最忠实的儿子。现在，当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的时候，党和人民给予鲁迅这样崇高的隆重的深厚的纪念，作为一个作家，是文化界的光荣；作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是革命者的光荣，作为一个中国人民的忠实儿子，是中国人民的光荣。我们今后一定会完成和发扬他的意愿，来建设新中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人类友好合作的和睦大家庭而坚持奋斗，不断地前进！”^①

^① 关于鲁迅墓迁葬式的情况，参见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三日《文汇报》，十月十四日《劳动报》，十月十五日《解放日报》和十月十七日《人民日报》。

一九五九年，为了向建国十周年献礼，许广平开始了《鲁迅回忆录》的写作：从七月十三日至八月十三日是准备阶段。她认真重读了《鲁迅日记》和鲁迅的其它著作，旁及一些有关鲁迅的资料，另外还看了一些世界名人的回忆录，从而得以联想起一些事情，并学到了一些好的写法，在此基础上，于八月中旬正式动笔。开始进度尚快，每日可写四五千字。但由于天气太热，血压升高，速度延缓下来。其间又因参加建国十周年活动辍笔了一个多月。十一月初重新握笔，同月底初稿告成。在实际写作的两个多月中，她写成了十三节文字，计九万五千字。在这本书中，许广平回忆了鲁迅从五四前后至逝世这近二十年间的战斗历程，从政治活动，文学活动，教学活动和日常生活等方面展现了鲁迅崇高而亲切的面影。书中的许多珍贵资料，是只有作为鲁迅夫人和战友的许广平才能了解和提供的，因而对于鲁迅研究工作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当然，这本书跟其它任何一本著作一样，也必不可免地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是有某些失实、欠准确或不够充分之处。但正如该书的一位批评者朱正所说的那样：“相信本书读者对许广平同志和她的著作会有一个比较客观的、全面的、公正的看法：看到许广平同志对于鲁迅研究工作所做的巨大贡献；看到她写的那些误记失实的材料在她的大量著作中只不过是一部分，她的许多著作还是真实可信和很有史料价值的。还应该看到，之所以会出现这些误记失实的材料，不仅是因为年代久远产生的记忆上的误差，还有不能完全由她本人负责的原因。”^①

一九六〇年，许广平再次提出入党申请。她在入党申请中

^① 朱正《鲁迅回忆录正误》，一九七九年十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说：“我一贯信托党，忠诚接受党的领导，过去是这样，今后仍然矢志不渝地坚决跟着党走，为人类解放事业贡献出我的全部力量——身体和精神，随时随地毫不保留地接受党的考验，为党工作到最后一息，希望同志们督促和帮助我。有生之日就是考验我之时。如果生前不能争取入党，我愿以高尚的党员品质悬为目标，引导我不断努力前迈，即使到最后一息，我还要争取能够学得像邹韬奋先生那样，死后也能被批准。”同年十月，由党中央直接审查，经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同意，决定吸收许广平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①。从此，她在革命的征途上迈开了更雄健的步伐。

一九六一年三月，许广平率中国妇女代表团赴日本访问。解放以后，许广平参加了一系列的外事活动，多次率领或参加不同类型的代表团出国访问，对促进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友好交往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到鲁迅青年时代留过学的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访问，也已经是第二次了。

从三月十七日到四月十五日，许广平一行几乎跑遍了大半个日本，西至福冈，东到东京，南到横滨，北到盛冈，共访问了二十七个城市。在京都和神奈川县访问的时候，一天之内，她们参加欢迎会、恳谈会、招待会，连同参观、交谈，共

^① 根据周海婴《我与鲁迅七十年》一书披露，许广平实际入党的时间是一九六一年六月六日。许广平在这一天的日记上写道：“一九六一年六月六日是我有意义的一日。我活着，要为中国、人类做些有益的事。T（按：指党）批准我作为一个党员，就要无负于T的教育和培养。T又上溯到去年十月起，允许我从这个月交党费，即是说：从去年十月已被批准了。意外的感动者一。知识分子原定预备期二年，党对我宽大对待，定为一年，这又是意外的第二个感动。”

有十八次之多。一个月中，她们跟六万日本妇女和各界人士进行了亲切的见面和交谈，大大加深了中日两国妇女和人民的互相了解和信任，进一步促进了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①。在日本，许广平常常听到日本友人谈起《两地书》。有的说：“这本书很有意思，很有教育意义。”有的说：“读完《两地书》，对你加深了了解。”那些寻求新鲜、健康、足以培养自己灵魂的读物的日本青年，更对《两地书》表现出特别亲切的感情，因为他们也跟许广平当年一样，在找寻出路，过问世事，深沉地思考着各种社会问题。

四月五日，许广平来到日本东北境的仙台。鲁迅当年留学时，这里只有八万居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里又因美国飞机轰炸受到过严重破坏。而现在出现在许广平眼前的，却是一个层楼高耸的有着四十万人口的繁盛都市。四月五日下午二时十分，在曾经做过日本侵略军兵营和弹药仓库的青叶山麓，许广平参加了仙台“鲁迅纪念碑”的揭幕典礼。原定参加者二百人，结果却来了五百多人。这座纪念碑高四点五米，宽二米，重十吨，参考了中国汉代古碑的式样，雄伟庄严，是中日人民永远团结友好的象征。碑的正面上半部有直径一米的鲁迅圆形浮雕，下半部横塑着郭沫若手书的“鲁迅之碑”的行书字，再下面刊有宋体字的碑文。许广平在会上致词。她除了说明中日人民的友好，文化交流的经过，还着重提到：鲁迅的作品之所以受到中国广大青年的爱好，鲁迅的为人之所以受到中国广大人民爱戴和尊敬，是由于他的作品广泛地、深刻地反映了被

^① 许广平《中日两国妇女和人民的友谊是任何力量破坏不了的》，见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

压迫人民的愿望。在他的作品里，爱憎分明。他热爱人民，但十分憎恨压迫人民的统治者。对外来的侵略者也表现了反抗到底的坚决意志。这种精神当然容易引起不甘屈服的日本人民的共鸣，日本读者亲眼看到中国人民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站立起来，这样，他们爱读鲁迅的作品，想从鲁迅的作品中找到一条能够获得胜利的道路，实在不是偶然的。

同年九月二十五日，是鲁迅八十周年诞辰。前一天，许广平在《工人日报》发表《文艺——革命斗争的武器》一文指出：“鲁迅从他开始文学生活的第一天起，就自觉地把文学看作唤起人民觉悟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强有力的武器。他通过自己的作品展示了中国人民在黑暗的社会中生活、呼吸、呻吟、挣扎的真实图景，揭露了统治阶级的惨酷无情和阴险恶毒。因为这些作品具有极大的社会意义和高度的艺术力量，所以它开拓了我国新文学的发展道路。……一个极力寻求光明，要求为中国革命事业而终生奋斗的战士，他不能不投身于无产阶级的队伍，并倾心于他的英明领导，一个甘愿‘遵奉’革命前驱者‘将令’的作家，他就不能不认识到无产阶级文艺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一翼。鲁迅终于找到了自己前进的道路，这就是诚诚恳恳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自己的文学活动全心全意地为中国革命服务。在鲁迅看来，革命固然需要文艺来扩大阵地，而文艺也只有附丽于革命才能得到广阔的发展。”同日，首都文艺界及其他各界人士隆重纪念鲁迅八十诞辰。周恩来莅会。许广平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一九六六年，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从此，中国人民经受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深重灾难。许广平没有经历这一运动

的全过程，因而，未能亲眼看到林彪、“四人帮”这两个阴谋集团的充分暴露和最终覆灭，也未能看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这场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中最后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在这场运动的初期，许广平出于对党的忠诚和对领袖的信赖，曾经像对待党领导下的历次政治运动一样，力图要求自己去理解它，以免落后于时代的步伐。但是，她很快就遇到了一系列使她百思而不得其解的事情：她所深深景仰的一批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遭到了残酷的政治迫害，很多正直的同志被批判、揪斗和非法拘禁。号称是“文化大革命”，但书店中竟连中国文化革命旗手鲁迅的著作也已消踪匿迹。所有这一切都使许广平逐渐由迷惑、困扰到出离于愤怒。毋庸讳言，在某些问题上，许广平也曾跟着说过一些，写过一些不妥的文章。但是，凡是亲历过十年浩劫的人们都会公正地看到，对待这种情况，应着重于分析其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而不应苛求个人。因为这绝非个别的现象和个人的悲剧。

一九六八年初，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被揪出。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他以“中央文革”名义从文化部调走的鲁迅书信手稿一千零五十四封（共一千五百二十四页）以及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的原稿（共十五页）一时下落不明。这对于为了保存鲁迅文物而几以身殉的许广平，无疑是难以承受的巨大打击。一九六八



徐懋庸

年二月十七日，北京鲁迅博物馆大联合勤务组写信要求追查这批手稿的下落，并请许广平转交此信。三月二日，许广平着手起草一封同样内容的信，准备连同鲁迅博物馆的来信一起递交有关方面。^{①②}三月三日（星期日）上午，许广平因连日受这件事刺激，在老朋友董秋斯、凌山夫妇家猝然发心脏病，在北京医院不幸逝世，走完了她七十年来饱经忧患和做出了重要贡献的生命旅程。她的家属从她的遗物中找出了她的遗嘱，上面写道：“如果我有一时的急变，致血液循环不通，竟然逝去的时候，我的尸体，最好供医学的解剖，化验，甚至尸解，化为灰烬，作肥料入土，以利农业，绝无异言。但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的身体，最后也听党的决定。我的亲属，也望他们好好地、忠诚地听党的话，一切遵循党的指示，按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办事。”

许广平去世后，周恩来专程赶到医院跟她的遗体告别，当晚又对她的家属表示了慰勉。新华社、合众国际社播发了专讯。美联社、路透社转播了这一消息。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在唁电中，对许广平的去世表示“极为沉痛”并致以“深切的悼念”。亚非作家常设局、亚非记协书记处敬赠了花圈挽联。日中友协（正统）总部、亚非作家日本联络委员会、日中友好（正统）协会妇女委员会、日中友好宗教者恳谈会、日本妇女同盟东京委员会等团体和中岛健藏、池田幸子等日本人士也纷纷拍来唁电，称颂许广平生前为加深中日两国人民的传统

① 后来在周恩来直接关怀下，由傅崇碧等查明：戚本禹调走鲁迅手稿后，立即交给了江青，一直锁在江青秘书室的保险柜里。

② 张万来《“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真相》，见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五日《人民日报》。

友谊、促进中日两国妇女的友好以及为推动中日文化交流等方面所作的努力。

三月五日下午，许广平的遗体进行火化。按照许广平的遗嘱，她的家属把她的骨灰洒在土地上，实现了她再三嘱咐的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意愿。



第十二章

她活在鲁迅的事业中

许广平生命的大门匆匆关闭了。她在一个灾难深重的年代来到人间，又在一个惨遭浩劫的年代离开人世。近七十年饱经沧桑的生涯，似乎已经耗尽了她的全部精力。许广平并没有把个人死后的哀荣放在心上。她的遗体已经跟一般死者一样随着烈火升腾，当时也没有为她举行哪怕规格最低的追悼会。但是，我们却感到，她真实的生命仍然存在，仍然跃动在鲁迅永生的事业之中……

有人说过：我们这一代鲁迅研究者能够出现，能够成长，都和许广平的业绩密不可分。这决非过誉之词。在林林总总、蔚为大观的《鲁迅全集》中，几乎每篇都渗透了许广平的心血。她在保存和出版鲁迅遗著方面所做的工作，因为前文已经道及，在此不再缕述。需要在这里补充的，主要是她以高度的自觉和炽烈的热情，在鲁迅研究领域所作的努力。

许广平曾经谦逊地说过：“我对于鲁迅先生的著作，自问虽是他的及门弟子，却还终以为受业上是‘未入于室’的程度……”^①她表示愿意作为人民的一分子，跟大家一同来研究

^①《读唐弢先生编〈全集补遗〉后》，原载一九四六年十月上海出版的《鲁迅全集补遗》卷末。

鲁迅。然而许广平跟一般读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她不仅直接聆听过鲁迅的教诲，而且还有着跟鲁迅甘苦与共、以沫相濡的光荣经历。所以她对于鲁迅作品的理解，就有着一些别人未必能够体味到的地方。她对鲁迅的认识，也确有不少给人启迪之处。至于她作为鲁迅夫人所撰写的回忆材料，更具有独特的价值，尤其值得我们珍视。

鲁迅是什么人？

许广平明确指出，鲁迅道道地地是一个普通人，因而也具有普通人的“短处”。她反对把鲁迅当成神，或者当成偶像、化石。但是，许广平也指出了鲁迅还有普通人所不及的地方，那就是：鲁迅是一个终身从不复员的征人，毕生荷戈而绝不解甲的一位能征惯战的战士。他毕生从事文学革命，以文艺为武器进行政治斗争，为革命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鲁迅最可宝贵的品质是什么？许广平在论述鲁迅的一系列文章中，主要指出了四点：

一、对人民。许广平说，鲁迅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做着人民需要做的工作，时刻为中国人民设想，时刻为千百万被压迫人民说话。“革命的爱在大众”，“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些鲁迅笔下的警句，表现了他毕生奋斗的精神和动力。

二、对党。许广平说，鲁迅对党的尊重，是达到最高点的。虽然鲁迅全心全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为之竭诚工作是在一九二七年到了上海之后，但这是他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早在此前，他就已经开始接受无产阶级的理论教育，向往革命，追求真理了。

三、对自己。许广平说，鲁迅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经

常注意检查自己。“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但是更多的是无情的解剖自己”——这表明他经常在进行自我的思想斗争。

四、对敌人。许广平说，鲁迅一生中，都在不容情地跟敌人和落后势力斗争。他总是跟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为着民族生存的需要而奋斗，置身于思想战线的最前列。他从不隐讳自己的政治态度和革命立场，即使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也从来没有动摇过自己的革命坚定性。

许广平认为，学习鲁迅的上述精神，就是对鲁迅的最好纪念。

对于鲁迅博大精深的著作，许广平也发表了很多精辟的看法。其中有些观点，甚至可以视为打开鲁迅著作宝库的一把钥匙。比如，她指出：鲁迅的杂文，以投枪、匕首的姿态出现于文化领域，卓具风格，为这一时代杂文的开山；而其前后一贯的精神，则以激励民族、掘发黑暗为依归。她指出：农民问题，妇女和城市劳动人民问题，知识分子问题，是鲁迅小说中涉及的三个主要问题。而由于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鲁迅对农民又特别熟悉，因此以农民为题材的作品就在鲁迅小说中占有重要而突出的位置。鲁迅一方面为统治阶级对农民的麻醉和愚弄而深感痛心，同时又从长期的生活实践和锐敏观察中，深刻地感到农民悲惨的生活地位不能不导致他们倾向革命和走向革命。她指出：鲁迅书信数量甚大，或抒写心绪，或评论事态，或报告生活事件，不但是编写鲁迅传记的必要材料，而且是一代思想史文艺史的宝贵文献。不过谁跟鲁迅通信最多，未必始终都跟鲁迅意见一致，而与鲁迅极密切的人，反而不大通信。她指出：鲁迅的日记有两种，一种如《马上日记》、《马上支日



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 11 号鲁迅寓所，是他创作《阿 Q 正传》的地方

记》，一看就晓得是带创作性质的；一种是真实的日记，一点也不文饰，确是写给自己看的。他的日记写的大约是不大不小的事。太大了，关系太重要了，当时不便于写出；太小了，没什么意思，也不愿意写出。

对于鲁迅的一些具体作品，许广平也往往根据她所了解的情况提出一些新颖独到的见解。比如，她指出《阿 Q 正传》中的小 D 是阿 Q 的缩影，阿 Q 似的后一代，但他可以发展成觉醒的被压迫者的典型。鲁迅生前就多次跟她谈过：“《阿 Q 正传》还可以续写，就是从小 D 身上发展，但是他不像阿 Q。”一九四八年一月，中华全国文艺协会编过一本《鲁迅文集》，从《故事新编》中挑选的是《非攻》和《出关》。许广平指出，《故事新编》中鲁迅最见功夫的得意之作并不是这两篇，而是《铸

剑》。《唐宋传奇集》序例末行“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几句，曾被解释为影射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广州的政治形势，为不少人所接受。而许广平却指出，这有似《春秋》笔法的几句，其实是讽刺曾经投奔鲁迅门下后来却竖起反叛之旗的高长虹。因为高出于嫉妒，把鲁迅比做暗夜，把许广平比做月亮，而自诩为太阳。鲁迅巧妙地接过这一比喻，向这种躲在黑暗里遥叹的饕蚊给予了旁敲侧击。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这对于我们准确理解鲁迅著作的精髓确是很有裨益的。

许广平说，研究作家的笔名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形成某种作品的时代思潮和文学背景。为此，她根据鲁迅本人的说法和她个人的理解，对鲁迅不少费解的笔名进行了诠释，使读者深受启发。此外，她还写出了不少专题文章，比如：《鲁迅与翻译》、《鲁迅与中国木刻运动》、《关于汉唐石刻画像》、《鲁迅与汉字改革》、《鲁迅先生怎样对待写作和编辑工作》、《鲁迅如何对待祖国文化遗产》等等，从不同侧面展示了鲁迅的光辉业绩。

许广平在文章中，还澄清了对鲁迅的一些误解，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鲁迅和全面地理解鲁迅作品。比如，有人说，鲁迅脾气不好，难以相处。许广平认为这是一种错觉，因为鲁迅跟友人相处的原则是“略小节而取其大”。比如成仿吾，曾经跟鲁迅发生过笔墨之争，但鲁迅后来却帮助他跟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并称赞他“从外表到内里都成了铁打似的一块”。可见鲁迅并非不分立场、不讲原则地日夜纠缠于个人的恩怨。又如，有人因为鲁迅对中医和京剧发表过一些议论，就指责鲁迅对祖国文化遗产持虚无主义的态度，许广平认为，鲁迅对京剧和中医的批评，锋芒所向是封建复古主义，并不是全盘否定京剧、



京剧《阳平关》中的黄忠、赵云（谭鑫培、杨小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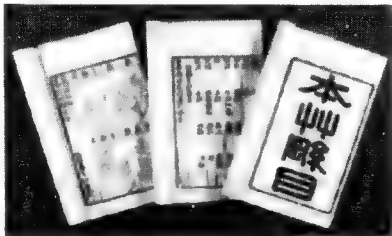
中医本身。鲁迅曾经对京剧提出批评，主要是因为它在旧社会由民间搬上庙堂，被统治阶级及其帮闲文人糟蹋，跟人民对艺术的要求产生了距离。而鲁迅批评的中医，是那种骗取病人钱财的“庸医”。事实上，鲁迅常常称道能用几种简单中草药治愈疾病的“草头郎中”，曾经称赞并推荐《验方新编》上的一些药方。在《南腔北调集》的《经验》一文中，鲁迅还指出中医中药是许多无名氏经验的积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蕴藏十分的医药学宝藏。基于上述情况，许广平反对片面、肤浅地引用鲁迅的个别言论为自己的无知辩护，而要求顾及鲁迅的全人及其著作的全貌。

对于如何深入开展鲁迅研究工作，许广平也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

关于鲁迅传记。她认为，撰写鲁迅传记时，不应将著者的

主观之见强加在鲁迅身上，而应把握住重要历史事件和鲁迅生平史实的内在联系，从头至尾正确地展示出来。她肯定了王士菁《鲁迅传》的长处，又指出了该书的小疵，认为这是中国人自己写出来的，比较客观的一本《鲁迅传》，总算值得一看。

关于鲁迅年谱。她认为，编写《鲁迅年谱》将牵涉到中国近百年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情况，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对史料应去芜存精，严加选择，



《本草纲目》

力求用正确的观点加以阐述，使之跟鲁迅的思想、著作结合起来。在年谱里，应该使鲁迅的活动与当时中外大事取得紧密联系，互相说明，不要使它们互不相干，尤其不要使它们互相矛盾。

关于鲁迅作品注释。她认为，有关鲁迅著作，当时读来很平常，但时过境迁，就会使读者发生疑问。如果忽略了鲁迅著作产生的时间和空间的情况，不用客观的、辩证的眼光加以辨别，那是不容易真正领会的。因此，她希望对鲁迅作品尽可能加以注释，注文务求简明易懂。她曾亲自为《鲁迅全集》拟写注文，以供读者参考。

关于鲁迅佚文。她认为，搜集鲁迅佚文，是研究鲁迅的一件极重要的工作。中国向来是善于作伪的地方，不但可以伪托死人说话，更常有伪作，窜改别人文章，伪造别人书法，以至于伪制历代古物等等劣迹产生。因此，为鲁迅著作搜遗辑补，应该格外审慎，宁缺毋滥。

关于鲁迅回忆录。她认为，鲁迅生前友好从回忆中淘净的

——许广平 传

真实材料，可以正视听，明真实，是研究鲁迅的极好佐证和编写鲁迅传记所不可缺的基石。即使略有误植，也无损于洋溢在那字里行间的亲切友谊的。为此，她热忱推荐许寿裳先生的《亡友鲁迅印象记》，为之联系出版，亲自撰写序言和读后感，尤其盛赞许寿裳先生不畏嫌怨，敢于发人所未发，言人所不言的可贵精神。

回忆自然是沉痛的。许广平曾经谈到，每当回忆起关于鲁迅的一切，她都深为伤恸，时常被泪水蒙住双眼，以致搁笔。但为了鲁迅研究工作的需要，她仍然压抑住悲痛，为我们写下了《欣慰的纪念》、《关于鲁迅的生活》、《鲁迅回忆录》以及其它一些回忆鲁迅的文章。这些回忆之作表现了鲁迅崇高的革命精神和真挚的人情味，使鲁迅的音容笑貌跃然纸上。当然，由于年久失记，她回忆当中也偶有错误。但一经发现，她就本着对历史忠实、对读者负责的精神予以订正。比如她在《鲁迅回忆录》第十三节中，曾将王育和与王方仁混为一人，经人指出后，她就在《文汇报》公开更正，并向当事人和读者表示歉意。

上面，仅根据许广平的文章、谈话和私人信札，粗略地勾勒了她宣传鲁迅、研究鲁迅劳绩的一个轮廓，挂一漏万之处在所不免。但尽管如此，我们也会深切感到，许广平这些工作的意义，决不会被时间的流水冲淡或淹没，反而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来。“鲁翁虽逝雄文在，光辉璀璨照长征。”许广平用生命的甘泉精心浇灌的鲁迅研究园圃，一定会姹紫嫣红，繁花似锦。



附 录

许广平的家庭生活鳞爪

近年来，鲁迅研究领域跟其它科研领域一样，开始突破了“四人帮”设置的重重禁区，展现出空前活跃的局面：很多原先不敢提出的问题现在大胆提出来了，很多原先不能涉猎的事情现在勇于涉猎了，就连鲁迅家庭生活中的细事，也成为了一些读者关心的内容。应该看到，人的真正价值，虽然主要是由其社会实践所决定的，但家庭生活毕竟是人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处理家庭问题上，确能反映人们思想品质、道德情操的一些侧面。鲁迅虽曾反对人们专门留意那些“无关大体的无聊事”，因为这样“只能令人变小”^①，但他并不讳言自己的私生活。一九三二年七月二日，鲁迅在致李霁野信中说：“攻击人的和我自己的私人生活，我以为发表也可以，因为即使没有这些，敌人也很会造谣攻击的，这种例子已经多得很。”基于这种认识，本文想根据有关原始资料，谈谈许广平在鲁迅去世之后是如何处理家庭问题的。

一九三八年十月，许广平曾在《文艺》半月刊二卷二期发表《纪念还不是时候》一文，向九泉之下的鲁迅诉说自己的艰难处境：“你曾说过：‘我有一个担挑，一边是老母，一边是稚子。’

^① 鲁迅一九三六年八月六日致时玳信，见《鲁迅书信集》下卷。

自你死后，不自量力然而也逼于无奈的我，硬担起来了。稚子在旁，体弱多病；提携抚育，废寝忘食。老母在平，年高体衰，生活之需，虽由我勉强筹措；然而亲友无多，相见且难，遑论照料。则其悲戚，谅不待言。所谓事姑育子，诚有未尽。倘精灵不泯，尚荷督我助我，先生先生，我向你伸手了！”

的确，在鲁迅去世之后，许广平抚孤成立非常不易。海婴自幼多病，动不动就咳嗽气喘，只能长期休学在家静养。在他身上，许广平倾注了全部母爱，耗费了大量心血：每天量体温，每周称体重，每月照X光。从一九三八年五月起，每周带他去医院注射三次。海婴因为身体孱弱，经常受到邻近一些顽童的欺侮。有一次，他的锁骨处竟被一个十四五岁的大孩子咬了一口，一圈血红的齿印一个多月都没消退^①。为了使海婴能够在一个气候适宜的环境中健康成长，一些友人敦劝许广平母子到福建去居住，许广平也一度产生过侨居新加坡的念头。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七日，许广平在致郁达夫的信中谈到了自己的矛盾心理和担惊受怕的情绪：“我的孩子，肺部不好，现在医好八九，但仍须每星期打针及照太阳灯，极需营养与空气，恐福建也不大适宜。其实孩子身体已好了不少，不过我眼睁睁看见周先生活生生地一旦死去，所以对于他不得不加倍小心。有时他病了，或不甚要紧，但我却总会怕他也突然死去，我是给死骇怕了。去新（按：指新加坡）之意，也因于此，但是另外还有许多困难，未必去了一定于他适宜，这恐很难说，所以此刻也没有一定打算动身之意，承先生愿意听取意见，故不觉

^① 景宋《扁桃腺》，见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华美周报》一卷三十六期。

写了许多。”^①

一九四〇年，又有友人致函郁达夫，请他帮助许广平母子在南洋寻找安身之所。但许广平考虑到保存鲁迅遗物的需要，以及当时客观环境的限制，仍决定留在上海。同年一月，许广平在致郁达夫的另一封信中就再次抒发了孤儿寡母含辛茹苦的心声：“海婴体弱，哮喘时发，不得不多方医治。每月生活费及医药（非常贵）以及营养等费，只他一人就有时至百金以上；其余共计每月非二三百元不可，如何能继续得久远呢。有医生说，最好到热带地方去，气候暖，海婴不易感冒，慢性气管炎或可能好起来，免成终生废人（现在不能读书）所以一面欲乘此减轻生活的负担，以职业所得来维持二人生活，一面也望如此他可能健康起来。去秋两人又病了。先是他病，后来传给了我。总之体弱即易罹一切灾症，有些朋友看到不忍，就多方设法，给谋出路。因此有写信给先生之事，但闻出国护照，现在国际关系复杂，多所限制，不易批准，如非有职业在彼，或不易弄到，现时只能在沪勉强支持着，找些小事做做，再待机会，未悉先生以为如何？”^②

抗战胜利之后，人民浴血奋斗赢得的战果，又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的血泊所淹没。在那风雨如磐的苦难岁月里，竟连十几岁的海婴也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迫害。当时，因为海婴辍学在家，许广平让他在家自学无线电知识，练习无线电收发。结果被用汽车载着探测器四处侦察的国民党特务发现。草木皆

^① 许广平《文人的穷》，见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副刊《晨星》。

^② 载一九四〇年二月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副刊《晨星》，题为“孤寡之声”。

• 许广平 传

兵的特务们气势汹汹地冲进门，对许广平严加盘查。当得知海婴是鲁迅的儿子之后，特务更是如临大敌，决定继续加以监视。为了免遭不测，许广平只好让海婴避居香港。相依为命的母子就这样一度被迫离散^①。

为了赡养鲁迅的老母，许广平也是任劳任怨，艰苦倍尝，作出了重大的自我牺牲。

从许广平与鲁迅相识直至鲁迅去世之前，鲁迅母亲跟许广平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极为融洽的。在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期间，鲁迅因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而迭遭北洋军阀政府迫害，被诬为“学匪”。面对这种情况，母亲毫不责怪这些“毛丫头”多事连累了她的儿子，也没有利用“母权”对儿子的行动横加干涉。相反，她非常喜欢这群“毛丫头”到来，常跟她们详尽地讨论时事问题。遇到不平之处，大有慷慨激昂，愿意骂倒一切之状，反而惹得鲁迅好笑起来了，说：“娘何必这样生气呢？”^②鲁迅与许广平同居之后，许广平的家人和周作人都将他们的结合视为“非法”，不予承认，但开明的母亲却赞助这场婚事。一九二九年五月鲁迅从上海北上省亲。母亲一见面就问：“害马为什么不同来呢？”^③当母亲知道许广平怀有身孕不便长途旅行时，很高兴地说：“我想也应该有了，因为这屋子里，早应该有小孩子走来走去。”当时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对许广平怀孕很感气忿，而母亲却大不以其忿之举为然^④。所

① 许广平《新时代的喜悦》，收入《民主与自由》一书。

② 景宋《母亲》，见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二集《原野》。

③ 鲁迅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五日致许广平信，见《鲁迅致许广平书简》。

④ 鲁迅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七日致许广平信，见《鲁迅致许广平书简》。

以鲁迅五月十九日致许广平信中说：“母亲……对于我们的感情是很好的。”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鲁迅再次北上省亲，母亲对许广平和海婴同样表现出了十分真挚的感情。鲁迅十一月十九日致许广平信说：“她和我们的感情很好，海婴的照片放在床头，逢人即献出……”由于母亲对许广平十分惦念，所以鲁迅每次写家信都要提及许广平的情况，即使许广平偶患感冒或犯胃病，鲁迅也要向母亲禀报^①。一九三五年三月，母亲还曾想到上海居住。后来可能因为没有可靠的人护送，未能成行。每当想到失掉了这一团聚的机会，母亲总感到极为难受。

鲁迅去世之后，母亲精神上承受了一场惨重的打击。她虽然态度镇静，不怎么哭，然而却两腿发抖，艰于行止。在这种悲怆的心境中，母亲仍不忘抚慰远在上海的儿媳。她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多次满怀感念之情地写道：“你因佩服豫才，从以终身。现在豫才盖棺论定，深得各国文人推崇，你能识英雄于草昧，也不失为巾帼丈夫。已有一部分的人，很在赞扬你呢。”“自从大先生过去后，一切事体赖你主持。家中老的老小的小，如无你这样一位能干而贤慧的人，我更要痛苦呢。”“我并非同你客气，这真是我的福气。我家有你这位贤淑又能干的人，又这般能体贴我，我一直是将你看作自己的女儿一样。”一九三七年初，许广平曾想北上侍奉母亲。但母亲耽心她受到周作人夫妇的欺侮，忍痛劝阻了。她在信中百般体恤地写道：“昨日许先生（按：指许寿裳）和宋先生（按：指宋紫佩）来我这里，谈起你来平的事，大家都觉得有困难。他二位走后我静静一想，这事实难。

^① 鲁迅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日、八月二十五日致母亲信，见《鲁迅致许广平书简》。

我虽然很想见你同海婴，但我真怕使你也受到贤媳（按：指朱氏）他们一样的委曲。大太太（按：仍指朱氏）当然是不成问题，不过八道湾（按：指周作人家）令我难预料。”

对于这样一位慈祥的母亲，许广平是十分尊崇爱戴的。一九三七年三月，许广平在《工作与学习丛刊》二集《原野》发表《母亲》一文，以细腻的笔触记述了鲁迅母亲给她留下的极其深刻的印象：慷慨，好学，坚强，勇于接受新事物……这篇文章，是迄今为止有助于我们了解鲁迅母亲思想品德的一份最详尽最生动的珍贵史料，也是许广平对鲁迅母亲的最好纪念。许广平对母亲的感情，并非仅仅停留在书面和口头。为了使母亲能够在兵荒马乱的岁月中维持较为安定的生活，许广平作出了十分感人的努力。从鲁迅去世至一九三七年七月，许广平通知北新书局按月从鲁迅著作的版税中支付给北平方面一百元生活费。从七七事变发生至一九三八年六月，这一年当中许广平没有分文收入，但仍坚持每月供给北平方面百元。一九三八年七月至一九四〇年四月，许广平得《鲁迅全集》初版、再版、三版的稿费四千余元，她从中支付北平方面的生活费就有一千三百余元。所余款项，除需维持上海方面的生活外，尚需偿还鲁迅印书，生病和治丧的欠款。故在此期间，许广平亏空的款项多达一万余元。母亲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曾多次感激地说：“寄来的钱收到了，当我接到这笔钱的时候，同时感到不安，为了想象你筹措时的困难；但也感到愉快，因为我有这样的儿媳。你们在上海倒是如何过着呢？”“并闻上海百物奇昂，你现在一无进项，如何苦度，颇为念虑。本来我的月费可以缩减，因念你仰体先夫遗志，再三嘱我宽心，一片孝思，情至可

感；所以我仍照旧支取。其实我概不出门，花销已省，等到相当时期，节余若干，再行归作家用。明知杯水车薪，无济实用，不过总算我帮助你的一点意思，也是表示我知道你的艰苦，可怜你的难处。”她还多次叮嘱许广平保重身体：“贤媳发已半白，皆因劳心过度，亦拟善自休养为要。”“信中言每夜编书至二三时，此于卫生大碍，望勿劳苦太甚为盼。”

与此相反，周作人当时虽然高官厚禄，每天家中开几桌饭都说不清楚，却不尽奉养老母之责。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李霁野在致许广平信中谈到这一情况说：“老太太的精神甚佳，不过经济方面，二先生（按：指周作人）仅于今年送过十五元零用。他们夫妇也间月轮流去一次，坐坐而已，小孩们是不上门的……他现在每月孔德领百至百五十元，燕京八十，基金会译书他自言已不作，传说教育部（北京）每月二百元（但此尚待调查，有人说没有）。丰一（按：周作人长子）在孔德和燕京教书，得薪当在百元以上。等他自动负责恐无望，老太太也不肯找他去。”同年九月三十日，李霁野在给许广平信中又说：“近日知基金会仍照付稿费给二先生，十月起为每月百六十元。所以他的收入约在四百，似可担任养母用度。你无妨写信一问，看他怎样的态度。”后来许广平在单独负担母亲全部生活费用两年之后，实不获已，才写信给周作人要求跟他分担。周作人并不回信，只由母亲来信转告，说他同意分担一半（五十元），不过母亲的意外开销仍要许广平设法。虽然许广平在这一问题上做到了仁至义尽，但仍有人从中挑拨，胡说许广平如何如何有钱，以此离间母亲跟她的关系。为了戳穿这种流言，秉性忠厚的许寿裳先生以鲁迅老友的身份仗义执言。一九四〇年四

月八日，许寿裳在致鲁迅母亲信中说：“前上一笺，谅登几右。顷得景宋复书，报告在沪窘状甚详，至今亏空至一万余元，从不奉告左右，闻之不胜同情。自豫才去世，专赖她一人夙夜努力，含辛支撑，孤儿得以抚养，全集得以出版，实为伯母膝下之光。平沪远隔，真相不易明了。侄颇疑有妒忌者挑拨离间，想伯母仁厚明智，必能深谅景宋之苦心，而窥破小人之奸计也。”

在鲁迅的原配朱安身上，一些流言家做的文章最多：有的说鲁迅跟她感情的破裂是由于许广平从中作梗；有的说许广平为了钱跟朱安争夺《鲁迅全集》的出版权；一班乌烟瘴气的“文学家”甚至说朱安本是鲁迅的“佳偶”，而鲁迅却为讨姨太太而离弃“正妻”，实为思想落伍者云云。一九四八年五月，有一个文痞“史天行”还在《创世》第十五、十六期发表《鲁迅逸事》一文，胡说朱安穷得不堪，“把所有的东西都卖空吃空，几乎要自尽了。”

众所周知，鲁迅一九〇六年夏天从日本归国与朱安结婚，完全是出于封建家庭的包办。举行婚礼那天，鲁迅表现得阴郁沉闷，第二夜就睡到书房去了。^①按照当时老例，新婚夫妇要去祠堂，但鲁迅却没有去。同月，鲁迅即复归日本。由此可见，他对这桩婚姻是很不满意的。后来鲁迅跟友人谈起朱安时多次说过：“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这是母亲给

① 这是根据在鲁迅家当佣工长达三十年之久的王鹤照的回忆，见周芾棠《乡土忆录——鲁迅亲友忆鲁迅》第五页，一九八三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鲁迅亲友周作人、周冠五等也一致证明鲁迅与朱安自成亲之日起就形同陌路，对这种包办婚姻就极为不满。但最近有一本叫《真假鲁迅辩》的书，考证鲁迅与朱安并不分居，而是从夏天同居到秋天，原来的说法均属“谎言”，不知何据？不知何意？

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显然，早在许广平闯入鲁迅的生活之前，鲁迅与朱安之间就毫无感情可言，根本无需乎许广平“作梗”。合乎道德的婚姻，必须以爱情为基础。把鲁迅和许广平的结合视为“非法”完全是一种陈腐的封建观念。对此，许广平在《为了爱》一诗中曾予以严正回答：

一切的经过，
看《两地书》就成，
那里没有灿烂的花，
没有热恋的情。

我们的心换着心，
为人类工作，
携手偕行。

你孤独了的一生，
书中没有说起女人，
在十年以前。

过渡的时代，
自己“肩了黑暗的闸门”
让别人生存。
朋友多晓得你，
我的爱人！

在深澈了解之下，
你说：“我可以爱。”
你就爱我一个人。

我们无愧于心，
对得起人人。

此刻——
有些人忽然要来清算，
横给我们罪名。
说什么：“每星期都有信。”
好似我从中作梗。

.....

卑鄙的血液染黑了心，
封建的思想盘据着神经。
他们想拿法律，
杀害普天下人！

在亚当夏娃的心目里，
恋爱结合神圣；
在将来解放的社会里，
恋爱，再——
志同道合，成就婚姻。

那言语不通，
志向不同，
本来并不同在的，
硬说“佳偶”，
就是想污蔑你的一生。

真理或有时存在，
我将依着进行。
所有那些狡计，
让他发昏。^①

抗战期间，由于百物腾贵，朱氏多病，长期雇佣保姆，因此她曾希望许广平增付她的生活费用，但绝无争夺《鲁迅全集》的版权的事情。早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朱安在致许广平信中就明确表示：“闻先夫鲁迅遗集全部归商务书馆出版，姊甚赞成。所有一切进行以及订约等事宜，即请女士就近与该书馆直接全权办理为妥。所以许广平与朱安争夺版权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对于朱安的生活费用，许广平也是一直负责到底的。一九四五年底，一九四六年初，北平有人发起“为鲁迅遗族募捐”事，其中有些社会贤达确实殷殷关怀鲁迅家属的生活，但也有人想乘机玷污鲁迅一生的名节，或达到其它不可告人的目的。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四日，蒋介石派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郑彦芬送给朱安十万元法币。朱安谢绝了社会上的捐

^① 景宋《为了爱》，见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中流》一卷十一期。

款，但却以“长官赐不敢辞”为理由接受了蒋介石的赠金。为了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得逞，许广平在报上公开声明“当竭尽微力”维持“平方生活”，谢绝社会上的资助。她又写信给朱安说：“你的生活为难，我们是知道的，而且只要筹得到，有方法汇寄，总想尽方法的，以前知道寄款不易，在胜利前先托人带上巨款，也是此意。……来信说不肯随便接受外界捐助。你能够如此顾全大局，‘宁自苦，不愿苟取’，深感钦佩。我这些年来一切生活不肯随便亦是如此。总之，你的生活我当尽力设法，望自坚定。社会要救助的人很多，我们不应叫人费心。至于报上说有人想捐一笔款，买下藏书，仿梁任公办法放图书馆内，我们不赞成的，大先生作品、藏书、什物送人也不赞成，想你也不会赞成的。如果有人说，谢绝好了。”对于许广平的长期资助，朱安曾多次表示感激。她临终前一周（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三日）致函许广平说：“我的病恐怕好是不容易的事……您对我的关照使我终生难忘。您一个人要担负两方面的费用，又值现在生活高涨的时候，是很为难的。”临终前一天，她神智甚清，曾对来访的记者说：“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不断寄钱来。物价飞涨，自然是不够的，我只有更苦一点自己。她确实是个好人。……”^①六月二十九日，朱安病逝。逝世前，她将麻料里子一块、蓝绸裤料一块送给许广平以作纪念。去世后，家中剩米有一百三十余斤，存煤约五千斤，根本不是史天行所说的那样，“把所有的东西都卖空吃空”了。朱

^①《朱夫人寂寞死去》，见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南京《新民报》日刊。

安去世之后，周作人老婆羽太信子及其妹羽太芳子急如星火地赶到西三条鲁迅故居抢东西，后被许广平友人刘清扬、常瑞麟等制止，方未得逞。

一九三二年六月五日，鲁迅在致台静农信中说过：“负担亲族生活，实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以至头白……”鲁迅去世之后，这副生活重担几乎全部落到了从三十八岁就开始孀居的许广平身上。无怪乎许广平生前曾多次感慨良深地对海婴说：“海婴，你要知道，我作为一个女人，在你爸爸死后要生活下去，是多么的不容易！”这“不容易”三个字，真不知包含了许广平亲历的多少艰难、困苦，屈辱、辛酸……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居然却还会从不知什么角落冒出一些流言蜚语。正因为如此，撰写这篇看来琐细的文章，似乎不无意义的罢。

许广平活动简表

(一九四八年十月至一九六八年三月)

一九四八年

十月

解放战争进入反攻阶段。许广平在党组织安排下，由上海经香港，秘密转入东北解放区。当时东北光华书店、东北书店先后支付了一批出版鲁迅著作的版税。许广平放弃了东北书店的版税，仅留下赠书一册，以作纪念。光华书店的版税，许广平则让海婴兑换成五根金条，全部捐赠给东北鲁迅文艺学院。

一九四九年

一月

十二日，被选为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委会筹备委员，又被选为筹委会常委。

二十二日，列名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人物及其他民主人士五十五人发表的《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表示坚决拥护中共毛泽东主席十四日声明中所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假“和平”阴谋，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团结一致，将革命进行到底。

二月

二十五日，由东北抵北平。

二十六日，出席北平市为欢迎经由东北、天津、石家庄来平及原在平的民主人士而举行的盛会。

三月

三日，出席华北人民政府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和华北文艺界协会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文艺茶话会并发言。

二十四日，参加在北平怀仁堂召开的中华全国妇女第一届代表大会，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统治区妇女代表团正团长。

二十八日，列名于《中国文化界响应召开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宣言》。

四月

三日，中华民主妇联宣告成立，被选为妇联执行委员。

二十日，在捷克布拉格参加世界拥护和平大会。此次会议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在巴黎和布拉格同时举行。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布拉格举行的大会，于五月二十五日途经西伯利亚归国。

五月

二十七日，出席全国妇联欢迎中国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妇女代表的茶会。

六月

参加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工作小组赴上海。二十六日，出席上海新青团妇女部、学联女同学部、中国民主妇联上海分会，上海妇女联谊会等三十六个妇女团体联合召开的庆祝妇女解放大会并作发言。

七月

三日，出席中国妇联上海分会召开的欢迎会并作发言。

四日，以文协代表身份参加上海市文艺工作者纪念七七庆祝解放大会，并作发言。

二十四日，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委员。

九月

二十一日至三十日，以中国民主促进会正式代表身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整顿委员会委员，并被举为全国政协委员。

十月

三日，任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

五日，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理事。

十九日，出席全国文联，总工会，青联，学联，妇联和北京市的工会、中小学教职员联合会、院校教职员联合会等十二个团体发起的鲁迅逝世十三周年纪念会，并作发言。大会一致通过决议，请人民政府在北京和上海的适当地点建立鲁迅铜像和整理鲁迅故居，建立鲁迅纪念馆。

同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三次会议上被任命为政务院副秘书长。

十七日，出席北京师范大学纪念鲁迅逝世十三周年晚会并作讲演。

二十六日，参加十月革命庆典代表团再次赴苏并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民主妇联理事会会议。

十一月

十七日，以中华全国民主妇联副主席身份赴苏联莫斯科参加国际民主妇联理事会，并作发言。

十二月

四日，从莫斯科返回北京。

一九五〇年

七月

将北京官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鲁迅故居及有关遗物全部捐献国家，计有土地五分六厘，瓦房七间，灰顶房七间，树木九株，图书五千一百九十五册又二百七十四件，金石拓本四千零三十张，家具文物等三百九十三件。文化部为此颁发了褒奖状。

十月

十八日，将鲁迅著作出版权和全部版税上交国家出版总署。捐赠皖北、苏北、河北、河南灾民寒衣劝募总会北京分会

——· 许广平 传

救灾寒衣代金两亿元（折合现人民币两万元）。十八日，劝募总会北京分会主任委员张友渔等来函感谢。

十一月

三日，在上海市民主妇联召开的报告会上讲访问朝鲜见闻，并传达二届人代会议精神。到会者有上海各界妇女代表六百人。

十九日，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三届二中全会。

一九五一年

一月

二十八日，参加首都各届妇女抗美援朝，反对美帝重新武装日本爱国大会，为主席团成员，会后与四万妇女一同示威游行。

五月

六日，在天津《进步日报》发表《悼念史沫特莱》一文。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刊《民进》编辑委员会委员。

七月

《欣慰的纪念》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八月

任中国民主促进会爱国武器捐献委员会委员。

十月

十九日，出席首都各界联合主持的鲁迅先生逝世十五周年纪念大会。

同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文章《不容情地对敌战斗》。

十一月

率人民政协参加广东省土地改革工作团百余人经武汉赴广州，分别前往四会、新兴和恩平等县参加土改。

一九五二年

八月

五日，在中国民主促进会全国组织宣教工作汇报会议上作《三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组织、宣传、文教工作报告》。

九月

二十三日至十月七日，参加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为主席团成员。会上被选为全国文联第二届委员。

一九五三年

四月

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出席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

· 许广平 传

二十五日，在中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第二届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妇联常务委员兼副主席。

九月

二十三日至十月四日，参加中国文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为主席团委员。

二十三日至十月六日，出席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十月

二十四日，应苏联妇女反法西斯委员会邀请，率中国妇女代表团赴苏参加十月革命三十六周年庆典。

一九五四年

三月

六日，任全国人民慰问解放军代表团第二总分团副团长，本日乘机抵乌鲁木齐，受到新疆军区指战员一万六千余人的热烈欢迎。

八日，在乌鲁木齐市各族妇女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上讲话。又赴新疆分局、省人民政府、新疆军区的宴会和欢迎大会。

十八日，在慰问乌鲁木齐市烈军属大会上致慰问词。

二十七日，慰问伊犁区驻军。赴三区革命领袖阿合买提江等烈士墓敬献花圈。

六月

《关于鲁迅的生活》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九月

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作为广州市人民代表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主席团成员。十七日在大会发言。二十七日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十月

二十五日，被选为全国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十二月

二十九日，任中苏友协总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

一九五五年

二月

一日，率中国妇女代表团出席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理事会，本日离京赴日内瓦。

四月

十四日，被选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书记处成员。

六月

十九日至九月十八日，率中国越剧团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和苏联作访问演出。团员有著名越剧演员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等七十余人，演出剧目有《梁山伯和祝英台》《西厢记》《断桥》《打金枝》《拾玉镯》《盘夫》等。

一九五六年

二月

九日至十六日，参加民主促进会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

会议确定“一切为了社会主义，更多更好地贡献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民进的根本任务。

四月

二日，以全国妇联副主席身份参加接见全国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会议全体代表以及港澳工商界妇女观光团全体人员。

八月

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出席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二十三日被选为民进中央委员。二十四日被选为民进副主席。

四日，率出席第二届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代表团离北京赴日本。此次会议在东京、长崎两地连续举行，六日开幕，十一日闭幕。

十月

十日，携海婴夫妇赴绍兴参观鲁迅纪念馆，次日乘乌篷船访安桥头鲁迅外婆家。

十四日，参加上海虹口公园鲁迅墓迁墓典礼并致词，葬礼毕，又跟海婴夫妇一同参观鲁迅纪念馆。

二十八日，在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和民进北京市分会召开的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作报告，题为“学习鲁迅以身作则教育青年的伟大精神”。

一九五七年

六月至八月

先后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的第二十五次党组扩大会议，并在八月十四日的第十七次会议上发言。

九月

九日至十月二十日，出席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作发言。

二十一日，被全国妇联第三届执委会选为全国妇联副主席。

一九五八年

二月

一日至十一日，出席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为

主席团成员。

三月

十二日，参加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组织的中国人民欢迎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十四日晚乘火车离北京，十五日晚到达祖国边境的英雄城市安东，十六日参加在安东举行的中国人民欢迎志愿军归国大会。

七月

三日，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常务委员。

十六日至二十二日，随郭沫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赴瑞典斯德哥尔摩出席裁军和国际合作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来自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千二百多名代表和观察员。

九月

五日至八日，出席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

十月

七日至十三日，随茅盾、周扬、巴金率领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出席在苏联塔什干举行的亚非作家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亚非两大洲三十多个国家的一百八十多位作家，以及欧洲、美洲、澳洲的一百多位作家。

十一月

十七日至十二月九日，出席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三次全国代

表大会，被选为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十二月

十日，被选为民主促进会副主席。

一九五九年

四月

二十九日，被选为中国人民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五月

三日，出席首都各界人民和青年纪念五四四十周年的盛大集会并讲话，号召发扬五四的爱国精神和革命精神，以自己创造性的劳动，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

七月

十三日至八月十三日，阅读《鲁迅日记》以及鲁迅其它著作，旁及一些有关鲁迅研究资料和世界名人回忆录，准备撰写《鲁迅回忆录》。

八月

中旬至十一月底，抱病完成《鲁迅回忆录》初稿，共十三节，九万五千字。

一九六〇年

三月

三十日至四月十日，参加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为主席团成员。

二十九日至四月十一日，参加政协全国委员会二次会议。

七月

二十二日至八月十三日，参加第三次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被选为文联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文联副主席。

八月

二十五日至九月六日，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

十月

正式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六一年

三月

十七日至四月十五日，率中国妇女代表团赴日访问，在二十九天中，共经历了二十七个城市，与日本人民进行了广泛接触。四月五日，赴仙台参加了鲁迅纪念碑揭幕典礼。

五月

二十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举行的第十七次扩大会议上谈访日观感。

《鲁迅回忆录》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六月

十八日，出席中苏友协，中国作协和北京市中苏友协联合举办的高尔基逝世二十五周年紀念会。

九月

二十五日，参加首都文艺界及其他各界人士纪念鲁迅八十八诞辰大会，为主席团成员。周恩来出席大会，郭沫若致开幕词。茅盾作报告。

一九六二年

三月

二十七日至四月十六日，参加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

二十三日至四月十八日，参加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四月

十九日至二十六日，参加民主促进会中央工作会议。

九月

三十日至十月十一日，随彭真同志率领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访问越南。

一九六三年

五月

四日，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以卡马拉·洛福夫人为团长的几内亚妇女代表团。

出席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扩大的第二次会议。

七月

十三日，陪同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接见出席世界妇女大会后来华访问的巴西、科摩罗、印度尼西亚、莫三鼻给、尼泊尔、委内瑞拉、越南南方、桑给巴尔等国妇女代表团。

八月

十七日，在太原山西省政协召集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谈学习、思想改造和政协工作问题。许广平在讲话中着重谈了国内国际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的伟大成就，勉励大家团结一致，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二十二日，在民盟山西省委员会，民进太原市委员会联合举行的报告会上介绍鲁迅战斗的一生。

十一月

七日至十二月三日，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

十七日至十二月四日，出席政协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
会议。

一九六四年

十二月

二十日，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成员，并任三届人大预算委员会委员。

二十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四日，参加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二十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五日，参加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一九六五年

一月

三日，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五日，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十月

二十四日，任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委员。

一九六六年

六月

二十七日至七月五日，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

十月

三十一日，出席首都各界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周年大会并作发言。

一九六八年

二月

十七日，因鲁迅全部书信手稿以及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的十五页手稿被江青指使戚本禹调走，一时下落不明，北京鲁迅博物馆革命大联合勤务组来函要求追查。

三月

二日，起草致中央文革信，准备连同鲁迅博物馆致中央文革信一并上交有关方面。

三日，因连日受鲁迅手稿一时下落不明刺激，在友人凌山家突发心脏病，不幸逝世。

许广平著述编目

I 文集

《两地书》(鲁迅与景宋通讯)

一九三三年四月北新书局以上海青光书局名义出版。鲁迅编。原题为“鲁迅与景宋的通信——《两地书》”。全书分三集，收录鲁迅与许广平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九年间在厦门、广州、上海、北京的通信一三五封，其中景宋致鲁迅书信六七封。

《遭难前后》

一九四七年四月上海出版公司出版。本书记述了作者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一九四二年三月一日被日本宪兵队拘捕的经过。卷首有郑振铎序。内容分二十一节：①人民立场的我；②遭难的开始；③被押解后；④囚徒生活开始；⑤囚室一瞥；⑥难友；⑦四天；⑧凌辱的试炼；⑨稍息；⑩再炼；⑪受刑之后；⑫一号囚室；⑬撒谎；⑭我的感想；⑮新房子；⑯我的抗议；⑰又一次搬迁；⑱朝鲜姑娘；⑲“我不知道”；⑳在七十六号；㉑无可补偿的损失。

《欣慰的纪念》

一九五一年七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书辑录了许

广平在鲁迅逝世以后所写的回忆和纪念鲁迅的文章十五篇：《研究鲁迅文学遗产的几个问题》、《鲁迅先生的日记》、《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鲁迅先生与女师大事件》、《鲁迅和青年们》、《鲁迅先生的写作生活》、《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鲁迅先生的娱乐》、《鲁迅先生的香烟》、《鲁迅先生的学习精神》、《鲁迅先生与家庭》、《母亲》、《鲁迅先生与海婴》、《忘记解》、《在欣慰下的纪念》。卷首影印了许广平《献词》手迹，书末有王士菁作的《编后记》。

《关于鲁迅的生活》

一九五四年六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书辑录了许广平《欣慰的纪念》一书未收的有关回忆和纪念鲁迅的文章十一篇：《鲁迅的生活之一》、《鲁迅的生活之二》、《因校对〈三十年集〉而引起的话旧》、《关于鲁迅先生的病中日记和宋庆龄先生的来信》、《片断的记录》、《元旦忆感》、《琐谈》、《青年人和鲁迅》、《鲁迅与旧中国木刻运动》、《从鲁迅的著作看文学》、《不容情的对敌战斗》。

《鲁迅回忆录》

一九六一年五月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是作者对鲁迅先生的思想、工作、生活各方面的追忆与记述，初稿曾在一九六〇年《新观察》杂志第三至第十三期连载，后集成单行本。卷首为作者的前言，略述写作经过。内容略按时间分成《五四前后》、《女师大风潮与“三一八”惨案》、《鲁迅的讲演与讲课》、《北京时期的读书生活》、《所谓兄弟》、《厦门和广州》、《我又一次当学生》、《内山完造先生》、《同情妇女》、《向往苏联》、《瞿秋白与鲁迅》、《“党的一名小兵”》、《为革命文化事业而奋斗》

十三个章节。

《鲁迅回忆录》

一九七六年十月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辑入鲁迅研究室所编《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本书辑录了许广平在《欣慰的纪念》和《关于鲁迅的生活》两书中未收的有关回忆和纪念鲁迅的文章十一篇，计有《最后一天》、《鲁迅先生的晚年》、《鲁迅先生怎样对待写作和编辑工作》、《略谈鲁迅对祖国文化遗产的一二事》、《关于汉唐石刻画像》、《景云深处是吾家》、《鲁迅故居和藏书》、《鲁迅手迹和藏书的经过》、《鲁迅年谱的经过》、《鲁迅在日本》、《仙台漫笔》。

（以上为著述）

《夜记》

景宋编校。一九三七年四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本书是鲁迅逝世后，遵照鲁迅生前意愿，由景宋编校的鲁迅逝世后出版的第一本杂文集。共辑集鲁迅杂文十四篇。卷末有景宋所作《编后记》。

《鲁迅书简》（影印本）

景宋编次。一九三七年六月上海三闲书屋出版。本书搜集了鲁迅致国内外人士和团体的书简手稿六十七封，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影印出版。

《且介亭杂文末编》

景宋编校。一九三七年七月上海三闲书屋出版。本书根据鲁迅生前编定的《且介亭杂文》体例，辑录了《且介亭杂文》第一、二集未及收集的鲁迅杂文三十五篇。书末有景宋所作《后记》。

《集外集拾遗》

景宋编校。一九三八年五月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本书收录了鲁迅自编文集以及《集外集》之外的鲁迅佚文、佚诗、译文八十八篇，系年排列。书末有景宋《编后说明》。

《译丛补》

景宋编校。一九三八年六月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本书按鲁迅《壁下译丛》体例辑成，收录鲁迅散佚译文，其中有论文十七篇、小说十一篇、杂文八篇、诗三首。卷末有许广平撰写的《编后记》和《编后再记》。

《鲁迅全集》（二十卷本）

景宋主编。一九三八年八月一日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出版。本书收录了当时已经发现的鲁迅全部著述和译作，共二十卷，计收创作、论著、辑录、考证二十九种，译著三十二种。由鲁迅纪念委员会组织班子集体编校并出版。卷末景宋写了《编校后记》。

《鲁迅三十年集》

景宋编校。一九四一年十月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本书收录鲁迅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三六年间的创作、论著、辑录和考证计二十九种三十册。为减轻读者负担，同时也受经费和出版条件限制，本书未收录鲁迅的译作。卷末有景宋作《〈鲁迅三十年集〉印行经过》。

《鲁迅书简》（上下册）

景宋征集编校。一九四六年十月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本书搜集了鲁迅致国内外人士和团体书信八百余封，卷末有景宋作《编后记》。

《萧伯纳在上海》

乐雯等编译。本书收集了萧伯纳访问上海期间上海中外报纸有关他的记载和评论。材料由鲁迅、瞿秋白圈定，杨之华、许广平共同剪贴。鲁迅作序。一九三八年三月上海野草书屋印行。

（以上为著述）

《小彼得》

德籍匈牙利女作家海尔密尼亚·至尔·妙伦原著，是连贯的六篇童话故事。许广平根据日本林房雄的译本重译。鲁迅大加校改，并为之作序。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上海春潮书局出版时译者署名“许霞”。一九三一年一月联华书店重印时署“许广平译”。

（以上为翻译）

II 文章

（一九二三——一九六八）

《关于爱情定则的讨论》

署名维心。载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五日《晨报副刊》第一三七期。

《公园和少年》（一九二三.九.七.）

署名归真。载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八日《晨报副刊》第二三八期。

《十六周年纪念会颂辞》

署名许广平。载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三日《北京女子师范大

学十六周年纪念刊》。

《庚款作教育基金后应多量供给女子教育事业的我见》

署名寒潭。载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日《京报副刊·妇女周刊》第一期。

《告读本刊者》

署名君平。出处同上。

《致鲁迅》(一九二五.三.十一.)

署名许广平。收《两地书》第一集：北京(一)。

《致鲁迅》(一九二五.三.十五.)

署名许广平。收《两地书》第一集：北京(三)。

《北京女界一部的的问题》

署名持平。载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八日《京报副刊·妇女周刊》。

《致鲁迅》(一九二五.三.二十.)

署名许广平。载《两地书》第一集：北京(五)。

《评〈现代评论〉“女师大的风潮”》

署名正言。载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京报副刊》第九十八号。

《致鲁迅》(一九二五.三.二十六.)

署名许广平。收《两地书》第一集：北京(七)。

《致鲁迅》(一九二五.四.六.)

署名许广平。收《两地书》第一集：北京(九)。

《致鲁迅》(一九二五.四.十.)

署名许广平。收《两地书》第一集：北京(十一)。

《致鲁迅》(一九二五.四.十六.)

署名许广平。收《两地书》第一集：北京（十三）。

《致鲁迅》（一九二五.四.二十.）

署名许广平。收《两地书》第一集：北京（十四）。

《致鲁迅》（一九二五.四.二十五.）

署名许广平。收《两地书》第一集：北京（十六）。

《致鲁迅》（一九二五.四.三十.）

署名许广平。收《两地书》第一集：北京（十八）。

《乱七八糟》（杂感三则）

署名非心。载一九二五年五月八日《莽原》周刊第三期。

《致鲁迅》（一九二五.五.九.）

署名许广平。收《两地书》第一集：北京（二十）。

《致鲁迅》（一九二五.五.十七.）

署名许广平。收《两地书》第一集：北京（二十一）。

《怀疑》（一九二五.五.十七.）

署名景宋。载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五日《莽原》周刊第五期。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七日许广平致鲁迅信：“满腹的怀疑，早已无从诉起，读了《编完写起》，不觉引起了要说的几句话，在忙里偷闲中写出来。不知吾师将‘感激涕零’而阅之否？”据此，此文写于五月十七日。

《致鲁迅》（一九二五.五.二十七.）

署名许广平。收《两地书》第一集：北京（二十三）。

《六个学生该死？》（一九二五.五.三十一.）

署名伤时。载一九二五年六月三日《京报副刊》第一六八期。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许广平致鲁迅信：“昨日（星期）看了西滢的《闲话》，做了一篇《六个学生该死》，……今请先生

阅之，如伏园老头子不害怕，而稿子还可以对付，可否仍送《京副》。但其中许多意思，前人已屡次说过，此文不过尔尔。”据此，此文写于五月三十一日。

《致鲁迅》（一九二五.六.一.）

署名许广平。收《两地书》第一集：北京（二十五）。

《致鲁迅》（一九二五.六.五.）

署名许广平。收《两地书》第一集：北京（二十七）。

《酒瘾》（一九二五.六.十二.）

署名景宋。载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九日《莽原》周刊第九期。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许广平致鲁迅信：“今夕‘微醉’（？）之后，草草握笔，做了一篇短文，即景命题，名曰《酒瘾》。……如其得逃出‘白光’而钻入第十七次及第，则请赐列第□期《莽原》的红榜上坐一把末后交椅……”据此，此文作于六月十二日。

《致鲁迅》（一九二五.六.十二.）

署名许广平。收《两地书》第一集：北京（二十八）。

《致鲁迅》（一九二五.六.十七.）

署名许广平。收《两地书》第一集：北京（三十）。

《致鲁迅》（一九二五.六.十九.）

署名许广平。收《两地书》第一集：北京（三十一）。

《内幕之一部》

署名景宋。载一九二五年七月三日《莽原》周刊第十一期。

《一生一死》

署名景宋。载一九二五年七月十日《莽原》周刊第十二期。

《瞎扯》

署名景宋。载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七日《莽原》周刊第十三期。

《读论〈“他妈的”！〉》

署名景宋。作于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八日。文末附致鲁迅信一封。原拟投寄《语丝》杂志，后未刊。

《过时的话》

署名景宋。载一九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莽原》周刊第十五期。

《反抗下去》

署名景宋。载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一日《莽原》周刊第二十一期。

《罗素的话》

署名景宋。原稿藏北京鲁迅博物馆，未发表过。

《力的缺乏》

署名景宋。载一九二五年十月二日《莽原》周刊第二十四期。

《同行者》（一九二五.十.十二.）

署名平林。载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国民新报副刊（乙刊）》第八号。

《风子是我的爱》

作于一九二五年。未刊。原件藏鲁迅博物馆。

《虎？狐？》

署名景宋。作于一九二五年。未刊。原件藏鲁迅博物馆。

《学生自治会代表许广平先生演说辞》

此文系许广平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在女师大欢迎易培基任校长大会上的讲话，晶清、青方笔记。载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女师大周刊》第一一九期。

《刘和珍杨德群二君给我的印象》

署名许广平。此文作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四日，载《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周刊》第一二三期。

《别有肺肝》

署名非心。载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京报副刊》第四四九期。

《鲁迅先生撰译书目》(一九二六.六.十.)

署名景宋。收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京未名社出版台静农编《关于鲁迅及其著作》的附录。又收一九三〇年三月北新书局出版李何林编《鲁迅论》。

《致鲁迅》(一九二六.九.六.)

署名 H. M. 收《两地书》第二集：厦门——广州(三十七)。

《致鲁迅》(一九二六.九.八.)

署名 H. M. 收《两地书》第二集：厦门——广州(三十八)。

《致鲁迅》(一九二六.九.十二.)

署名 YOUR H. M. 收《两地书》第二集：厦门——广州(三十九)。

《致鲁迅》(一九二六.九.十七.)

署名 H. M. 收《两地书》第二集：厦门——广州(四十三)。

《致鲁迅》(一九二六.九.十三.)

署名 H. M. 收《两地书》第二集：厦门——广州(四十五)。

《致鲁迅》(一九二六.九.二十三.)

署名 H. M. 收《两地书》第二集：厦门——广州(四十七)。

《致鲁迅》(一九二六.九.二十八.)

署名 YOUR H. M. 收《两地书》第二集：厦门——广州

(四十九)。

《致鲁迅》(一九二六.九.三十.一十.四.)

署名 YOUR H. M. 收《两地书》第二集：厦门——广州
(五十一)。

《致鲁迅》(一九二六.十.七.)

署名 YOUR H. M. 收《两地书》第二集：厦门——广州
(五十二)。

《致鲁迅》(一九二六.十.十.)

署名 YOUR H. M. 收《两地书》第二集：厦门——广州
(五十五)。

《致鲁迅》(一九二六.十.十四.)

署名 YOUR H. M. 收《两地书》第二集：厦门——广州
(五十七)。

《新广东的新女性》(一九二六.十.十八.)

署名景宋。载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上海《新女性》第一卷第十二期。

《致鲁迅》(一九二六.十.十八.)

署名 YOUR H. M. 收《两地书》第二集：厦门——广州
(五十九)。

《致鲁迅》(一九二六.十.二十一.一二十二.)

署名许广平。收《两地书》第二集：厦门——广州
(六十一)。

《致鲁迅》(一九二六.十.二十三.)

署名 YOUR H. M. 收《两地书》第二集：厦门——广州
(六十三)。

《致鲁迅》(一九二六.十.二十七.)

署名 YOUR H. M. 收《两地书》第二集:厦门——广州
(六十五)。

《致鲁迅》(一九二六.十.三十.)

署名 YOUR H. M. 收《两地书》第二集:厦门——广州
(六十七)。

《致鲁迅》(一九二六.十一.四.)

署名 YOUR H. M. 收《两地书》第二集:厦门——广州(七十)。

《致鲁迅》(一九二六.十一.七.)

署名 YOUR H. M. 收《两地书》第二集:厦门——广州
(七十二)。

《致鲁迅》(一九二六.十一.十一.)

署名 YOUR H. M. 收《两地书》第二集:厦门——广州
(七十四)。

《致鲁迅》(一九二六.十一.十三.)

署名 YOUR H. M. 收《两地书》第二集:厦门——广州
(七十六)。

《致鲁迅》(一九二六.十一.十五.)

署名 YOUR H. M. 收《两地书》第二集:厦门——广州
(七十七)。

《致鲁迅》(一九二六.十一.十六.)

署名 YOUR H. M. 收《两地书》第二集:厦门——广州
(七十八)。

《致鲁迅》(一九二六.十一.十七.)

署名 H. M. 收《两地书》第二集:厦门——广州(八十)。

《致鲁迅》(一九二六.十一.二十一. —二十二.)

署名 YOUR H. M. 收《两地书》第二集：厦门——广州
(八十二)

《致鲁迅》(一九二六.十一.二十七.)

署名 YOUR H. M. 收《两地书》第二集：厦门——广州
(八十四)。

《致鲁迅》(一九二六.十一.三十. —十二.二.)

署名 YOUR H. M. 收《两地书》第二集：厦门——广州
(八十七)。

《致鲁迅》(一九二六.十二.六.)

署名 YOUR H. M. 收《两地书》第二集：厦门——广州
(九十)。

《致鲁迅》(一九二六.十二.七.)

署名 YOUR H. M. 收《两地书》第二集：厦门——广州
(九十一)。

《致鲁迅》(一九二六.十二.七.)

署名 YOUR H. M. 收《两地书》第二集：厦门——广州
(九十二)。

《致鲁迅》(一九二六.十二.十二.)

署名 YOUR H. M. 收《两地书》第二集：厦门——广州
(九十四)。

《致鲁迅》(一九二六.十二.十五.)

署名 YOUR H. M. 收《两地书》第二集：厦门——广州(一百)

《致鲁迅》(一九二六.十二.十九.)

署名 YOUR H. M. 收《两地书》第二集：厦门——广州

——·许广平 传

(九十七)。

《致鲁迅》(一九二六.十二.二十三.)

署名 YOUR H. M. 收《两地书》第二集:厦门——广州(一〇三)。

《致鲁迅》(一九二六.十二.二十七.)

署名 YOUR H. M. 收《两地书》第二集:厦门——广州(一〇六)。

《致鲁迅》(一九二六.十二.三十.)

署名 YOUR H. M. 收《两地书》第二集:厦门——广州(一〇七)。

《致鲁迅》(一九二六.十二.三十.)

署名 YOUR H. M. 收《两地书》第二集:厦门——广州(一〇八)。

《致鲁迅》(一九二七.一.五.)

署名 YOUR H. M. 收《两地书》第二集:厦门——广州(一一〇)。

《致鲁迅》(一九二七.一.七.)

署名 YOUR H. M. 收《两地书》第二集:厦门——广州(一一一)。

《鲁迅先生往那些地方躲》

署名景宋。载一九二七年二月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收一九二七年七月北新书局出版的钟敬文编《鲁迅在广东》;又收一九三〇年三月北新书局出版的李何林编《鲁迅论》;又收一九七六年十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山大学中文系编《鲁迅在广东》。

《北新书屋》(一九二七.三.二十六.)

署名景宋。载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第三十五期。收一九七六年十月文物出版社出版《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又收一九七六年十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山大学中文系编《鲁迅在广东》。

《如何革新》

署名景宋。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日《革命的妇女》第一期。

《为惨死的闸北女工请命》

署名景宋。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日《革命的妇女》第二期。

《直捷地说》

署名景宋。载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革命的妇女》第三期。

《惊魂甫定的心》

署名景宋。载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革命的妇女》第三期。

《送学昭再赴法国》

署名景宋。载一九二九年一月七日《语丝》第四卷第五十二期。

《致常瑞麟》(一九二九.五.十三.)

此信系《两地书》原稿附件，原稿藏北京鲁迅博物馆。

《致鲁迅》(一九二九.五.十三.一十四.)

署名 H. M. 收《两地书》第三集：北平——上海(一一四)。

《致鲁迅》(一九二九.五.十六.)

署名 H. M. 收《两地书》第三集：北平——上海(一一五)。

《致鲁迅》(一九二九.五.十七.)

署名 H. M. 收《两地书》第三集：北平——上海(一一九)。

《致鲁迅》(一九二九.五.十七.)

署名 YOUR H. M. 收《两地书》第三集:北平——上海
(一二〇)。

《致鲁迅》(一九二九.五.十八. 一十九.)

署名 H. M. 收《两地书》第三集:北平——上海(一二三)。

《致鲁迅》(一九二九.五.二十.)

署名 H. M. 收《两地书》第三集:北平——上海(一二四)。

《致鲁迅》(一九二九.五.二十.)

署名 H. M. 收《两地书》第三集:北平——上海(一二七)。

《致鲁迅》(一九二九.五.二十二. 一二十三.)

署名 H. M. 收《两地书》第三集:北平——上海(一三〇)。

《致鲁迅》(一九二九.五.二十四.)

署名 H. M. 收《两地书》第三集:北平——上海(一三一)。

《致鲁迅》(一九二九.五.二十七.)

署名 H. M. 收《两地书》第三集:北平——上海(一三三)。

《致鲁迅》(一九二九.五.二十八.)

署名 H. M. 收《两地书》第三集:北平——上海(一三四)。

《献辞》(一九三六.十.二十二.)

署名景宋。载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五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五期。收一九三七年十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鲁迅先生纪念集》卷首;又收一九五一年七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许广平著《欣慰的纪念》卷首。

《片段的记述》

署名景宋。载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五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五期。收《鲁迅先生纪念集》;又收一九五四年六月人民

文学出版社出版许广平著《关于鲁迅的生活》。

《最后一天》(一九三六.十一.五.)

署名景宋。载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五日《作家》第二卷第二期。收《鲁迅先生纪念集》；又收中华编译馆出版曹聚仁，邓珂云编《鲁迅手册》；又收一九七六年十月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

《许广平淡鲁迅的印象》

载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立报》。

《我怕》(一九三六.十.二十九.)

署名景宋。载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热风》第一卷第一期。收《鲁迅先生纪念集》。

《为征集鲁迅先生书信启事》(一九三六.十二.)

署名许广平。载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五日《中流》第一卷第九期。

《元旦忆感》(一九三六.十二.三十一.)

署名景宋。载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五日《中流》第一卷第九期。收《关于鲁迅的生活》。

《颂普希金》(诗)

署名景宋。载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时代日报》。

《为了爱》(诗歌)

署名景宋。载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中流》第一卷第十一期。

《母亲》(记鲁迅先生的母亲)

署名景宋。载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工作与学习丛刊之二：原野》，收《欣慰的纪念》。

《鲁迅〈夜记〉编后记》(一九三七.一.二十四。)

署名许广平。载一九三七年四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许广平编校鲁迅《夜记》卷末。

《为征集鲁迅先生书信紧急启事》

署名许广平。载一九三七年四月五日《中流》第二卷第二期。

《鲁迅〈病中通信〉附记》(一九三七.四.十九。)

署名广平。载一九三七年五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收获》。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后记》(一九三七.六.二十五。)

署名许广平。载一九三七年七月上海三闲书屋出版许广平
编校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卷末。以后各版《且介亭杂文末
编》均收此记。

《小小的感想》

署名景宋。载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上海《立报》。

《炮火中的感想》

署名景宋。载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上海《救亡日报》。

《周年祭》

署名景宋。载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七日《烽火》第七期。

《纪念鲁迅与抗日战争》

署名景宋。载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救亡日报》。收
一九三七年抗战出版部《战时小丛书之三：鲁迅与抗日战
争》；又收一九三八年抗战出版部汪馥泉编《鲁迅逝世周年
纪念册》。

《鲁迅先生的关于妇女》

署名景宋。载一九三七年十月《妇女生活》第五卷第三期。

《关于鲁迅先生的病中日记和宋庆龄先生的来信》

署名许景宋。载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宇宙风》杂志第五十期。收《关于鲁迅的生活》。

《医》

署名景宋。载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日《离骚》创刊号。

《鲁迅译著书目续编 附：鲁迅先生的名、号、笔名》

未署名。载《鲁迅先生纪念集》；又收一九三八年一月上海复社出版二十卷本《鲁迅全集》。

《写在〈《嵇康集》序〉的后面》

署名广平。载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华美周报》第一卷第一期。

《鲁迅〈集外集拾遗〉编后说明》（一九三八.四.二十二.）

署名许广平。载一九三八年五月鲁迅全集出版社许广平编校鲁迅《集外集拾遗》卷末，又见于二十卷本《鲁迅全集》。

《鲁迅〈哀诗三首〉》（悼范爱农）（一九三八.四.）

署名广平。载二十卷本《鲁迅全集》。

《鲁迅〈译丛补〉编后记》（一九三八.五.十九.）

署名许广平。载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文汇报·世纪风》，收入二十卷本《鲁迅全集》。

《鲁迅〈死魂灵〉附记》（一九三八.五.二十六.）

署名许广平。载二十卷本《鲁迅全集》。

《鲁迅〈译丛补〉编后再记》（一九三八.五.二十九.）

署名许广平。载二十卷本《鲁迅全集》。

《〈鲁迅全集〉编校后记》（一九三八.七.七.）

署名许广平。载一九三八年八月五日《上海妇女》第一卷

第八期。收入二十卷本《鲁迅全集》卷末。

《双十献词》

署名景宋。载一九三八年十月五日《上海妇女》第一卷第十二期。

《看过〈人之初〉之后》

署名景宋。出处同上。

《给上海的青年朋友》

署名许广平。载一九三八年十月十日《译报周刊》第一卷第一期。

《鲁迅和青年们》

署名景宋。载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六日《文艺阵地》第二卷第一期。收重庆妇女生活社出版肖红《回忆鲁迅先生》附录；又收《欣慰的纪念》。

《年青人与鲁迅》

署名景宋。载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六日《少年读物》杂志第四期。收入《关于鲁迅的生活》

《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

署名景宋。连载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二十四日《申报·自由谈》，收《欣慰的纪念》。

《关于鲁迅先生的病中日记》

署名景宋。载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九日《申报·自由谈》，收《鲁迅与抗日战争》。

《鲁迅先生大病时的重要意见》

署名景宋。载一九三八年《文摘》，收《鲁迅与抗日战争》。

《关于汉唐石刻画像》

署名景宋。载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日《文汇报》，又载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日《文献》第二期，收《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

《纪念还不是时候》

署名景宋。载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文艺》半月刊第二卷第二期。

《关于〈嵇康集〉的标点》

署名景宋。载一九三八年十月《文汇报》副刊《世纪风》。

《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发言摘要）

内摘录了许广平的发言。载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上海妇女》第二卷第二期，

《鲁迅先生二周年祭》

署名景宋。载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一日《众生》半月刊第二卷第二期。

《扁桃腺》

署名景宋。载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华美周报》第一卷第三十六期。

《〈鲁迅风〉与鲁迅》

署名景宋。载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一日《鲁迅风》第一期。

《一二八拾零》

署名景宋。载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日《上海妇女》第二卷第七期。

《鲁迅先生的日记》

署名景宋。载一九三九年二月八日《鲁迅风》第五期。收

《欣慰的纪念》。

《敬悼列宁夫人逝世》

署名景宋。载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文献》第六期。

《从女性的立场说“新女性”》

署名景宋。载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二日《鲁迅风》第十期。

《鲁迅先生的学习精神》

署名景宋。载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八日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收《欣慰的纪念》。

《文人的穷》

署名许广平。载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副刊《晨星》。

《话剧在上海》

署名景宋。载一九三九年四月十六日《文艺阵地》第三卷第一期。

《输将》

署名景宋。载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四日《文汇报·世纪风》。

《女战士与女英雄》

署名景宋。载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上海妇女》第二卷第十二期。

《纪念母亲节》

署名景宋。载一九三九年五月十四日新加坡《星洲日报》副刊《妇女界》。

《阿Q的上演》

署名景宋。载一九三七年七月《中法剧社首次公演〈阿Q正传〉特刊》。

《生活乱谈》

署名景宋。载一九三九年七月三十日《上海妇女》第三卷第六期。

《鲁迅先生与海婴》

署名景宋。载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日、九月五日、九月二十日《鲁迅风》第十八、十九、二十期。收《欣慰的纪念》。

《鲁迅先生的晚年》（一九二六——一九三六）

署名景宋。载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九日《文艺新闻》第三期。收《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

《鲁迅先生与家庭》

署名景宋。载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日《上海妇女》第三卷第九期。收《欣慰的纪念》。

《鲁迅的生活之一》

署名景宋。载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五日上海《职工生活》杂志。收《关于鲁迅的生活》。

《鲁迅的生活之二》

署名、发表报刊不详，《关于鲁迅的生活》据手稿排印。

《鲁迅的日常生活》

署名景宋。载一九三九年十月《中苏文化》第四卷第三期。收重庆读书出版社出版《鲁迅的创作方法及其他》，又收一九四六年大连文协出版卢正义编《鲁迅论》第一辑，又收《欣慰的纪念》。

《鲁迅先生的写作生活》

署名景宋。原载一九三九年十月《中苏文化》第四卷第三期。收《欣慰的纪念》。一九五六年《辽宁文艺》第十七期

曾据《欣慰的纪念》予以转载。

《鲁迅先生的娱乐》

署名景宋。载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一日《文艺阵地》第四卷第一期。收《欣慰的纪念》。

《我的小学时代》

署名景宋。载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海妇女》第三卷第十一期。

《憧憬的南洋》

署名景宋。载一九三九年《文艺长城》第五、六期合刊。（出版月份不详）

《新年》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〇年一月十日《上海妇女》第四卷第二期。

《孤寡之声》

署名许广平。载一九四〇年二月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副刊《晨星》。

《鲁迅与中国木刻运动》（一九三九.十二.）

载一九四〇年四月上海《耕耘》杂志。收《关于鲁迅的生活》。

《琐谈》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〇年八月一日上海《学习》杂志。收《关于鲁迅的生活》。

《留存于鲁迅先生处的几位友人的旧诗集录》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〇年八月二日上海《周报》第二卷第八期。

《鲁迅年谱的经过》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〇年九月十六日《宇宙风〈乙刊〉》

第二卷第九期。收《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

《鲁迅先生在北平的反帝斗争》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上海天一书店出版《文艺界丛刊之一：丽芒湖上》及《横眉》，收《欣慰的纪念》时，改题《鲁迅先生及女师大事件》。

《鲁迅先生对批评的态度》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九日上海奔流出版社出版《奔流新集之一：直入》。

《民元前的鲁迅先生》（一九四〇·七·）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一日《抗战文艺》第六卷第四期。后收入一九四二年八月上海书店出版茅盾、适夷编《文阵丛刊之二：论鲁迅》，又收一九五六年十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王冶秋著《辛亥革命前的鲁迅先生》卷末。

《信》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一日《抗战文艺》第六卷第四期。

《〈鲁迅三十年集〉印行经过》（一九四一·八·十·）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一年版《鲁迅三十年集》本《且介亭杂文末编》卷末。

《如果鲁迅还在》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八日《上海周报》第四卷第十七期。

《因校对〈三十年集〉而引起的话旧》

载一九四一年十月出版的上海《学习》杂志。收《关于鲁迅的生活》。

《鲁迅〈势所必至，理有固然〉附记》（一九四一.九.三十.）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上海《奔流新集之一：直入》。

《关于〈序跋集〉的〈序〉》

载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六日《萧萧》半月刊第二期。

《记荔枝湾》

署名浩波。载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万象》八月号。

《丁聪〈阿Q正传的插图〉序》（一九四四.四.）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六年九月上海出版公司出版丁聪作《阿Q正传插图》卷首。

《就“鲁迅先生遗书出售问题”启事》

载一九四四年九月十日上海《申报》，收一九四四年十月十日出版的《文艺春秋丛刊：两年》。

《狂欢之夜》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五年九月八日《周报》创刊号。

《研究鲁迅文学遗产的几个问题》

载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十月六日《周报》第四、五期。又载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九日重庆《新华日报》。收《欣慰的纪念》。

《为自己呼吁》

署名许秀。载一九四五年十月二日《时代日报》副刊《妇女》。

《鼠和猫的故事》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五年十月四日《文汇报》副刊《世纪风》。

《好日子》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五年十月五日《自由人》杂志。

《我们对于处置敌日在华军商人的意见》

许广平等三十九人联名。载一九四五年十月六日《周报》第五期。

《迎双十节》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三日《民主》创刊号。

《因纪念想起》

载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新文化》半月刊创刊号。

《忘记解》

载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周报》第七期。收《欣慰的纪念》。

《上海文艺界复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书》

许广平等二十四人联名。载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周报》第七期。

《我们怎样纪念》

载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民主》第二期。

《鲁迅先生的香烟》

载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三日《文萃》第三期。收《欣慰的纪念》。

《上海人》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民主》第三期。

《大雨》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日上海《大公报》副刊《文艺》。

《不要中计》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三日《民主》第四期。

《人民需要爱抚》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日《民主》第五期。

《橘子》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日《民主》第五期。

《庆祝感言》

署名许秀。载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时代日报》副刊《妇女》。

《读〈夜店〉》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周报》第十一期。

《我的呼喊》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民主》第六期。

《剪报见闻》

署名许广平。载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民主》第七期。

《读〈黄花〉》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民主》第八期。

《话旧谋新》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上海女青年会主编的《妇女》杂志。

《妇女运动象竞赛》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新文化》半月刊第一卷第四期。

《中国的癌》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八日《民主》第九期。

《遭难前后》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民主》第十至二十三期。

《给美国人民的公开信》

许广平等四十九人联名。载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周报》第十七期。

《岁末打油》（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上海《大公报》副刊《文艺》。

《挽于再先生》

署名许广平。载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于再先生追悼会特刊》。

《让人民站起来》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文艺复兴》第一卷第二期。

《人民的力量》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六年二月十六日《民主》第十八期。

《三八节与中国妇女》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六年三月三日《文汇报》。

《三八感言》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六年三月八日《时代日报》副刊《妇女》。

《三八话今年》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六日《民主》第二十一、二十二期合刊。

《战后的英国妇女》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日《民主》第二十四期。

《迎马与送魏》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六年四月六日《民主》第二十五期。

《从原子弹说起》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民主》第二十七期。

《民主生活的学习——谈国大妇女代表的选举》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七日《民主》第二十八期。

《阎瑞生活着》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文汇报》副刊《妇女》。

《造成五四的历史经过》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民主》第二十九期。

《致游牧》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一日《民主》第三十期。

《有幸有不幸》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六年五月十八日《民主》第三十一期。

《在羊枣追悼会上的讲话》

中由《永生的死！》一文摘录。载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文萃》第三十一期。

《我喜欢看的好报》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上海《联合日报晚刊》。

《民意》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民主》第三十三期。

《〈妇讯〉发刊词》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六年六月七日上海《联合日报晚刊》。

《谁有仲裁权》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五日《民主》第三十五期。

《时局笔谈特辑——郭沫若、马叙伦、郑振铎、景宋先生
答本刊时局六问题》

出处同上。

《致中国共产党》

许广平等一六四人列名。出处同上。

《上海各界呼吁和平马叙伦等一百六十四人上书蒋介石、
马歇尔及各党派》

许广平列名。出处同上。

《十五天后能和平吗？》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五日《周报》四十一期。

《慰问雷洁琼先生》

署名“一个学友”。载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文汇报》
副刊《妇友》。

《为下关遭难代表向美国人进言》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民主》第三十七期。

《追忆肖红》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文艺复兴》第一卷第
六期。

《迎接胜利后的第一个“七·七”》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六年七月七日《文汇报》副刊《世
纪风》。

《认清时局》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三日《民主》第三十九期。

《清晨笔谈（三则）》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七日《民主》第四十一期。

《奔波随笔——谈领导》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文汇报》副刊《笔会》。

《他们的感召》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六年八月二日《文汇报》副刊《妇友》。

《痛悼陶（行知）先生》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六年八月三日《民主》第四十二期。

《“启示”之后》

署名景宋。出处同上。

《真理与退学》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民主》第四十五期。

《猪猡的生活》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周报》第四十九、五十期合刊。

《出奇的字》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四日《民主》第四十八期。

《论美国“基本之目标”》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四日《民主》第四十八期。

《“退出中国”》

许广平等八人。载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文汇报·星期谈座》。

《同性恋爱是坎非坎——致文彬女士》

署名编者。载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上海联合日报晚刊·妇讯》第十五号。

《“从中国撤退”集锦》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民主》第五十期。

《忙和梦》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民主》第五十期。

《十周年祭》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文艺复兴》第二卷第三期。

《还不是可以痛哭的时候》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六年十月四日《文汇报》。

《苦难中的中国妇女》

许广平等。为《文汇报》第四十次星期座谈会记录。载一九四六年十月六日《文汇报》。

《我们要求政府切实保障言论自由》

许广平等三十九人。载一九四六年十月十日《民主》第五十一至五十二期。

《不要孩子怎么办——致玉芬女士》

署名编者。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二日上海《联合日报晚刊·妇讯》第十六期。

《读唐弢先生编〈全集补遗〉后记》（一九四六·十·十二。）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七日《文萃》第二卷第二

期。又一九四六年十月上海出版公司出版唐弢编《鲁迅全集补遗》卷末。

《鲁迅复许广平信（一九二六.八.十五.）附记》

署“编者附记”。载一九四六年十月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鲁迅书简》卷中。

《鲁迅先生死了十年了——〈鲁迅书简〉编后记》
（一九四六.十.十三.）

署名许广平。载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九日《学生日报》，收一九四六年十月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许广平编《鲁迅书简》卷末。

《许景宋谈鲁迅的往事》

载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九日《文汇报》。

《鲁迅眼中的苏联》

载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九日《时代》杂志第六卷第四十一期。

《陶行知先生追悼大会筹备处启事》

许广平列名。载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文汇报》。

《白发》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七日《新文化》半月刊第二卷第八期。

《慰袁雪芬》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文汇报·妇友》。

《北行观感》

连载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七日、十四日、二十一日以及一九四七年一月四日上海《文汇报·妇友》，其中《鲁迅故居》和《藏书》两节在《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刊出。

《检讨与希望》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时代日报》副刊《妇女》。

《一九四六年中国的流水帐》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四日《新文化》半月刊第三卷第一、二期合刊。

《民族自觉战的纪念》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文汇报》。

《局面怎样变好？》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二日《文革》第十五、十六期合刊。

《浪费》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中国建设》第三卷第五期。

《中国人民对莫斯科会议的意见》

许广平等十一人。载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日《文革》第十二期。

《为〈联合晚报〉周年纪念题词》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五日上海《联合晚报》。

《新五四运动》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七年五月四日《文汇报·笔会》。

《记五四时代天津的几个女性》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人世间》复刊第三期。

《生与死》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七年六月二日《时代日报》副刊《新

——许广平 传

妇女》。

《新兴妇女运动与现代社会运动之联系》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日《大学》杂志第六卷第二期。

《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一九四七.九.九.)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七年十月三十日《大公报》副刊《出版界》第六五期。收一九四七年峨嵋出版社出版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卷末。

《〈鲁迅三十年集〉为何不包含译作?》(一九四七.九.二十.)

署名许广平。载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大公报》副刊《出版界》第五十一期。收《鲁迅三十年集》附录。

《王士菁〈鲁迅传〉序》(一九四七.九.二十四.)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七日《时与文》第二卷第六期。收一九四八年上海新知识书店出版王士菁著《鲁迅传》卷首。

《悼死慰生》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日《时代日报》副刊《新妇女》。

《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七年十月三十日上海《大公报》副刊《出版界》。

《〈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人物》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日上海《新民报》。

《介绍〈亡友鲁迅印象记〉》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读书与出版》第

十二期。

《“三八”妇女节感想》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八年三月五日《国讯》周刊第二五四期。

《我所敬的许寿裳先生》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人世间》第二卷第四期。

《关于鲁迅先生的遗书》

黄裳采录。载一九四八年四月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黄裳《锦帆集外》。

《第一次到了鲁迅先生的故乡》

载一九四八年五月《中国建设》第六卷第二期。

《关于鲁迅的作品、故里、逸事》

连载于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二日、十九日《展望》第二卷第七期、八期。

《〈鲁迅文集〉后记》

载一九四八年六月上海春明书店出版，中华全国文艺协会编《现代作家丛书：鲁迅文集》卷末。

《日帝占领下的血和泪》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现代妇女》杂志。

《朱自清先生纪念》

署名许景宋。载一九四八年十月一日《文潮月刊》第五卷第六期。

《研究鲁迅文学答苏联友人问》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五日《学习生活》第二卷

第一、二期。此文后收入《欣慰的纪念》中的《研究鲁迅文学遗产的几个问题》。

《笔记一篇》

载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日《中建》第一卷第七期。

《绍兴与鲁迅》

载一九四八年十月上海文艺新辑社编印《文艺新辑》第一辑：《论小资产阶级文艺》。

《致〔日〕鱼坂善雄》（一九四八）

载一九四八年日本目黑书店出版〔日〕鱼坂善雄编译《鲁迅短篇集》。

《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

许广平等五十五人。载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五日《东北日报》。

《在〈呐喊〉里的几个女性》

载一九四九年三月三十日《中国青年》第五期。收一九五〇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关于文学修养》。（一九四九年以后文章极大部分署许广平，偶而亦有署景宋的，为节省行文，均不再标明署名。）

《响应召开世界拥护和平大会中国文化界发表宣言》

许广平列名。载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一日《东北日报》。

《陈烟桥〈鲁迅木刻〉序》

署名景宋。载一九四九年十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陈烟桥《鲁迅木刻》卷首。

《在欣慰下纪念》

载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九日《人民日报》。收《欣慰的纪念》。

《回忆鲁迅——记许广平同志十月十七日在北师大纪念
晚会上的讲话》

载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九日《光明日报》。

《革命工作者应该学习鲁迅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载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日《光明日报》。

《从鲁迅的著作看文学》

载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五日《文艺报》第一卷第三期。收
《关于鲁迅的生活》。

《致阮绍先》

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三日，谈清点北京鲁迅故居遗物。

《致文物局》

一九五〇年八月三日。谈筹建鲁迅纪念馆、博物馆。

《胡今虚〈鲁迅作品及其他〉读后感》（一九五〇.二.十五.）

载一九五〇年十月上海泥土社出版胡今虚著《鲁迅作品及
其他》卷末。

《我们需要更好地“学会本领做好工作”》

载一九五〇年十月六日《中国青年》第四十八期。

《鲁迅夫人口中的鲁迅》

青涵采录。载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九日《文汇报》。

《鲁迅和青年》

载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日《中国青年》第四十九期。

《悼念史沫特莱》

载一九五一年五月六日天津《进步日报》。

《三届二中全会以来》

载一九五一年五月《民进》创刊号。

· 许广平 传

《向中国共产党学习》

署名许广平。载一九五一年七月《民进》第二期。

《进入研究》

载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五日出版的《文艺新地》第一卷第八期。

《更进一步发扬我们团结与进步的光荣传统》

载一九五一年十月《民进》第三期。

《不容情地对敌战斗》

载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又载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八日《人民周报》第四十三期。收《关于鲁迅的生活》。

《致王士菁》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五日，谈《鲁迅全集》注释问题。

《关于新会县外海乡地主陈鹤琴事件答复香港居民李宏业的信》

原载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六日香港《大公报》、香港《文汇报》，同年四月《民进》第四期转载。

《土地改革工作给我的教育》

载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五日武汉《长江日报》。

《三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组织、宣传、文教工作报告》

这是许广平在民主促进会全国组织宣教工作汇报会议上的报告，载一九五二年九月《民进》第六期。

《让我们更坚强地把保卫和平的事业担当起来》

载一九五二年十月《民进》第七期。

《访苏观感》

载一九五四年二月《民进》第二十期。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教育了我们》

载一九五四年五月四日《新疆日报》，《民进》第二十三期转载。

《宪法草案宣示了人民民主的胜利》

载一九五四年七月《民进》第二十四期。

《发展和巩固中苏友好合作，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在中苏友好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会上的发言》

载一九五四年十二月《民进》第二十九期。

《鲁迅与翻译》

载一九五五年三月二日《俄文教学》第三期（总第三十三期）。

《我们在前进——看了〈六亿人民的意志〉》

载一九五五年三月《大众电影》第三期。

《向小学教师们致敬——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

载一九五五年五月《小学教师》第五期（总第三十二期）。

《与胡风思想划清界限》

载一九五五年五月《文艺报》第九、十期。收一九五五年八月北京作家出版社编辑出版《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第六集。

《从胡风事件中取得教训》

载一九五五年六月《民进》第三十六期。

《在德苏演出参观的一些印象》

载一九五五年十月《世界知识》第二十期。同年十月《民进》第三十八期同时刊载。

《对待敌人，再不能宽大》

载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新观察》第十二期。

《往前看，不要总是往后看》

载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民进》第三十九期。

《鲁迅和青年——在团中央鲁迅纪念会上的讲话》

载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五至二十六日《中国青年报》。

《鲁迅如何对待祖国文化遗产》

载一九五六年十月八日《文汇报》。

《鲁迅的日常生活》

载一九五六年十月九日《文汇报》。

《鲁迅在日本》

载一九五六年十月十日《文艺月报》第十期（总第四十六期）。收《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

《和小朋友谈鲁迅》

载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二日《辅导员》第十期（总第三十期）。

《在鲁迅迁葬仪式上的讲话》

载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五日《解放日报》。

《为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作》

载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五日《文艺报》第十九期（总第一六五期）。

《略谈鲁迅对祖国文化遗产的一二事》

载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五日《新港》第四期（十月号）。收《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

《纪念鲁迅》

载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九日上海《劳动报》。

《鲁迅与汉字改革》

载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九日《语文学习》十月号（总第六十一期）。

《纪念鲁迅先生》

载一九五六年十月《解放军战士》第二十期。

《学习鲁迅以身作则教育青年的伟大精神——在民进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大会上报告中的一节》

载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民进》第四十六期。

《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讲话，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载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民进》第五十期。

《纠正错误团结在党的周围》

载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四日《人民日报》。收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

《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活动——在全国妇代会上的发言》

载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收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

《略谈鲁迅与苏联文学的关系》

载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七日《文艺报》第二十九期（总第一九九期）。

《新时代的喜悦》

载一九五七年十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的青年共产主义者丛刊之一：《民主与自由》。

《中国民主促进会自我改造竞赛决心书》

许广平等七十人联名。载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民进整风简报》第十二期。

《交心过程》(诗)

载一九五八年四月五日《民进整风简报》第十五期。

《鲁迅拔白旗插红旗的一些事情》

载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六日《东海》第十一期(总第二十五期)。

《鲁迅反对帝国主义的匕首》(一九五八.九.二十二。)

载一九五八年十月五日《世界知识》第十九期。

《〈鲁迅作品选〉序言》(一九五九.一.十二。)

载一九五九年四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鲁迅作品选》卷首。

《鲁迅在“五四”时期的文学活动》(一九五九.二.二十三。)

载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文艺报》第八期(总第二四〇期)。

《“五四”与鲁迅》

载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日《中国青年报》。

《致〈光明日报〉编辑》(一九五九.十二.九。)

载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光明日报》。此信系对冀贡泉所写《我〈对鲁迅壮年的几点印象〉一文》的介绍。

《鲁迅对妇女的同情》

载一九六〇年二月十六日《中国妇女》第四期(总第一四四期)。

《鲁迅回忆录》(一至十三)

载一九六〇年二至七月《新观察》(总第二二六至二三六期)。

《朝革命的路上变》

载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民进》一九六一年第一期。

《鲁迅先生怎样对待写作编辑工作》

载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人民日报》，收《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

《中日两国妇女和人民的友谊是任何力量破坏不了的》

载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

《鲁迅之名始于何时（答问）》

载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为了永恒的纪念——记仙台鲁迅纪念碑揭幕典礼》

载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五日《世界知识》第十期。

《仙台漫笔》

载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收《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

《文艺——革命斗争的武器——谈谈鲁迅的写作态度》

载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工人日报》。

《读〈永不磨灭的印象〉》

载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此文系读发表在同月十九日《人民日报》上杜力夫的文章《永不磨灭的印象》的感受。

《鲁迅手迹和藏书的经过》

载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图书馆》第四期。收《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

《〈鲁迅回忆录〉的一个订正》

载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文汇报》。

《致袁家和》(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载一九六二年十月一日《新港》十月号(总第七十二期),
此信系回答关于鲁迅集邮的通讯。

《景云深处是吾家——〈鲁迅回忆录〉补遗》

载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文汇报》。收《鲁迅研究
资料》第一辑。

《和同志们共勉》

载一九六三年四月五日《民进》一九六三年第二期。

《火炬·黎明·旭日初升》

载一九六三年六月七日《北京晚报》。

《回眸时看小於菟》(国庆十五周年述怀)

载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一九六四年十月
《民进》转载。

《关于鲁迅〈题《芥子园画谱》三集赠广平〉诗的几句说
明》(一九六四.十.)

载一九六八年北京大学《文化批判》第二期。收一九六八
年三月出版南京大学编注《鲁迅诗注》，又载一九七六年九月
《诗刊》第九期。

《回忆鲁迅在广州的时候》

首次见一九七六年十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山大学中文
系《而已集》注释小组编《鲁迅在广州》和《鲁迅研究资料》
第一辑。

《我的斗争史》

一九六四年应《北京日报》之约而作，后因故中辍。此文
系许广平自传的开头部分。

《关于〈鲁迅语录〉(广西版)的一封信》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致白曙。油印件，未正式发表。

待查篇目

《街头小景》

《记中华同乐会》

《扫墓记》

《无名英雄》

爱的思索：许广平的佚文 《结婚的筵宴》

许广平不仅是鲁迅的夫人和战友，而且本人就是一位作家，一位创作的多面手。江苏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出版了《许广平文集》（三卷本），内收许广平一九一七年至一九六六年间的作品三八九篇，共九八万字，涉及了诗歌、散文、杂文、剧作、书信、回忆录等多种文学体裁。其中最具独特价值的是她跟鲁迅的《两地书》，以及《欣慰的纪念》、《遭难前后》、《鲁迅回忆录》这三本回忆体作品。编者在《出版前言》说，该书“几乎囊括了她的著述的全部”，但实际上漏收和未收的数量应该不少。比如，学术著作《弘一大师年谱》，即未收入。许广平早年抗婚的一组书信，后来发表于《鲁迅研究月刊》二〇〇三年第十一期，此书亦未收入。许广平生前的书信（包括由她口授、秘书代拟的信件），佚失的恐怕不少。据判断，许广平生前还可能写有并不连贯的日记，亦未经整理出版。由此看来，许广平遗文的数量，至少应该有百余万字。一九六〇年七月，许广平被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跟她在文艺创作方面的特殊贡献不无关联。本文仅介绍许广平以“景宋”为笔名的一篇佚文《结婚的筵宴》，原载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四日《国民新报副刊》

七十九号。全文是：

结婚的筵宴

接续不断的，隆隆的声音，有时好似远远地响着，同时四近也不绝的响应。在满城风雨的时候，也许可以疑心是兵临城下了，况且火箭满天飞，红红地吱的一声就掠过去，岂不很像枪弹的飞行，要向有生命的方向杀去吗？然而花爆的放遍九城，却又告诉我是元宵佳节，使我忆起阴历除夕及新年那几天各处通宵放花爆之热闹来。我虽则能够多少天自己闭处室中，懒得酬答，但是过度沉寂的空气，又真叫我闷死。为打破我的沉寂世界计，所以我十二万分欢迎那些花炮声，便是爆竹，也不打紧，因为睡魔一来，自然就倒头和它相见，这时外面的轰轰的，隆隆的，都自然消灭了。而况在元宵的今夕，总算是一年的末次听见，这真叫我恋恋地舍不得它。

令我恋恋不舍的花爆和爆竹声，挽留我不要早睡，脑里就浮起了今日的一件值得记录的事。为要将我粗拙的行文起见，只可顺着写下来：

当元宵的前三日，我接到一个自“大平湖饭店三十五号”寄来的浅红色的柬贴，印的是涂红的横行字，写的是——

亲友们：

我们因为学术上，事业上，哲嗣上，有合作之必要；品性上，习惯上，志趣上，有十分吻合之点，所以才由多年之乡情友谊，进约为共同生活之伴侣。现已得家庭之允许，爰在京组

织新家庭。

想亲友亦必乐予赞成！肅此奉闻！

郭淑文

合启 八，二，一九二六

王鉴武

定于二月二十七号（阴历正月十五日）午时

洁樽恭候

光临

座设北京大千湖饭店

郭淑文

谨订

王鉴武

我看了这浅红色的柬帖，印着的日子是一九二六年的二月八日，而柬帖递到是在二月的二十五日，距赴喜筵尚差三天；而在二月八日的通知，离现在却已经过了十九天了！这真使我无从索解，好在没有大要紧，也就不去十分研究它。

照着预约时间较早些，到了大平湖饭店三十五号的房间，在许多赴运动会照相之下，一个长方桌子铺着一张大的红色纸，那位王鉴武——号健吾——就亲自执笔写着二寸见方的秩序单。内容共有十项，大约是：主席布告开会，王健吾先生述恋爱经过，郭蔚廷先生演说，亲属致祝词，来宾祝词，摄影，聚餐，余兴……

到的人不算多，寥寥数十。表面上一切仪式的陈设都几乎看不出什么特别；尤其所谓新郎的也仍然穿着寻常的洋

服；而所谓新娘者，还是照旧的蓝布衣和黑裙。据说是二月八日实行同居生活的，所以通知上还是用那一天的日子；但是结了婚十九天才请喜酒，所以，因为早已同居，门口再不用着花车；又因为根本反对侯相蒙头的恶俗，所以道地的照常表示出平素色彩来，一点也不造作。在毫不特别装饰的大厅子上，坐着些人一起吃饭谈话，如果谈话中没有参杂着祝贺新夫妇和劝酒的话，有谁知道这就是后人制定的性交的贿赂于人们，免得挨骂的一种公开买卖呢！结婚本是根据于两方当事人的裁决的，但一度的浓酒丰肴，在人们的口碑上就不生问题，否则难免要受“道德上之否认了”。哈哈，这就是礼教！

据健吾先生说，他家原来十三岁就给娶亲了，在旧的社会昏昏地度过了许多年，守着旧的道德不敢做非分之想。忽然觉得自己是一个人，应当有自己的幸福，去寻访，享受，在不妨害他人——旧式的妻——的范围内，于是他始有新生命的工作了，不绝地前进，并且，前些时候他的伯母死了，他过续给伯母，算是兼祧，于是这个名义完成了他和淑文的毕生幸福。因此，这使我忆起我的一个同学颜君和某君的结婚，也是这个名义，教育局长焦莹虽则因此免去了他们的校长之职，但是社会却同情于渠们。而距这不远的李君和包某，某君和某君，某君和某君，某君……凡是幸运地得着兼祧的机会，领到这样的名义，社会就容许它，反之，自然就相当的不原谅，群起而攻了。我未曾到过外国，只仿佛听说外国人有离婚后再婚的，但是没有兼祧的办法，所以除了离婚的麻烦之外，只好例外地有所谓“外遇”。这是外国人不及中国人聪明的地方。哈

哈，这也就是中国的礼教！

（原载《国民新报副刊》七九号，一九二六年三月四日）

这篇佚文由王鉴武先生和郭淑文女士的婚宴引发议论。新郎新娘是先行同居，婚后一九天才请喜酒，免去了花车、候相一类旧俗。喜宴上新郎穿寻常洋服，新娘还是照旧的蓝布衣和黑裙。许广平对这些破旧立新的做法颇为赞赏，但以“浓酒丰肴”举办婚宴她却持根本反对的态度。因为她认为结婚是两方当事人的事情，不必担心社会舆论作“道德上之否认”而以酒饭进行变相贿赂。这一看法，跟鲁迅同年同月发表的《狗·猫·鼠》观点完全一致。鲁迅在这篇散文中谈到了他“仇猫”的一个原因，就是每年春夜，都能听到发情期的猫在噪叫，闹得别人心烦，尤其是夜间要看书、睡觉的时候。鲁迅由此联想到旧式的婚礼，往往跟猫闹春一样喧嚣。比如一九二五年海昌蒋氏在北京举行婚礼，拜来拜去，就十足拜了三天，还印有一本红封面的《婚礼节文》，大发议论：“平心而论，既名为礼，当必繁重。专图简易，何用礼为？……”鲁迅也认为，婚姻完全是当事人双方的事情，完全不必大摆筵席，变相行贿。《狗·猫·鼠》与《结婚的筵宴》发表时，许广平和鲁迅正处于热恋时期，正在进行爱的思索。双方在婚姻问题上的共识，显然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

文中的王鉴武十三岁即被父母包办娶亲，前些时候因过继给伯母，算是“兼祧”（即一人兼做两方的继承人），按旧习才有再婚的机会。许广平认为这就是中国礼教时聪明滑头之处，

没有外国允许离婚后再婚符合人性需求。

许广平在《结婚的筵宴》开头描写了春节期间放花炮的热闹情景，并感谢炮竹声打破了她内心的过度沉寂。鲁迅在杂文中也谈到花炮声能给“悲愤者和劳作者”带来短暂的欢乐，所以在一九三四年春节他连续放了三夜的花炮。

（《花边文学·过年》）

都是《魔崇》惹的祸

——由一出独幕剧引发的文坛风波

有一个成语叫“飞来横祸”。此处“横”不读“衡”，而读第四声 hèng，原含“意外”之意，又含“凶暴，不讲理”之意。我直到古稀之年，才切身感受到什么叫“飞来横祸”。

我经历的这场文坛风波是由一出叫《魔崇》的独幕剧引发的。这场风波内容的荒唐，过程的曲折，手段的出奇，不仅在鲁迅研究史上，而且在中外学术史上都十分罕见；套用鲁迅的话来讲，就是可以列入《无双谱》。

记不清是一九八四年底还是一九八五年初，我到鲁迅博物馆资料部的文物库房查阅资料，无意中在一个抽屉内发现了一份铅笔书写的文稿，就是这出名为“魔崇”的独幕剧。纸上既未标名作者姓名，也未署名写作年月。此前我已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许广平的一生》，写作中参阅了许广平的不少手稿，对许广平的笔迹十分熟悉，所以一看就能断定这是许广平的佚文。由于《魔崇》篇幅不长，又涉及此后引发的论争，故全文引录于下，供广大读者思考判断。

魔崇（独幕剧）

人物：

睡魔——简称魔

睡的人——睡

睡的人的爱者——爱

时期：一个初夏的良宵，暗漆黑的夜，当中悬一弯蛾眉般的月。

地点：一间小巧的寝室，旁通一门，另一间是书房。

睡 寝室的电灯熄灭着，月亮是暗暗的，死一般静寂，只有微微的呼吸，以判别床中睡的是人还是活着；隔壁书房的灯光，从木门的上面的横式长方的玻璃上透射些光照过来。睡着的B一点也不动，约莫有三个钟头罢！如常的死般睡着。

爱 书房中，她的爱者G，在书桌前收拾他照例做完的工作，伸个懒腰，静默的长伸出两腿来，似乎躺在帆布椅样的把身子放在坐的藤椅上，口吸着烟卷，想从这里温习他一天的课业，又似乎宁静百无所思似的，待烟吸完了，轻轻踱进寝室，先把未关好的窗门收起来，想是要放轻些，勿致惊醒B的好梦，不想反而不自自然地铿的一声，窗关了的声响，魔被挑拨其蛮性，发为不清澈而反抗的声：“什么？把窗子弄的那样响！”爱听不清魔说的甚么，只放轻脚步走到床前，扒开帐口，把手抱住B的脖子，小声的喊着B，继而俯下头向B亲吻，头几下B没有动，后来身子先动了两下，嘴也能动了，能应G的叫声了，眼睛闭着，B的手也围住G颈项，坐了起来。B不久重又睡下，这时床上多添了一个G。

魔 你那么大声关窗子，把我弄醒了。

G 声并不大。

B 以后由我来关好了，我先关窗再睡。

G 不用，你睡了醒透再关就好了。

.....

死一般寂静来到，没有别的话语，直至良久。但B时时闭着眼，用手抚摩G的脸，继又吻他，总是手，吻，继续的在G的身子上，经过多少时，G说，我起来喝点茶，又吸一枝烟，重又躺在B旁，仍然没有话说，待烟都变成灰，已经散布在床前地下，G说，大约有两点钟了，我们灭灯睡罢！寝室暗黑，这时有些少光从正面的窗外射进来，B是静静的，G老是叹气，B没敢问，陪了经过好久时间，有点鼾声从G那里发出，B放心睡下，偶然G动了动，B赶快曲着身子来抱他，但总觉得他是被睡魔缠扰般不能自主地回抱。

魔 在那帐顶上狰狞发笑，G是长叹，B不知用什么法打进（按疑为尽——整理者）那魔。

那么，这出《魔祟》表达的究竟是什么主旨，抒发的究竟是什么情感呢？我自然地联想起许广平生前的很多回忆文章。比如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五日，版画家陈烟桥等乘许广平从北京到上海之机，在上海美协召开了一次座谈会。陈烟桥问起鲁迅在上海时期的工作情况。许广平回答说：

一般（上午）十一二点钟醒来，习惯在床上抽几根烟。在北京时就这样一边抽烟一边看报。在上海时因有帐子，就把帐子撩起来坐着想。起床后，一般不吃早饭，不一定洗脸就工作了，到下午三四点钟才吃些，不给他也不要吃，这样一直工作到晚上，往往吃一小杯酒才吃饭，深夜再吃些零食之类。平时吃了午饭常到内山书店，大约三四个小时回来。吃晚饭后和小孩玩，孩子睡后仍是写作，写得累了就靠在藤榻上休息一

会，有时也谈话，谈得高兴时就不写了。这样一直写到两三点，有时到天亮，那时我已起来，就给他弄些吃的（一般是鸡蛋之类），之后才睡。

（原载一九八四年《新美术》第一期，同年《鲁迅研究年刊》转载）

我觉得，许广平这段回忆，可说是提供了鲁迅晚年的一份作息时间表。跟《魔崇》相吻合的是：一、剧中的“睡的人”也是习惯夜间工作，大约半夜两点才睡，“睡的人的爱者”先睡；二、写得累了就靠在藤榻上休息一会；三、床上悬挂了蚊帐，“睡的人的爱者”跟“睡的人”谈话交流时要“扒开帐口”，有时“习惯在床上抽几根烟”。在这次座谈中，许广平还谈到鲁迅写作时“有时听到什么声音之类也起来看看”。这跟剧中人听到“铿的一声”，发现窗门未关好就起身轻轻关上也完全吻合。

许广平在其他回忆文章中也提供了跟《魔崇》相同的生活细节。比如剧中写“书房中，她的爱者G，在书桌前收拾他照例做完的工作”。在《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一文中，许广平写道：“他处理用品，就象药房的整然有序，无论怎样忙，写完字之后，一定把桌面收理好，然后才做别的事。”

剧中表现了这对夫妇之间的恩爱和因娇嗔而产生的怨艾。许广平在回忆录中多次描写过鲁迅对她的“体贴温存”，如在《鲁迅先生与海婴》一文中，特别谈到她生育之后鲁迅对她加倍的同情和爱惜；在《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一文中，许广平详细描写了她临睡前的情况：鲁迅因为还要写作，每每赎罪似地陪

先她几分钟，边抽烟边聊天。当然，鲁迅和许广平跟其他任何夫妻一样，婚后的生活无论多么甜蜜，都难免有短暂的摩擦和一度产生的隔膜：一方面，面临内忧外患，斗争中必须“横站”，鲁迅也有心情不好脾气变坏的时候；另一方面，许广平对鲁迅也有体贴不够，理解不够的地方。为此，许广平在鲁迅逝世之后经常产生追悔之情。

一九四五年，在临近鲁迅逝世九周年的日子里，许广平的这种追悔之情似乎表现得更为强烈。同年十月二十日，她在上海《周报》发表了一篇《忘记解》。文中写道：

在他死后，我对他生活各方面的情形，似乎更能了解。即如日常生活上许多小事情，在他活着的时候，我是并不十分了解的。比方写文章，他总高兴在夜里工作，时常因此失眠，一到白天，又因事务纷繁，没有能好好休息，那里我心里总难免抱怨，为什么一定要夜里工作？可是在我自己执笔为文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也还是选这夜里十时过后，比较静寂的当儿。现在可以说：每逢我在这里写作，也就引起我回忆他，不由得对于他那艰苦的毕生工作寄予无限凄楚的同情，这是随着他逝世之后一天天加深起来的。以前，我不愿撒谎，因为自己欠体验，对于他那专在夜里工作实在颇为反感。

我以为，这一段回忆文字，其实就是《魔祟》一剧最好的注脚。独幕剧中的冲突就是发生在男主人公夜间写作的时候。女主人公对男主人公一度产生抱怨，是因为男主人公关窗时动静稍大，惊扰了她的酣梦；其实男主人公是想把动作放松些，

关窗的目的是怕女主人公吹风受凉。许广平后来回忆她跟鲁迅的婚姻生活时，感到之所以曾经说过不理智的话，完全是因为睡魔在作祟；男主人公上床后“不能自主地回抱”她，给她以更多的温存，也是“被睡魔缠扰”。所以，剧的结尾是女主人公要想尽一切办法驱尽睡魔。同年十月二十三日许广平发表在《文萃》第三期上的《鲁迅先生的香烟》一文，写的是因为没有劝阻鲁迅抽廉价香烟，而且轻信了鲁迅“抽烟并不吞到肚子里”的说法，致使损害了鲁迅的健康，深感“确确实实太对不住他了”，所以才写此文作为“自认无可饶恕的供状”。我以为，《魔祟》也是许广平写的另一份“自认无可饶恕的供状”。

正是基于以上理解，在《血的蒸气，真的声音》一文中，我写了一段评价《魔祟》的文字：

《魔祟》是一出独幕剧。原稿未注明写作年月。据分析，当写于鲁迅去世之后。剧中“睡的人”是许广平，“睡的人的爱者”指鲁迅。“魔祟”象征一种与理智（intellect）相对立的本能（instinct），它在相爱的人之间制造精神与肉体的障碍。剧本描写了鲁迅就寝前的一幕。这是许广平与鲁迅同居生活的艺术写照。在《“这也是生活”……》一文中，鲁迅曾经说：“给名人作传的人，也大抵一味铺张其特点，李白怎样做诗，怎样耍颠，拿破仑怎样打仗，怎样不睡觉，却不说他们怎样不要颠，要睡觉。其实，一生中专门耍颠或不睡觉，就因为倒是有时不要颠和也睡觉的缘故。然而人们以为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于是所见的人或事，就如盲人摸象，摸着了脚，即以为象的样子象柱子。”（《且介亭杂文

末编》)《魔祟》一文的珍贵之处,恰恰就在于展现了鲁迅的“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的日常生活,展现了伟大的鲁迅作为人的血肉之躯。我们切不可把它当成“生活的渣滓”扬弃。诚然,剧本中的鲁迅也跟常人一样睡觉,但他却比常人睡得迟,一般都在凌晨两三点方能入睡,习惯于在妻儿熟睡之后孤灯独对,据案写作。如果写比较长的文章,甚至会彻夜不眠。睡觉前,鲁迅常不由自主地发出叹息声。这是因为环境艰苦,人事纷繁,常常使他苦痛,需要像一匹受伤的狼,在草莽丛中默默地舔干身上的血迹。不过,这个剧本的着重点并不在于描写鲁迅的写作生活,也不在于正面描写他们夫妻之间的亲密之状。许广平从记忆深处追寻她跟鲁迅生活中的这平凡的一幕,主要是为了抒发她在鲁迅去世之后深沉的怀疚之情——这正是她对鲁迅的爱情历久不衰的一种曲折的表达方式。由于睡魔作祟,“熟睡的人”曾经埋怨她的爱者“那么大声关窗子”,以致把她弄醒了,而其实“声并不大”,她的爱者本想尽量把声音放轻些,勿致惊醒她的好梦。在鲁迅活着的时候,夫妻间这种短暂的误解是会焕然冰释的。但鲁迅死后许广平进行自省,则因当时的不理智而感到一种无可把握的悲哀和无法解脱的沉重。从这个意义上说,《魔祟》一剧可以视为许广平的“自认无可饶恕的供状”。

(《欣慰的纪念·鲁迅先生的香烟》)

这篇文章连同包括《魔祟》在内的许广平三篇佚文先刊登在一九八五年五月《鲁迅研究动态》第一期,后收入湖南文艺

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九月出版的《鲁迅史实求真录》，没有听到什么异议。这种情况到二〇〇一年发生了变化。新世纪之初，一家名为“世纪”的出版集团出版了一本名为《鲁迅与许广平》的小册子。作者倪墨炎，据介绍“是严肃的现代文学研究者，也是鲁迅研究专家，他的藏书之富（据说有二百多箱）和资料功夫之到家，在圈内人中早有公论”。因为二十年前我写过一本题材相类的小书，又因为这本小册子当时正在我们单位的书店出售，近水楼台，便顺手取来翻翻。真是“不翻不知道，一翻吓一跳”。在这本书的《序二》中，读到了一段令我惊诧莫名的话：

书中的新意，我想读者自会去领略，此处只举两个例子，以便于管窥全豹。鲁迅与许广平同居的时间，过去的传记作者多定在上海时期或广州时期，而本书认为，早在北师大（应为女师大）闹学潮的时候，许广平曾暂住鲁迅家中，当时两人便已同居，那是一九二五年的事，许广平才二十六岁，还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作者是从一些外围材料入手进行这一研究的，其中主要是根据许广平的作品，尤其是一篇名为《魔祟》的独幕剧。我感到作者运用了一点近似于弗洛伊德的方法，我是很欣赏这种研究方法。

这篇序言吸引我马上去阅读相关正文，看看“弗洛伊德的方法”在中国的鲁迅研究界究竟发生了什么奇效。在这本小册子的第六十二页，我读到了下面一段文字：

这剧发生地点：“一间小巧的寝室，普通一门，另一间是书房。”这正像是鲁迅家的南屋。许广平在八月中旬在这里住了五六天，以后也常到这里住宿。这作品，是纪实？是寓言？是象征？是讽喻？按照通俗的理解，它是否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在定情以后，他们的爱情又快速地进入了新的更高的阶段。这篇作品当时也为鲁迅扣下，没有发表，但他们一直保存着。

应该承认，这段文字在表述上比较委婉曲折，但从中能够引申出的只能是《序二》作者得出的那个结论。倪墨炎所说的“定情”，是指鲁迅与许广平由师生关系转化为爱情关系，这有许广平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发表于《国民新报副刊（乙刊）》的《同行者》一文为证。许广平在这篇文章中明确表示，她跟鲁迅已经沐浴于爱河，“只一心一意地向着爱的方面奔驰”。那么倪墨炎所说的“定情之后，他们的爱情又快速地进入了新的更高的阶段”，“按照通俗的理解”会是什么呢？除弱智者外，任何读者都会知道他想要说的会是什么。倪墨炎在这本小册子的《后记》中信誓旦旦地说，他的写作态度是严肃的，“必须言必有据，而不采用小说家的虚构、想像和编故事”。果真如此，我倒想问问：你把《魔祟》剧情的发生地确定为鲁迅阜成门西三条故居的南屋有什么铁证呢？鲁迅这个故居的南屋主要是鲁迅的藏书室和会见一般客人的场所，根本不是他平时用以写作的“书房”。这里一无电灯，二无玻璃，三无蚊帐，跟剧情的描写完全不同，你怎么就能据此断定剧情发生在北京呢？一九二五年八月，许广平因参加女师大学潮被开除，害怕校方

勾结军警押送她回原籍，才被迫到鲁迅家避难。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明确写道：“我就在现今故居的南屋，和老同学许羨苏（按：小说家许钦文的妹妹）住在一起，躲过了最紧急的几天”。标榜“言必有据”的倪墨炎先生，你又是依据什么来推翻许广平的回忆，把“和老同学许羨苏住在一起”曲解成跟鲁迅同居呢？又根据什么说许广平“以后也常到这里住宿”呢？你还有什么证据，证明此剧“曾为鲁迅扣下”，而不是写于鲁迅逝世之后呢？你如果真是一位严肃的研究者，那就从你丰富的藏书中把证据列举出来吧！因为事实胜于雄辩，你掌握的实证肯定会比那种人身攻击的文字更具杀伤力。何不亮出来，让读者开开眼，长长见识？

应该说明的是，此前我不但跟倪先生毫无个人恩怨，还有一些业务上的交往。他出版的大作常常寄赠我，我从中也曾有所获益。因此，我不会以偏概全，全面否定倪先生在出版领域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成绩。但他对《魔崇》的考证确实太出格了。我激于一种学术上的正义感，写了一篇与之榷商的文章，题为《着了魔的心理分析》，刊登于二〇〇一年《鲁迅研究月刊》第三期，《人民日报》《中国文物报》也曾发表或转载。全文是：

我读书有个积习——先看序跋，后观正文。此番浏览倪墨炎、陈九英夫妇合著的《鲁迅与许广平》亦如此。

序言有两篇。序一由鲁迅公子周海婴先生撰写。序二的作者署名刘绪源；据序文透露，他就是率先在《文汇读书周报》连载此书的责编。海婴先生在他的序文中表示了两点担

心：一是“类似题材的书已经有过，是不是能超越以前的作者，而不沦于炒冷饭，并不是很容易的”；二是鲁迅与许广平之间并没有“戏剧性的秘闻”，在当前的书籍市场上是否缺少吸引读者的“卖点”。读完刘序，才知道周先生的忧虑似乎多余，因为这本书中既有“新意”，又有“戏剧性秘闻”。为帮助读者管窥全豹，刘序列举了两个最突出的例子，其一，鲁迅与许广平一九二五年即已同居，那时“许广平才二六岁，还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其二，“在关于鲁迅的葬礼的描写中，作者强调了救国会所起的重大作用，这就把久已为人们所遗忘的历史真相重现在世人的眼前”。

笔者虽孤陋寡闻，但印象中在十余年前即已读过《鲁迅丧仪与救国会》一类文章，以该书作者“藏书之富和资料功夫之到家”应该不会未曾寓目。因此，刘序中指出的这一大发现，仍然没有逃脱周序中所谓“炒冷饭”的困境。倒是刘序所举的第二个例子，的确令读者目瞪口呆，满头雾水。如果该书作者果真“以史实为本”，那此前所有的鲁迅年谱、鲁迅传记就岂不统统都应该改写。

在多种鲁迅年谱中，发表最早的是许寿裳、许广平、周作人共同编撰而由许寿裳总其成的《鲁迅年谱》。这一年谱内容虽然简略，但由于编撰者分别是谱主的挚友、夫人、二弟，因而自然最为可靠，最具权威。许寿裳在该年谱一九二七年十月项下原来写的是：“与番禺许广平女士以爱情相结合，成为伴侣”。许广平定稿时，将这行文字改成了简单明了的六个字：“与许广平同居”。“同居”，在许广平看来，就是男女双方因情投意合，相亲相近，互相信任同住在一起，而不受当

事人之外的任何方面束缚。以许广平心胸之开阔，思想之前卫，有什么必要故意把她跟鲁迅同居的时间推迟两年呢？难道早同居就人格渺小，晚同居就精神高尚吗？

根据常理，要推翻一个重要史实，必须拿得出有足够说服力的证据。那么，《鲁迅与许广平》一书披露的这一“戏剧性秘闻”有何根据呢？对此，刘序作出了明确解答：“作者是从一些外围材料入手进行这一研究的，其中主要是根据许广平的作品，尤其是一篇名为《魔祟》的独幕剧。我感到作者运用了一点近似于弗洛伊德的方法。我是很欣赏这种研究的。”

《魔祟》究竟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据知情者说，这原是一篇未曾发表过的独幕短剧，用铅笔竖写在两张二十六.六×二十二厘米的道林纸上。有位研究鲁迅也同时研究许广平的人在鲁迅博物馆资料库中翻检许广平的遗物，无意中发现了这篇文稿。经鉴定笔迹，确系许广平佚文，便首刊于一九八五年出版的《鲁迅研究动态》第一期。这出短剧原未注明写作年月，经分析考证，当写于鲁迅去世之后。所谓当时“为鲁迅扣下，没有发表”纯属子虚乌有。许广平通过对她在上海跟鲁迅同居生活的艺术写照，委婉含蓄地抒发了她对鲁迅的缅怀和愧疚之情——这种愧疚之感正是她对鲁迅挚爱和对自已苛责的自然流露。

那么，《鲁迅与许广平》一书的作者如何能够从《魔祟》一剧中得出鲁迅跟许广平一九二五年便已同居的结论呢？查原文，作者的理由是：“这剧发生地点：‘一间小巧的寝室，旁通一门，另一间是书房。’这正像是鲁迅家（按：指鲁迅北京西三条寓所）的南屋。许广平在（一九二五年）八月

中旬在这里住了五六天，以后也常到这里住宿。”

许广平为什么会在一九二五年八月到鲁迅北京寓所暂住？原来，当年八月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勾结北洋政府教育部，出动军警、流氓武装解散女师大，并准备采取“林冲押配沧州”的办法将女师大学生领袖许广平等六人押解遣送原籍。据许广平回忆，她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平日过从很密的亲友，同学，很多都怕惹事，拒绝招待了。这时候只有鲁迅挺身而出，说‘来我这里不怕！’于是，我就在现今故居的南屋，和老同学许美苏住在一起，躲过了最紧急的几天。事后曾经听说，有几个警察也来过西三条胡同，但都被鲁迅坚决顶回去了”（《鲁迅回忆录·女师大风潮与“三一八”惨案》）。《鲁迅与许广平》一书的作者无视上述历史背景，把鲁迅故居南屋接待一般来客的客厅当成了鲁迅通宵写作的书房，尤其不能原谅的，是有意或无意地抹杀了许广平当时跟许美苏同住的事实。经过这种走火入魔的分析和大胆的加工篡改，鲁迅的正义之举就变成了金屋藏娇、乘人之危的劣迹。这种主观臆断的不良学风居然能受到某些人的欣赏，真是令人匪夷所思。我不知道这种作法跟本书作者严词谴责的“戴着黄色的眼镜看世界上的一切事”又有什么本质区别！

历史的真相是：鲁迅跟许广平于一九二五年十月相恋，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下旬正式同居。笔者重申这一史实，并非这些日期对于鲁迅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评价鲁迅的历史地位主要取决于他的文化业绩本身，而不能光将目光盯住其脐下三寸。笔者之所以不能已于言，主要是想在历史人物研究中张扬一种存真求实的学风，反对主观臆断，哗众取宠。令人

遗憾的是，在《鲁迅与许广平》一书中，类似失误还可以举出一些。比如，书中专设《关于妓女》一章，结论是：鲁迅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六日日记中“邀一妓略来坐”的记载是借妓女陪坐作掩护跟革命者秘密接头。据笔者所知，这种说法也是毫无根据，令人哭笑不得。

刘绪源序文的不确和欠周之处也还有一些。比如，他把当前鲁迅研究队伍大卸三块：其一是以年轻人为主体的“骂派”，其二是“以专家或后继者自居”的“捍卫派”，其三是《鲁迅与许广平》一书作者为代表的“真正实事求是的研究者”。而事实上，对所谓“骂”和“捍卫”都要具体分析，而不应含含糊糊地一概“骂杀”。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这才是鲁迅本人一贯坚持的文学批评观。至于严肃的实事求是的研究者，行文有时也难免欠严肃或有失误。写序不是友情演出，序言不是商品广告。如果使读者把谬误也当成“令人信服”的新见解，是对读者的一种误导。再则，《鲁迅与许广平》一书明明署有两位作者的名字，显系“合著”。但刘序通篇只对其中的一位大加褒扬，这就难免使人对这种联名的目的产生不必要的想法。当然，指出末一点有些近于吹毛求疵。不过，既然有“疵”，吹毛求一下也未尝不可。

我的这篇文章发表后，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得到了很多同行的认同，也得到了倪墨炎先生的反批评。同年四月二十八日，他在《文汇报读书周报》发表了一篇长文，题为“关于《鲁迅与许广平》的几个问题”，对我的批评进行了全面反驳。其主要观点是：《魔崇》“实是纪实作品”，“所写的不是夫妻间的日

常的性爱生活的‘平凡的一幕’，而是极不平凡的一幕——它记下了鲁迅与许广平的第一次性爱生活。正因为是‘第一次’，它才有写下来的意义。虽然这作品没署写作年月，在目前没有能看到原稿和其他进一步的材料的情况下，我们比较倾向于认为，它写于鲁迅在世之时。例如，在他们上海定居，有情人终成眷属，有了一个温馨的家，两人偶或谈起‘第一次’，成了他们甜蜜的回忆，具有“害马”性格的许广平就无所顾忌地把它写了下来，或许，在他们有了海婴的时候，这是他们爱情的结晶，难免会使他们回忆起‘第一次’的结合，许广平就欣然命笔；又或许，在他们‘十年携手共艰危’的时刻，鲁迅不是写了诗送给许广平吗，可能他们共同回忆了这十年的风风雨雨，而有意义的‘第一次’更使他们难忘。因此，《魔祟》所写的是美好的回忆，是爱情的追踪，是欣然于相知相亲的久远，根本不是什么‘忏悔之情’。”读者会发现，在以上引文中，倪墨炎这位“严肃的现代文学研究者，也是鲁迅研究专家”行文不再曲折隐晦了，而是斩钉截铁地断言《魔祟》“实是纪实作品”，写的主要是鲁、许之间的“第一次性爱生活”。令人遗憾的是，他在论证中，用的却是“或许”，“或许”、“又或许”的带揣测性的一系列排比句，而没有亮出他的“言必有据”的证据，因此读者实在无法从中领略到他非凡的“资料功夫”。

我虽然没有倪墨炎这样深的学术造诣，但也好歹是文化大革命之前中文系的大学毕业生。在我有限的中外文学史常识中，真还不知道有哪位著名作家用作品纪念他的“第一次性爱生活”；也还不知道有哪位评论家是通过考证他人的“第一次性爱生活”而闻名于世。从鲁迅生前至今，研究鲁迅的文章可

谓汗牛充栋，但像倪先生这样填补研究鲁迅“第一次性爱生活”空白的专家也真可谓独一无二。倪墨炎为什么在这篇文章中居然敢公开断言鲁迅“第一次性爱生活”的时间呢？他为什么会摆出一种有恃无恐的架势呢？这篇文章公开了一个“绝密信息”：“许广平对她人生历程中的事是有记录的。其中记录着：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日第一次接吻，一九二六年某日第一次性爱。（这‘某日’，电话中说：‘具体的日子我就不说了。’）得到这样的信息，我的心激动得久久不能平静：我们对《魔崇》的理解是正确的，这终于得到了当事人的历史记录印证；比我年长四岁的我敬重的先生，把这样的‘绝密信息’告诉我，他的推心置腹的情谊，使我感动得流下泪来……”。也就是说，这一信息他是从长途电话中获悉的。打长途电话的是一位“先生”，一九二九年出生（倪墨炎一九三三年出生，减四岁，应为一九二九年）。这位先生掌握了鲁迅和许广平的“历史记录”，跟倪墨炎有着“推心置腹的情谊”。倪墨炎为了证明自己一贯“正确”，不惜对这一“绝密信息”立即解密，给我以有力的回击。倪墨炎的书中明明暗示《魔崇》的故事发生在一九二五年八月中旬，但在这篇文章中却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估计“一般读者恐怕读不出所以然”），便由另一位“文艺理论造诣很高”的“全能的作家”、《序二》的作者出面，写了《来函照登》和《一段公案》，先后发表在同年五月二十五日的《人民日报》和《安徽文学》第九期。这两篇文章除继续对倪墨炎“在研究中运用了新的方法和思路”表示“欣赏”之外，也迫不得已地作了一点自我批评，即将鲁迅和许广平“第一次性爱”的时间从一九二五年八月修正为“一九二六年五月”。

他的依据也是那位打长途电话的先生提供的“最权威的证据”。

不过，无论那位打电话的先生如何权威，终究成不了倪墨炎笔下的所谓“当事人”，这是显而易见的。此外，即使鲁迅和许广平“第一次性爱”的时间有确凿的历史记录，那也不一定就能够跟独幕剧《魔祟》联系起来。剧中描写男主人公“老是叹气”，“G是长叹”，卧室里“死一般静寂”，女主人公“如常的死般睡着”，这也不是“春霄一刻”应有的情绪和氛围。

我原来不敢妄断跟倪墨炎通长途电话的那位先生究竟是谁。但周海婴在同年《鲁迅研究月刊》第七期发表了《关于〈魔祟〉答倪墨炎先生》一文，严词谴责倪墨炎不顾他的反对，不惜失信，不惜伤害他，公然侵犯他父母的隐私权，我这才得以确认倪墨炎所说的所谓“绝密信息”的提供者。海婴先生严正声明，关于他父母的婚恋情况，应该以许广平、许寿裳、周作人共同编撰的《鲁迅年谱》作为依据，因为这份年谱是许广平自己认定的，而鲁迅与许广平同居的事实，又发生在周海婴出生之前。作为儿子没有依据变更母亲认定的事实。周海婴在文章中还揭露了倪墨炎蒙骗读者，蒙骗他，并借以蒙骗笔者的手法，并警告他要为此承担应负的法律 responsibility。关于被倪墨炎和《序二》作者当成唯一论据的那份记录，周海婴作了真实的说明。他针对倪墨炎的文章指出：“您所谓的‘一本记事录’或‘一本记事簿’也是不对的，那是母亲的两片单页小纸，上面只有日期，一个中文字也没有。”只有日期而无文字，充其量也只能说明这个日期的重要性和特别意义，怎么能够用想象来填补文字空白呢？倪墨炎揣测海婴先生发表此文是屈于我的压力，与事实完全不符，只不过是自作聪明罢了。

周海婴的这篇文章是他著作中的上乘之作，对于倪墨炎而言不啻为一枚重磅炸弹。在气急败坏之下，倪墨炎又写了一篇文章过饰非的长文《我和海婴先生的交往和争议》。俗语说：“文如其人。”这篇文章在读者面前展示的，是一个为了维护自己哪怕是一点点小小面子而不惜损害友谊，不惜背弃道义的人物的形象。倪墨炎在这篇文章的附记中说，周海婴曾打电话希望跟他“恢复友谊，不要发表与他有争议的文章”。他答应了，但转眼间，又违背承诺，将此文提供给《鲁迅的五大未解之谜》的编者，继续跟周海婴公开进行争论。他一方面“向海婴先生再次表示道歉”，另一方面又责问海婴干嘛把“绝密记载”告诉他，“既有今日，何必当初”。既然如此，那他的“道歉”又有什么必要，又有几分诚意呢？倪墨炎的《鲁迅与许广平》原来是在《文汇报读书周报》连载的，他在那本书的《后记》中也曾对该报直接或间接的“关爱”表示过感谢。但为了强词夺理，他竟不惜指责该报的“按语”与事实不符，是在做姿态给海婴看，同时“开脱自己的干系”。众所周知，倪墨炎先生跟刘绪源先生的关系非同寻常。他们不但是文友，刘还是《鲁迅与许广平》一书的欣赏者、催生者和促销者。倪墨炎公开承认，这本书融入了刘的“大量的智慧”。而一旦这本书遭到了异议，倪墨炎仍不惜让刘站出来订正史实，而对自己的责任却轻描淡写；相形之下，刘倒显得十分仗义，大有代人受过的古侠士之风。倪在这篇文章中说，他的责任仅仅是当初没有明确告诉刘《魔崇》写的是一九二六年初夏的事。事实上，《序二》对书中有关描写和暗示的概括是准确的。倪写此书的时候，海婴先生并没有提供那个“绝密信息”，所以倪墨炎的脑海中不可能明确形成

“一九二六年”这个时间概念。他也不可能有底气明确告诉任何人“《魔祟》是写一九二六年初夏的事”。《序二》作者在《一段公案》一文中也承认，是在此书印行之后，才有人给倪墨炎打电话，提供“新材料”和“最权威的证据”。《序二》显然写在此书印行之前，决不可能在此书印行之后。倪墨炎应该扪心自问：你当初有可能向《序二》的作者提供“一九二六年”的新说法吗？为了把自己的失误摘除得一干二净，倪先生宁可让鼎力支持过自己的老友受过，宁可有负于有恩于自己的报社，宁可违背他对那位他所“敬重的先生”的承诺。一个人处世为人能做到如此地步，实在不能不令人感叹“世风日下”！

关于《魔祟》的论争，本来主要发生在我与倪墨炎之间，不幸王锡荣二〇〇二年初也介入了此事。王是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常务副馆长，倪是该馆馆刊《上海鲁迅研究》的顾问。应该说，在王的眼中，倪的学术地位还是蛮高的。此前也未闻他们之间有什么过节。王在广东的《鲁迅世界》第三期发表了一篇《我看〈鲁迅与许广平〉争论》，完全是因为其时他正在编写一部《鲁迅生平疑案》。因为对《魔祟》的考证有疑点，自然就列入了他这本书的选材范围，而并不是出于对我的声援。

凡是读过王锡荣这篇文章的人都应该承认，他在我和倪之间采取的是一种比较中性的立场。他客观介绍了双方的观点，对我和倪都有所肯定，有所批评。我最近才细读了这篇文章，最不能认同的是王对《魔祟》一剧地点的考证。倪墨炎咬定剧情发生在北京，因为“在上海和广州鲁迅、许广平居住过的地方，都没有这样的房子结构”；而王却说剧情发生地点原非北京，也非上海，“只有广州还有点像”。在我看来，这种生硬对号的

研究方法实不可取。须知,《魔祟》的内容虽有纪实性,但绝非一篇严格的报告文学,而是有虚构成份的创作——“魔祟”本身就是象征,而不是纪实,这是显而易见的。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他笔下的人物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许广平的《魔祟》何尝没有拼凑的成份?何必把剧中的环境描写的细节一一坐实,以致作茧自缚?倪墨炎在文章中说我认为《魔祟》“是写真人真事的纪实之作”,我重新查阅了有关拙作,我的文章中绝对没有这句话。我只说过这是一出“用象征手法撰写的独幕剧”,只说过这个剧本是“许广平与鲁迅同居生活的艺术写照”。既然是“艺术写照”,自然会有虚构的成份,比如鲁迅的《朝花夕拾》,就有纪实的成份(即“史”),也有虚构的成份(即“诗”)。倪墨炎把我所说的“同居生活的艺术写照”概括为“纪实作品”和“实录”,只能暴露他对“艺术”十分隔膜。然而,就是王锡荣这样一篇想“作一个尽量客观的评判”的文章,却给他招来了一连串无妄之灾。

到了二〇一〇年,倪墨炎的《真假鲁迅辨》一书问世。因为我跟他围绕《魔祟》一剧进行过论争,自然成为了这本书的主要靶子。陈福康成为了陪绑,主要是因为他在“鲁迅茅盾致红军信”的问题上跟倪意见相左。王锡荣也成为陪绑,就是因为他写了《我看〈鲁迅与许广平〉争论》这篇文章。我曾经多次设想,当初我写文章跟倪争鸣,如果态度平和一点,措词温婉一点,是否就不会导致后来的冲突?但看到倪对王的态度,就感到,只要我发表跟他不同的意见,即使写得再温吞水,以他的气量,结局大概都差不多。

据倪墨炎讲,《真假鲁迅辨》这本书的意义是“还我真鲁迅”,目的是抵制鲁研界“假、大、空、霸”的学风。这真是一个响亮的口号!这真是一个能够得到读者普遍支持的口号!这部五十余万字的煌煌巨制,据说耗费了作者“四年宝贵的人生时间”,而且动员了全家三人(夫妇加女儿)一起披挂上阵,令人感到这个小家庭真是一个无坚不摧的战斗集体。这使我自然联想起了在歌坛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吉祥三宝》。我真的希望这个家庭成为鲁迅研究界的一个新的所向披靡的组合。

从《真假鲁迅辨》这本书来看,在鲁研界打着“求真”旗号“弄虚作假”,“把有说成无,把无说成有,所白说成黑,把黑说成白,能骗则骗,能瞒则瞒”的罪魁是谁呢?就是被倪墨炎批判的鄙人;还有作为陪绑的王锡荣和陈福康等。那么,“不论要承受多大压力,不论要付出多大代价”都要跟“瞒和骗”血战到底的主将是谁呢?就是这位《真假鲁迅辨》的作者。如果没有他的这一“辨”,广大读者还会继续沉溺在“瞒和骗”的大泽里。我早就发现这位作者是精通营销术的。在这本书中,这位作者不仅为这本书做了颇具迷惑力的广告,而且还巧妙地为他今后准备出版的大作做了超前广告。这本书《自序》的第三部分,小标题叫《重写鲁迅传》。他暗示有一套“真实反映鲁迅一生”的鲁迅传即将问世。这套书“一定会走向人民大众,走向青年学生,走向民族”,“我们的鲁迅研究一定会大大改变面貌”。那么令读者翘首期盼的这部书是谁写的呢?书名又叫什么呢?看看《真假鲁迅辨》封底勒口才知道,原来作者就是倪墨炎本人,书名就叫《大鲁迅传》(第一部至第五部),可惜未注明何年何月由何家出版。似乎是在一九二六年初,陶孟和



段祺瑞

教授曾预言他将于二〇二五年发表一部著作。鲁迅为此写了一篇名文《有趣的消息》。我觉得倪墨炎为《倪墨炎著作系列》所做的广告也颇为有趣，表明他是极富前瞻性的作者和极有商业头脑的推手。

说老实话，我眼下还抽不出时间来认真通读《真假鲁迅辨》，只是浏览了一下这本书的篇目和其中跟我有关的某些文字。我也决不相信那四位联袂推荐此书的专家、教授都认真拜读了这部大作的全文。因为以这些专家教授的德与识，真的读完了这部书之后总是多少会发现一些问题的，而不会在书评中专事褒扬而只字不谈疵点。当然，我决不会像倪先生那样，出于个人意气，说他只“写过几篇正确的考证文章”，我也决不会在尚未通读此书之前就断言此书全无是处。像书中涉及的中国画《如松之盛》的作者问题，《鲁迅茅盾致红军信》的发表真相问题，方志敏烈士《可爱的中国》手稿传递途径问题等等，都是可以在学术范畴进行讨论的。倪墨炎先生尽可以发表他的高见，但

不必把持不同意见者都打成“假、大、空、霸”的学阀。

浏览《真假鲁迅辩》之后,我感到作者的矛头有三个指向:一是指向鲁迅;二是指向他自己;三是指向跟他有过节的如我这样的人。纯正的学术动机,我看实在淡薄得很。

“指向鲁迅”,是指他批驳的一些说法其实都是源于鲁迅。倪墨炎对此非常清楚。他在《鲁迅遭段祺瑞政府“通缉”的真相探讨》一文开头就写道:“历来认为:鲁迅一生,两次被当局通缉;第一次就是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政府包括鲁迅在内的‘大衍之数’的通缉。对于这次通缉,鲁迅自己说过,不少回忆录,鲁迅年谱、鲁迅传以及历版《鲁迅全集》的注释,也都谈及曾有过这次通缉,几乎已成定论,但笔者认为,对于这次通缉的历史真相,似还可作进一步的探讨。”倪墨炎的朋友对此也非常清楚。在《鲁迅是否遭段政府“通缉”再探讨》一文中他又说:“也有朋友诚恳相告:段政府‘通缉’鲁迅的事,是鲁迅自己在著作中说的……”倪墨炎还认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等”也是子虚乌有,



史沫特莱

这件事也是鲁迅生前说过和在文章、书信中写过的。鲁迅有一个笔名,叫“隋洛文”,后又演化为“洛文”,就是影射此事。我这样说,并不是认为凡鲁迅说过的都正确;事实上,《鲁迅全集》的不少注释中都指出过鲁迅作品中的若干失误。但是,要否定鲁迅本人曾经写进自传中的主要经历,恐怕单凭在现存档案中找不到原件

就予以否认是缺乏说服力的。倪先生说鲁迅提供不实之词是“出于斗争需要”，这岂不是说鲁迅本人也参与了“假鲁迅”的形象建构，也陷入了“瞒和骗”的大泽吗？为此，我写过一篇《段祺瑞政府通缉鲁迅的真相》一文与之榷商，但投寄刊登倪先生大作的同一报纸后被断然拒登，可见如果编者欠公正，所谓学术自由就是一纸空谈。

“指向他自己”，是说《真假鲁迅辨》中的很多篇章实际上是倪墨炎在以今日之手批昨日之颊。中国成语中有一个叫“与时俱进”，是说跟时代一起进步，永不停滞。这是好的。另一个字面相似而实质不同的成语叫“与世沉浮”（亦作“与时沉浮”），说的是为了自己的虚名而随波逐流。《史记·游侠列传》中就有这种说法：“岂若俛仰侪俗，与世沉浮，而取荣名哉。”我试举两例请读者看看倪先生的表现是属于什么性质。

《真假鲁迅辨》的开篇文章就是强烈反对把“鲁迅茅盾致红军信”收入新版《鲁迅全集》（事实上并不是作为正文收入，而只是作为附录收入全集的书信卷）。他断言发表此信鲁、茅二人全不知情，而伪造此信的是陕北的一位“革命同志”。但是，我对这封信的了解最初却是来自倪墨炎以“魏格铭”为笔名编写的《永不休战》一书。书中绘声绘色地写道：“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天晴气爽。太阳暖和地投射在鲁迅的工作室兼卧室里，照得全室通明敞亮。鲁迅正在看报纸，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来了。‘那份电报送走了吗？’鲁迅一见史沫特莱，就急切地问。前几天，鲁迅得到了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欢欣之中，亲自起草了致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电报，用信的形式，托史沫特莱通过秘密途径送去。”读者

诸君看看，这封信的起草者，起草时间，递交途径，“为革命”的倪墨炎先生不是说得一清二楚了吗？加深对这封信重要性的认识，我也是通过倪先生的另一本小册子《鲁迅署名宣言与函电辑考》。倪先生在书中斩钉截铁地说：“鲁迅祝贺红军长征胜利的事，肯定是存在的”；“表明了鲁迅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骨肉相连的关系，表明他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年头满怀胜利的信心，表明了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更臻成熟。这在鲁迅一生的思想发展和革命实践活动中，是一件大事。鲁迅研究者对于此事的重视，是理所当然的。”在这里，我并不想说倪先生本人就是“假、大、空、霸”的始作俑者，是“瞒和骗”的制造者，因为从《永不休战》到《真假鲁迅辨》，毕竟相隔了三十多年的漫长岁月，物换星移，人世沧桑。我们只是希望倪先生不要摆出一幅一贯正确的架势，只是希望倪先生在观点改变之前先勾勒出之所以如此改变的清晰脉络，只是希望倪先生不要因此公开煽动《鲁迅全集》的购买者都去退货——因为



左联五烈士

这并不是我个人的精神产品。倪先生撰文说我是以《鲁迅全集》编辑修订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和《鲁迅全集》书信卷定稿专家的身份，不顾有识之士的反对，强行将此信编入全集。我可以坦然地告诉大家：倪先生所言全是诬枉！我只是客观介绍过不同意见双方的观点，而从未对最终处置方式发表过任何意见。倪先生在《真假鲁迅辨》的《后记》中郑重感谢了《新文学史料》的主编郭娟女士，说她“不分门户”，“公正、公平、公道”，“很有专业水平”，对此我均有同感。值得郑重补充：郭娟女士还是《鲁迅全集·书信卷》的责编。我打电话向郭娟女士介绍倪先生对我的指控，她表示我的陈述都是实情，必要时她可以出面作证。

对于鲁迅是否被国民党政权秘密通缉一事也是如此。一九八四年五月，倪墨炎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鲁迅革命活动考述》，列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之一——这是一套颇有影响力的丛书。倪墨炎在该书第一五一页至一五五页中写道：“这个秘密通缉令的原件还没有找到。但从反动派的另一个密令中，却可以看到他们当年‘取缔’自由盟及其他革命组织和‘缉拿’这些革命组织成员的反动行径。”倪所说的这份密令，就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公函一五八八九号》，现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据倪墨炎说，这份密令的附件中，就有参加第一次成立大会的左联盟员名单——其中无疑包括了鲁迅。倪还进一步质问：“更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没有通缉令，那后来李秉中怎么会写信给鲁迅，表示只要鲁迅答应某些条件就可取消通缉令呢？”如今，这件事已被倪墨炎搞的愈加扑朔迷离。不过，无论如何，这至多也只

能成为一个值得进一步考证的史实问题，决不是什么求真与作伪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

如果说，倪先生对《鲁迅茅盾致红军信》的态度和对鲁迅是否被通缉的看法有一个较长的变化过程，那么在鲁迅新婚问题上的态度则是“迅速变脸”，“华丽转身”。在倪先生的名作《鲁迅与许广平》中，关于鲁迅与朱安的结合是这样描写的：“他不愿拂逆母亲的心愿导致母亲不快，而且他那时已加入了光复会，在外面闯荡，有个媳妇在母亲身边，既可减少母亲对他的牵挂，也可减给他对母亲的挂念，因此他同意结婚。婚后第二天就住到了书房里。亲友们来贺喜，他总是回答：‘是我娘娶媳妇’，好像是一句玩笑话，却包含了多少沉痛。”然而不久，在《真假鲁迅辨》一书中倪墨炎却大批鲁迅婚后第二天就睡到书房去了的说法，说一九〇六年夏天至秋天鲁迅跟朱安一直同居，并气宇轩昂地声称“拆穿谎言，匹夫有责”，似乎制造谎言的是王锡荣，而只字不提他本人此前的说法。这种态度难道是光明磊落的吗？

《真假鲁迅辨》的矛头当然主要是指向行文得罪了他的鄙人。如果倪先生仅仅在学术上对我进行斧正，我是十分感激的，遗憾的是倪先生相当多的文字是在进行个人攻讦。比如他在《为人写序者的责任》一文中有一段含沙射影的话：“应该说，所有按时退休都是正常的。但也有人退休时疑神疑鬼，还讨价还价，提出种种条件，如要求再担任几年某部门的主任，再担任几年某刊的主编，再分管几年哪些工作，到单位要轿车接送，等等。”倪先生，你既非我的同事，更非我的上司，我退休时的表现，你是如何得知的呢？如果我根据道听途说，把你在文

化大革命期间如何如何写进学术著作，你会觉得符合学术规范吗？你既然如此关心我退休的情况，那我就坦荡荡地告诉你：我是二〇〇八年十一月退休的。退休前由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和人事司司长侯菊坤跟我谈话，征询我的意见；鲁迅博物馆的两位负责人也在现场。我的态度很明朗：服从组织安排，没有任何条件，没有任何要求。这一点，我上面提及的这四位应该都能作证。接着，我又写了一份书面发言，题为《告别鲁博》，委托馆长在中层干部会上宣读，除开表示“知足”和“惭愧”之外，同样也没有提出任何特殊要求。这份发言已收入我的学术自传《沙滩上的足迹》第二九四页至二九五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关心此事的读者可以参看。

倪先生对我的学术工作也极尽嘲讽贬低之能事，请看《真假鲁迅辩·自序》中的一段奇文：“例如近年出版的一本《鲁迅评传》……它从头到尾，几乎都是人云亦云，而且是上世纪‘文革’期间到七十所代末的人云亦云，有的段落简直令人怀疑是否从石一歌那本《鲁迅传》中抄来的，我特地找出石著对照了一下，抄倒不是抄来的。”既然“抄倒不是抄来的”，那还说这么多废话干什么呢？差点被倪墨炎打成剽窃之作的这本《鲁迅评传》，其实就是根据我的旧作《民族魂——鲁迅的一生》修订而成。这部书稿一九八一年连载于《中国青年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曾经连播，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这原是一本供青年读者阅读的普及性作品，自然不会像倪先生大作那样内容处处翻新，不过三十年来颇受欢迎，历版不衰；二〇〇六年又应中国社会出版社之约，易名为《鲁迅评传》出版。我深知这本小册子跟“评传”的要求差距颇大，但中国社会出版

社的这套“中国现代名家传记丛书”至少有六、七本，几乎都冠以“评传”之名（如冰心评传，巴金评传，梁实秋评传，徐志摩评传，老舍评传……）我这本书也因此叨光，名不副实地列入了“评传”之列。我边阅读倪墨炎的这段奇文，边想象他那种把拙作跟石一歌著作对照时满怀期待的模样，以及这种期待彻底破灭后的极度懊恼，心中不禁一阵阵窃笑。最近学术界关心学风建设问题。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说，要正“学术”必须先正“心术”。对照倪先生的上述表现，我觉得张教授的意见真可谓一针见血，切中时弊！

通过以上简略点评，可知《真假鲁迅辨》一书“独树一帜”是不假的，但是否真有“学术”创见则又另当别论了。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宁可得罪君子，不可得罪非君子”。因为我的一篇短文，惹出了这么一连串的麻烦，再次印证了古人的这一宝贵的人生经验，令我后悔不迭。想当初，如果我不写那篇《着了魔的心理分析》，最好是不发现那两张写有《魔崇》一剧的纸片，我晚年的生活肯定会要平静许多，文坛也会少许多喧嚣聒噪。我现在真的把肠子都悔青了。后悔药，你在哪里？

我读许广平《鲁迅回忆录》(手稿本)

二〇一〇年三月,有一本装帧典雅、定价合理的图书在市場热销,有人说印数高达二十余万册(版权页并未写明,我也没有其它确证,只是“听说”而已)。这本书就是许广平著《鲁迅回忆录》(手稿本)。

众所周知,当下的图书市场并不火爆,学术性著作的营销更是举步维艰,能发行三千册才能保本,发行四千册才能有蝇头小利,但印数能到三、四千已非易事。那些名目繁多的学术性著作,其实大多是支付了一笔不菲的书号费才得以问世——在社会主义国家,“卖书号”这种说法有伤大雅,比较体面的说法叫做“合作出书”。

那么,像《鲁迅回忆录》(手稿本)这种专业性较强的著作为什么居然能发行到天文数字,被湖北长江集团评为“十年度最有影响十本书”之一呢?我想,这其中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当然取决于鲁迅本身对读者的强大吸引力和本书作者作为鲁迅夫人的特殊身份。其次,此书的选题策划和责任编辑都是出版界的高手,他们的营销能力决不可低估。再次,书出伊始,有几份影响颇大的报纸和有几位影响颇大的学者的宣传推荐也是非常“给力”的。

据有些大报宣传，一九六一年出版的《鲁迅回忆录》虽由许广平执笔，但系“集体创作”，由“上级拍板”，“有很多地方违背作者原意，有被要求改动的左的痕迹”。而“真正能够反映真实的鲁迅一生的书”，就是这部新推出的“手稿本”。“手稿本能够在五十年后完整面世，意味着被极左思潮遮蔽和诠释近六十年的鲁迅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精神的那些事，将得到还原和解放”。还有些报纸宣称，以出版《鲁迅回忆录》（手稿本）为标志，“新世纪鲁迅研究将重新启动”。

谁不愿意购买一本“反映真实的鲁迅一生的书”呢？谁不急于盼着鲁迅从极左思潮迷雾的遮蔽下走出来，显露出他的“庐山真面目”呢？谁不愿意看看“鲁迅家人”“上书中央并得到批准”之后，是在如何运用“二十一世纪的新的思维和研究方法”，使鲁迅研究迅速“旧貌换新颜”呢？（参见二〇一〇年三月三十日《文汇报》第九版“文化视点”）《红楼梦》里的薛宝钗在调寄《临江仙》的“柳絮词”中有一个名句：“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鲁迅回忆录》（手稿本）正是不断地借助以上各种宣传“风力”，迅速将销售量送上了“青云”。

我历来重视关于鲁迅的各种回忆录，其中又特别重视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因为许广平是鲁迅的夫人，对鲁迅的家庭生活和社会活动的某些重要侧面有着独特的观察、感受和理解；尽管她的回忆也有失实之处，但毕竟为其他任何人的回忆所不能取代。在一九六一年五月作家出版社出版这部《鲁迅回忆录》之前，许广平曾于一九五一年七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欣慰的纪念》，一九五四年六月出版过《关于鲁迅的生活》。这些回忆录大多写在建国之前，受环境迫压，自然无法充分展

示与政治有关的内容。但书中对鲁迅日常生活真实而生动的描写——如读书、写作、娱乐、吸烟、饮酒、品茗，乃至母子情、夫妻情、父子情……却都是再现“人之子”鲁迅肉血之躯的必备史料。记不清许广平在哪篇文章中说过，如果置身于另一种环境之中，她也许就不会这样写了。

许广平于一九五九年夏秋之际撰写《鲁迅回忆录》，是为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故内容多从鲁迅经历的大事和鲁迅生平的大处着墨——尤着重强调鲁迅在上海时期跟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关系。只要回忆的内容属实，正可跟《欣慰的纪念》和《关于鲁迅的生活》相互参照，相得益彰。更何况又读了关于《鲁迅回忆录》（手稿本）的诸多宣传文字，学术兴趣一直向史料方面倾斜的我更对这部畅销书充满了种种期待和好奇。令我感到遗憾的是，在认真读完全书之后，发现只有学者朱正最初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从鲁迅研究的专业角度来说，史料价值会很有限”。（二〇一〇年三月三十日《新京报》十二版）当时有另一位学者预言，通过“手稿本”有可能看出作为“鲁迅的死敌”的周扬是如何指导许广平回忆鲁迅的，有可能看出“许广平的立场和视角”是否受到了“当时文化界领导人的暗示”，但愚钝如我者，读后实在看不大清晰。

那么，《鲁迅回忆录》（手稿本）有什么亮点呢？二〇一〇年三月三十日的《新京报》披露了最能吸引眼球的几段精华文字。我猜想，这几段文字多半是有关人士向媒体提供的，因为作为记者，一天要发若干条新闻，哪里会有功夫去爬梳校勘文字？现将《新京报》刊登的“恢复内容选读”全部照录（引文后的“编者注”不知是否为该报的编者撰写）：

原文：话又说回来，鲁迅虽然在上海，但每每说“周作人的文章是可以读读的。”他的确是这样，不因为兄弟的不和睦，就连他的作品也抹煞。每逢周作人有新作品产生，出版了，他必定托人买来细读一遍，有时还通知我一同读。如一九二八年九月二日，日记上也曾记着：“午后同三弟往北新书店，为广平补买《谈虎集》上一本，又《谈龙集》一本”。又一九三二年十月三十一日，买“周作人散文抄一本”。

编者注：周作人抗战后以“汉奸”罪入狱，解放后一直受到批判。

原文：记得到过魏盛里几次之后的某一天，有个妇女从店后走到外面去，经过我们身边，内山先生就指向我们说：这是郭沫若先生的日本夫人，并且又说到郭先生曾住过他的店内。到后来日子一久，了解的更多了。郭先生住在日本，每有写作，寄回中国，都是内山先生代理，收到稿费之后转交给日本夫人，再由她买成中国土产带回日本去。

编者注：删去此节内容，可能是为了保护郭沫若形象。

原文：更有日本改造社记者木村毅被特派来，听说萧伯纳要到上海，要得到第一手消息，通过内山向鲁迅请求：日本记者方面打算派小火轮去到萧的船上访问，而未被允许。无论如何也不能达到目的，却是萧早已被宋庆龄请出去了。日本记者没有办法走进宋的住处，正当傍徨无策的时候，鲁迅忽然得到通知：宋夫人邀请他前往与萧相见。这就解决了日本记者的为难，通过鲁迅给予便利，第一手报导于日本新闻界的是这位记

者，这在资产阶级的社会，在日本新闻界是何等重要呀！

编者注：此时，中日邦交尚未正常化。

除了以上引文，书中被删节的文字还有多处。此外“手稿本”中的第十四章《与北新书局的关系》也全部被删。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确认这种删节是否都由“上级拍板”，也无法确认这样处置是否“有悖作者愿意”。不过，凡是经历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一段非常岁月的人，对于这些改动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周作人的政治身份是国民党政府判定的汉奸，北新书局经理李小峰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郭沫若当时的夫人是于力群女士，而他的日本夫人安娜则被安置在大连，从抗战初期即已分居。出于上述忌讳，必然会作出以上修改。更何況第十四节的内容与第十三节《为革命文化事业而奋斗》有些内容重复。

此外，重要的删节还有对内山完造先生政治背景的怀疑，如“一·二八”上海战事期间内山书店的店员曾为带侵华性质的“在乡军人团”烧饭并做警卫，特别是写到上海沦陷后汪精卫伪政权给内山颁发了文化奖金，内山又用这笔奖金举行茶话会招待文化汉奸，并骗夏丏尊先生和许广平参加。我认为许广平的上述回忆都是她久蓄于心的话。据王士菁、林辰等前辈告诉我，许广平对内山在日本侵华期间的政治表现一直心存疑窦，并说内山在解放后访华时，有一次曾情绪失控，嚎啕大哭，估计是为自己的某些言行而深感愧疚，但由于并无确证，所以采取了暂时按下不表的态度。这样处理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九六〇年，柯灵、陈鲤庭曾传达周恩来总理对电影《鲁迅传》的几点指示。关于内山完造，周总理说：“这个人至今我们还

没有完全弄清楚。从前他曾替我们掩护过一些人，解放后搞中日友协，也受到日本反动派的压迫，但他从前的政治背景究竟如何？还不知道。假定他从前和日本统治者有关系，而日本统治者允许他给我们做些掩护工作，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手稿中原来还有对内山先生为什么支持鲁迅活动的分析：“起先，鲁迅在中国反对反动统治，反对蒋介石政府的残暴压迫，日本军国主义从旁看来，可以看作与己无关，甚或在侵略中国的旗帜下，他也可以利用中国人的反对蒋介石而取而代之，这时没有什么矛盾，内山先生的支持鲁迅活动，在这一意义之下，可能获得日本政府的谅解的。”这也就是说，日本政府默许内山支持鲁迅，是因为鲁迅反蒋跟日本侵华有着目标的一致性。作者定稿时删掉这类不一定妥贴的分析，我也以为是完全正确的。定稿时又删去了对内山的另一番分析。手稿写的是：“这七十多岁饱经沧桑的老人，有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可能在日军占领中国时他发展得强一点偏向日军，而当日本人民受美帝国主义压迫的时候，就倾向于反对侵略的一面，也许是其积累痛苦的经验，带着一支手杖回去所深思熟虑的吧！”这一段文字多有语病，且用“可能”一类的推测性词语进行表述，我以为删除同样是正确的。在修订本中，又增加了一些其它有关内容，如鲁迅在《活中国的姿态》序言中对内山的评价，内山对鲁迅提倡木刻艺术的赞助。这都是必要的增补，否则鲁迅跟内山完造的友谊就令人无法理解了。

显然，一般读者购买《鲁迅回忆录》（手稿本），首先是想发现“极左思潮”是在如何扭曲许广平在鲁迅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因此，书中的《向往苏联》《瞿秋白与鲁迅》《“党

的一名小兵”》《为革命文化事业而奋斗》等章节的手稿原貌就引起了读者强烈的阅读兴趣。但将“手稿本”与“修订本”两相对照，我们就能清楚看到，许广平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其实并没有什么变化。

《向往苏联》一章，“手稿本”编者在注释中已承认：“手稿与《回忆录》相比总体内容无差异。”《瞿秋白与鲁迅》一章，主要内容（如瞿到鲁迅家三次避难，瞿以鲁迅的名义发表杂文，鲁迅在瞿秋白就义之后出版《海上述林》表示悼念等）也无变化。相反，“手稿本”的编者还指出：“《回忆录》除了对内容加以充实外，思想与理论性也有所提高。”这就是说，“修订本”是改好了，而不是改坏了。“手稿本”中原有一些文气不顺的句子，在修订本中已被删除：“然而作为鲁迅个人所能做到的，对革命知己的关怀和友谊，仅只能拼命设法给他介绍出书，冀于物质上有所帮助，从而对病体增加营养，更其对革命有大贡献，但还是遭到现代书局第三种人杜衡的扣押，致《高尔基论文集》终于赎出后才能出版，这里看到中国旧时代的作家说些人民要听的话时，如果不是自己又要经营出版事业，就永远遭受呕气，鲁迅们就是如此度着最黑暗的时日。”“手稿本”这一章中另外一些不合情理的说法，也在修订加工时被删除。如说“鲁迅遵照会议决定绝对相信党，肯定党的必然在不远的将来，即鲁迅逝世后十三周年获得胜利！一切交给党，听命于党，这就是非党的布尔塞维克的鲁迅教给后人他们所应该做的。”显然，“手稿本”中的上述原文才是对鲁迅形象的扭曲。鲁迅再伟大，也不是算命先生，怎么能够肯定中国共产党在他“逝世后十三周年”（即一九四九年）夺取政权，获得胜利呢？

《党的一名小兵》一章，“手稿本”与“修订本”两相对照，也是以后者为佳。“手稿本”中说：“鲁迅，在大革命后来到了上海，觉得前此的看法、态度都错了。”我们承认鲁迅上海时期的思想认识有所转变，有所提高，但决不意味着他此前的一切全都错了。我们决不能只承认鲁迅思想的阶段性而根本否定其一贯性。类似不妥的提法这一章还有一些，如说鲁迅“从理论到实践，完全成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化的以党的领导为依归的绝对坚守着‘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的信念的执行人”，又说“党教育了他，领导着他，不断的党的领导人物和他见面，指导他的工作”；还说鲁迅撰写杂文《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是“在党领导下，执行党的精神，向敌人投下了一颗无烟炸弹，使他们的天下得不到太平，这是党的胜利，是无产阶级向敌人示威的胜利”……这些文字，难道是对鲁迅和党的关系、鲁迅和马克思主义关系的正确概括吗？删掉这些芜杂的文字，难道不是对“手稿本”质量的提高吗？令人不解的是，“手稿本”编者并未指出以上原文和提法是对鲁迅的“拔高”，反而认为“修订本”中提到鲁迅“与李大钊的交往，与李立三的会面，接济党和革命团体费用”等史实是对鲁迅的“拔高”，实不可解。

《为革命文化事业而奋斗》一章，“手稿本”与“修订本”的内容也基本相同，主要删掉了杨骚向鲁迅借款给白薇治病一事，因为这涉及了他们私生活方面的隐私；又删掉了杨骚抢译《十月》一书，“以制鲁迅死命，其心狠毒”这些句子，估计因为这种提法太过分了。这一部分还删掉了有关黎烈文的内容，因为黎当时在台湾从事翻译和教学工作，受当时政治环境所囿，

自然以不提为宜。但这些删改都不影响表现鲁迅跟革命文化事业的关系。

综上所述，可知在涉及鲁迅后期政治倾向的问题上，“修订本”的一些提法反比“手稿本”稳妥。要想通过阅读“手稿本”达到在鲁迅研究领域“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的目的，看来是完全做不到的。

通过阅读“手稿本”，我认为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之所以需要进行修订，主要并非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而是因为“手稿本”文字过于粗糙，在很多方面达不到出版的要求。这既跟写作时期仓促有关（一九五九年七月中旬开始酝酿，十一月底写成初稿），也跟许广平当时的健康状况有关（六十高龄，又被高血压困扰）。这部“手稿本”虽然只有十余万字，但笔误、错字、病句、需要订正的史实以及一些趋时应景的文字太多。手稿本第一章《从“五四”到“三一八”》，原来就写成了从“五五”到“三一八”；“凌乱”写成了“陵乱”，脑海写成了“恼海”，鲁迅一九二六年撰写的《大衍发微》误为一九二五年等等。对这些地方进行加工润饰，跟所谓“极左思潮”完全无关。许广平《鲁迅回忆录》手稿本的宣传文字中，说《鲁迅回忆录》中的修订本中“有不少违背作者原意，有被要求改动的左的痕迹”；但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修订本中，有更多符合作者原意但左的痕迹更明显的文字被删除了。所以，包括许广平在内的修订者的功劳，是决不可埋没的。比如修订稿就删掉了手稿本中若干拔高鲁迅的文字，如第十三页：“鲁迅启示给青年的战术是，随时用质直的方法对待。”（见《两地书》）这个教育，这个指示，非但平时反抗用得着，就是战时军事上也运用得着，暗暗符合

于解放战争的获得胜利，有名的坑道战运用到朝鲜前线也使敌人胆寒力竭，俯首就范。同页：“鲁迅是一个战士，指挥者是党，是党的领导。他只担任一方面思想上的方面，如同党的宣传部的一员。他时刻想着如何才能尽力做好宣传，唤起群众的工作。虽然那里党没有明确给予他责任，但真理只有一个，这就是：遵革命之命的文学。第二九页赞扬鲁迅对章士钊和现代评论派的斗争，并说“这种大无畏的对付敌人是前无古人的战略方法，惟有在后来，在党领导下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才能看到这种精神”。此外，还删掉了许广平表达自己“报恩”思想的一些文字。如第一一〇页“如果说，中国人民感谢党和毛主席，则中国妇女更其加倍地感激党和毛主席，爱戴他，活菩萨一样供奉他，爱之如神明一样信服他，我们真正翻身了。”对手稿本文字欠亨处的润饰更多，为避免行为累赘，将于文末将列一简表举例说明。

许广平在“手稿本”的《前言》中说，她撰写《鲁迅回忆录》曾得到“周扬同志和邵荃麟同志”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于是有人推断书中“有悖作者原意”之处有可能是屈于这些文坛领导人的压力。作者家属所说的“遵命”，编者的友人所说的“无奈地隐忍”，大概某种程度上就包含有这种意思。周扬当时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他不仅三十年代在上海文坛跟胡风进行过论争，而且建国后还主持过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不过，“胡风派”后来被定性为“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集团”，并不能由他来承担责任。周扬和冯雪峰在左联时期的深刻分歧，也是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所熟知的。许广平《鲁迅回忆录》（手稿本）中涉及胡风、冯雪峰的部分，不知是否曾送交周扬

审定？“手稿本”的编者在《党的一名小兵》的注文中说：“手稿与《回忆录》都有与冯雪峰相关的文字，但手稿只限于客观介绍，而《回忆录》是以批判口吻出之。”这里所说的相关文字，是指冯雪峰不止一次劝鲁迅“丢开身边琐事，或讨论个人得失”，“不要使自己变小了”。鲁迅常常说：“雪峰的话是对的”。但许广平认为鲁迅杂文是“砭锢弊常取类型”，这是一种抓住“一时、一事、一人”加以典型化的手段，也是一种战斗方法，所以在“手稿本”中将冯雪峰的意见跟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的观点予以对比，实际上是否定前者，肯定后者。但许广平又引用鲁迅的原话，肯定“雪峰的话是对的”，这就使上下文之间产生了轩轻。有人在“雪峰的话是对的”右边划了一个问号，后来修订时删去了鲁迅的话，改成了“这是十分荒谬的”；“如果照冯雪峰的说法，那末，鲁迅那几十本杂文就大可以不必写了！”我们至今无法断定那个在此处划问号的人是谁，当然无法在尚无旁证之时就让周扬出面来承担这一责任。至于对批判胡风的部分，“手稿本”的原文本来上纲就很高，而且认为在这一问题上“鲁迅也有错误”。请看这段原文：“感谢党，党教会我知道这是个叛国的敌人，从报上披露的三次材料，够说明他的罪行了。如果没有这些材料的披露，像我一样不明底细的人一定还很多呢，鲁迅就是被害的一个。回想起来，胡风冒充进步，加入左联，在左联内部挑拨是非，离间同志，又利用鲁迅作挡箭牌，在鲁迅面前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又说人们骂他就是骂鲁迅，惹得鲁迅也心情不畅，工作紧张，以为自己人方面也会射来暗箭了，凡此等等，今天都明白了。说起来鲁迅也有错误，鲁迅生前是欢迎人们指出他的缺点的。据我看，是

因为鲁迅被敌压迫，不能多向各方面走动，多听各种情况的反映，以掌握全面，仅听胡风等人一面之词，以致讹传事实，引起纠纷，在所难免。”在“修订本”中，虽然仍保留了揭露胡风混入左联挑拨离间的内容，但压缩了许多文字，特别是指责鲁迅“也有错误”的文字。如果这种修改是周扬的意见，那么这种意见也是有某些可取之处的。

至于邵荃麟，他当时是中国作协党组书记，跟许广平有交往，但不多。许广平在“手稿本”前言中曾写道：“如关于女师大事件，就是接受了邵荃麟同志的意见而添写的。”这句话后被删除，但说的是实情。“女师大事件”是鲁迅和许广平斗争史上的光荣一页，也是他们之所以结合的缘故。提出这一建议，的确“使书的内容更加充实健康”了。二〇一一年三月十四日下午，我电话采访了邵荃麟的女儿。她不了解父亲对《鲁迅回忆录》还提过什么意见，但她坚信，邵荃麟历来都是十分稳重的人，从来不跟风，不搞扩大化，被作家黄秋耘戏称为不会抓老鼠的“古怪的猫”，在政治运动中常被扣上“投降主义”的帽子受到批判。

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的“前言”中还写道：“从这回的写作来说，使我深深学到社会主义风格的工作方法，就是个人执笔，集体讨论、修改的写作方法。”我以为许广平当时是从肯定的意义上说这番话的，决不是推卸责任，把删改得体的功劳归于个人，把改坏的部分归咎于集体。如果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许广平完全处于任人摆布的地位，那这本回忆录著作权的归属就会产生疑义。需要说明的是，我在这里并不是为“社会主义的工作方法”进行辩护。在大跃进的高

潮中，受浮夸风影响，集体写书成为了一种时尚，比如北京大学中文系编写的红皮本《中国文学史》，就是该系五五级学生集体创作的成果。所以，当时许广平强调《鲁迅回忆录》是用“社会主义风格的工作方法”写成的，一是为了紧跟形势，二是为了表示谦虚。根据我的了解，当年并没有为本书成立专门的写作班子。许广平的主要助手是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秘书王永昌。动笔之前，她重温了鲁迅著作，摘抄了鲁迅的有关论述（如论妇女问题），又参考了一些名人回忆录（如《回忆高尔基》）。为了唤起回忆，她又采用了跟秘书边散步边聊天的方式，从中整理出几个要点。对本书进行加工润饰的应该还有连载这部书稿的《新观察》杂志的责任编辑和出版此书的作家出版社的责任编辑，但估计他们改动许广平的文稿会采取相当慎重的态度。

对于《鲁迅回忆录》（手稿本）的整理者，本书主编在序言中表示了感谢，他们的确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不过整理中仍有瑕疵，如《内山完造先生》一章，原文是“谁都知道鲁迅在上海的十年间和内山先生有深厚的友谊”，整理者辨字有误，将“深厚”写成“浓厚”，导致用词不当。标点也有误。比如同一章“越想越气恼，我的到来这时总算认识内山的为人”，据原稿应为“越想越气恼我的到来，这时总算认识内山的为人。”全书虽冠以“手稿本”之名，但实际上只有两页手稿作为插图。规范的“手稿本”，应全部手稿影印置前，整理文字附录于后，以便读者核对，否则所谓“手稿本”就名不副实了。

最后概括表述我对《鲁迅回忆录》（手稿本）的总体印象：虽然许广平生前说过她的文稿无可隐秘，但此类手稿只宜作为

史料供专业人员研读，因为对于史料研究者，能接触越多的第一手资料越好；但有无必要作为通俗读物大量印行似可磋商——印数大尽管可以在某些方面产生效益，也可能导致编者始料不及的负面效应。《鲁迅回忆录》的“手稿本”和“修订本”既然都是写作于特定时代，自然会受到那个时代环境的制约；如果单从左的思潮的痕迹来看，“手稿本”也许比“修订本”更为明显。在《鲁迅回忆录》的写作和修订过程中，许广平虚心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但她本人仍然起了重要作用，因而她才可能成为这本回忆录的著作权人。从现在手稿来看，有些部分是由她亲自增删的（如《厦门和广州》一章删掉了关于蒋抑卮和陈仪的内容），所以她理所当然地应被视为修订者之一。综观全书的删改处，有的删改得好，比如涉及许寿裳的文字，手稿中原批评其绅士作风，甚至把他在台湾惨遭暗杀的原因归咎于苟且偷安，未参加战斗行列，“必然招致自身毁灭”。有些地方的删改则不妥，或没有必要，比如删掉鲁迅认为“周作人的文章是可以读读的”这样的观点，从而降低了这部回忆录的真实性和学术内涵。不过，我们目前并未发现“修订本”的原稿，只能看到一部供《新观察》杂志发排的字迹清晰。改动极少的誊抄稿，因此尚不能逐一判定何处修改符合许广平的原意，何处修改有背许广平的原意。但总的来说，对修订者的劳绩还是应该给予应有的肯定。理由很简单：不经修订，这样的“手稿本”如何能够公开出版？

最后郑重声明：本文绝非针对已故许广平先生，而只是想对《鲁迅回忆录》（手稿本）的某些宣传文字发表一点不同意见。

附录:

《鲁迅回忆录》修订举隅

一、加工润饰

页码	手稿本	修订本
五页	凡这些，都使我感动于对文化事业的关怀而鞭策自己。	凡这些，都使我觉得无论如何也得努力一下，来完成这项任务。
五页	“十一”献礼的汹涌热潮又鞭策着我；在总路线多快好省的号召下，鼓舞起我的干劲；工人阶级大无畏的坚决创造意志又不断做我的榜样。	“十一”献礼的热潮推动着我；总路线多快多省的号召激励着我；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冲天干劲和创造精神又不断地影响和鼓舞着我。
六页	就是这点不成熟的准备也写作，尽行工作罢，不能再拖了。写作开始于八月半起动笔，到九月二十日就又停止工作了，回到城内参加些社会活动，这就是每个人都欢欣鼓舞想把自己投入一份去的国庆前后的许多工作。	于是就在这点薄弱的基础上，开始从八月半里动笔，到九月二十日就又停止写作了，回到城里参加我们伟大祖国建国十周年的庆祝盛典……
七页	本书没有大段的对鲁迅说话的记录	本书没有大段的鲁迅谈话的记录

七页	因为极望人多，他就对青年的培植爱护的热诚过重……	因为亟望革命的人多，他就对青年爱护备至，多方培植。
九页	向群众学习，做党和毛主席的忠实的小学生，总会走向较小的错误的。我于是以此献于纪念“十一”和读者之前。	向群众学习，做党和毛主席的小学生，总会减少许多错误的。于是，我便大胆地将这本小书呈献在读者之前！
二十二页	似乎从不知道自己也不时生病需要治理的精神。	他似乎从不知道休息。
二十四页	这些文章，读起来至今还虎虎有生气，令人浮一大白。	这些文章，读起来至今还虎虎有生气。
五十七页	还涉及世界名人作品，如希腊天才的诸相、泰琦思《昆虫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品《露西亚见闻记》之类的书籍。	还涉及世界名人作品，如法布尔的《昆虫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以及《露西亚见闻记》等书籍。

二、全部删除

十~十一页 他看到了中国人民的不可救药的一面，如卖国政府、正人君子等。

三十一页 他（按：指鲁迅）的面色灰暗，乍一看有似长期吸毒（鸦片烟）的瘾君子。

三十六页（许广平说他鼓励鲁迅多讲演。）如果利用这说话作宣传工具，对党的工作的贡献，一定也不下于你的文章呢。他默许我的话。

四十五页 但相信环境论者早就证明,既然有人起来呼喊,就不寂寞,就有条件的创立。

四十七页 旧社会的措施,和我们今天凭着一种思想: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来正方针政策是不同的。

七十二页 这些年来党和政府的宽大,不但安排了他(按:指周作人)的生活,还让他安静地写作,这不就证明了他对党的不信任和自己的卑劣无耻吗?

七十二页 我们不会有而且唾弃周作人式的只图自己免于劳累,由着别人供我效劳的生活方式,也就痛恶这种生活方式而以为鉴戒,这就是写这回忆所想到的,所要说的话。

一〇〇页 我们党所领导的政策,无处不体贴,实现根据马列主义彻底解放全人类的半数——妇女的……

初版后记

今年七八月间，我利用业余时间写成了这本《许广平传》。后来根据陈翰笙同志的意见，又易名为《许广平的一生》。

早在公元前一世纪，汉代的司马迁就开创了中国传记文学的优良传统。他在撰写人物传记时所表现出来的“秉直笔”的求实精神和倾注于人物身上的鲜明爱憎感情，增强了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力量，感染了广大读者，影响了历代进步史家和传记文学作家。令人遗憾的是，到了现代，国外传记文学日益繁荣，相形之下，我国的传记文学反倒显得贫乏了。对于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我不想在这篇后记中进行详尽的分析，但这种现象的存在，恐怕不少人都会有同感的。从去年以来，我曾先后参加《鲁迅年谱》和《鲁迅日记》（上卷）的注释定稿工作，尝到了中国现代人物传记和人名辞典缺少的苦头。有时仅仅为了注释一个人物的生卒年月，就需要进行大量调访工作，甚至求助于公安部门 and 国外的有关工具书。这就激发了我撰写现代人物传记的愿望，而为许广平作传则是我实践这一心愿的初步尝试。毋庸讳言，在“四人帮”横行的岁月里，传记文学曾经被他们用来作为制造现代迷信、影射比附时事的工具，产生了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这种流毒，至今仍然亟待肃清。但

是，正如泼掉脏水不能将婴儿同时泼掉一样，荡涤“四人帮”在传记文学领域的污秽正是为了使这一文学样式能够得以健康发展，而不是取消传记文学本身。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传记文学的力量和价值首先来源于严格的真实。居里夫人的次女艾美·居里在《居里夫人传》的《导言》中曾说：“我所叙述的事迹，都是我确实知道的，我不曾改换一句重要的言词，也不曾捏造一件衣服的颜色，事情都确曾发生，引用的词句也都的确说过。”美国诗人惠特曼也对准备为他作传的特罗贝说：“有一天你会替我做传记。你要说老实话。无论你怎样写，可是不要替我打扮……我恨许多的传记，因为它们是不真实的。我国许多伟人，都被他们写坏了。上帝造人，但是传记家偏要替上帝修改，这里添一点，那里补一点，再添再补，一直等到大家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了。”我以为这些意见都是极为中肯的。在写作过程中，我也力求体现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我跟许广平同志并无一面之缘，对她毫无感性认识，这就决定了我无力将她的一生描写得更富有文学色彩。撰写这本小书时，我主要依据的是有关文献资料，只有少量素材得之于许广平生前友好的回忆。所以严格说来，这本书更接近于所谓“实录”。这种写法固然缺乏文学传记所特有的艺术魅力，但由于所采用的基本史实均有案可稽，就连生活细节的描写也没有虚构的成分，所以有可能更接近于真实。这就是所谓“有利有弊”吧。对于笔下的人物，我当然持有我个人的认识，在素材的取舍剪裁上，也不能不反映出我自己的倾向性。我觉得，在评价历史人物的问题上，应该允许有不同的看法，即使对于同一历史人物，也可以有各种风格

迥异的传记。史实不容篡改。读者并非“群氓”。历史是一位严峻的裁判员，它将对一切分歧作出公正的结论。

许广平同志曾经谈到，鲁迅的可取之处是在于他的平凡。她要求人们把鲁迅看作一个“道道地地的普通人”，不要“当他是神，是偶像，是化石，对他抱着‘生意眼’的态度。”（参阅《琐谈》、《胡今虚〈鲁迅作品及其他〉读后感》，见《许广平忆鲁迅》）我想，对于许广平同志本人更应该作如是观。当然，许广平同志身上也另有为其他普通人所不及的地方。人们忆念她，是因为她曾经跟鲁迅共同经历了充满风暴和坎坷、流亡和劳苦、诽谤和打击的艰难岁月，人们忆念她，还由于她继承了鲁迅的遗志，赓续了鲁迅的事业，不仅为宣传鲁迅、研究鲁迅、保卫鲁迅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而且积极参加了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在开展妇女运动，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和促进世界人民的文化交流及友好往来等方面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正因为如此，记叙许广平的一生，就不是单纯为了介绍她个人的经历，同时还能以波澜壮阔的现代历史进程为经，以许广平跟她的同时代人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参加的革命斗争为纬，在中国现代史的长卷上织出不可或缺的一角。至于我在写作实践中是否体现了上述意图，那还有待本书的读者来作出评价。

正当我撰写这篇后记时，收到了山西社会科学研究所《晋阳学刊》编辑部的来信，希望我为他们提供一份《传略》，并在其中写出自己在科研过程中碰到的各种问题，以供他人借鉴。这不禁使我为之汗颜。在社会科学战线上，我是一名刚刚出阵的新兵，并没有什么成功的治学经验。如果一定要谈谈自己的体会，那我倒很愿意将郭沫若同志的一句话转赠给有志于在

学术园地上永不疲惫地进行笔耕的人们，并以此自勉，这就是：“一个人总要有些拂逆的遭遇才好，不然是会不知不觉地消沉下去的。”在“四人帮”肆虐的十年浩劫中，学术被亵渎，人才遭蹂躏，哪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心灵上没有留下累累的瘢痕？但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也有不少愿为人民、为人类奋斗终生的学者并没有屈服于环境。他们在昏沉的暗夜里执着地追寻真理的光和热，把燃烧着的写作激情奉献给黎明，为我们树立了楷范。今天，云开雾散，枯木逢春，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东风鼓起了亿万人民生命之舟的风帆。人生能有几回搏？现在的确是全部聪明才智贡献给祖国和人民的时候了。但是，前进的道路并非一马平川。清除多年来流行的轻视知识和轻视知识分子的左倾流毒，还要经过艰巨的斗争。所以，在困难时刻用郭老的教导警策自己，也还是会有获益的，否则就很容易在拂逆之境中垂头丧气，甚至在生活的波涛中没顶。这种前车之鉴也是不少的。

当本书出版之际，我应该感谢宋庆龄先生和陈翰笙先生。由于他们的引荐，我得以请到廖梦醒先生为本书题签。廖梦醒先生是廖仲恺先烈的长女、李少石烈士的夫人，又是许广平的生前友好。她的题签，是对许广平的很好的纪念。我应该感谢唐弢先生。他确实是在百忙之中和身体不适的情况下为本书赶写序言的。唐弢先生对我奖掖提携之处甚多，我将永志不忘。还应该特别提到海婴先生。他不仅亲自为本书作序，而且提供了作为插图的这些珍贵照片。本书附录的《著译年表》是在马蹄疾、高信所编《许广平著译年表》的基础上，新增加了一百余篇，又做了较大修改而后写成的。为该《年表》提供篇目的，

——· 许广平 传

有马新云、陈子善、颜雄诸先生。在写作过程中，还曾得到胡耐秋、常瑞麟老人的指导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

陈漱渝

一九八〇年九月十四日

再版后记

时隔三十年，旧作《许广平的一生》又有了再版的机会，作为作者，我当然是感到欣慰的。巧合的是，本书初版是为了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本书再版又赶上了鲁迅诞生一百三十周年纪念。

作为鲁迅夫人，许广平跟鲁迅的一生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虽然她跟其他历史人物一样，也具有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但这并不影响我对她应有的崇敬。一九九五年，在这本书的基础上，我跟传记作家丁言昭又合作编写了一本《许广平的故事》，作为向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献礼。一九九八年，是许广平诞生一百周年。我联合全国妇联，民进中央等单位，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多功能厅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许嘉璐，全国政协副主席朱光亚、全国妇联原党组书记罗琼及鲁迅亲友等一百二十余位佳宾出席。我还跟同仁刘丽华合编了一本《许广平纪念集》作为纪念。二〇〇八年，我又应民进中央宣传部之约，为民进的机关刊物《民主》撰写了纪念文章：《那火焰般燃烧的木棉——纪念许广平诞生一百一十周年》。三十余年我坚持这样做，既是为了纪念许广平，也是为了纪念鲁迅。

在《许广平的一生》写作过程中，曾经得到了鲁迅亲属的支持，对此我在本书的《初版后记》中已经表示感谢。后来海婴先生跟我在某些问题的看法上产生了分歧，经人推波助澜，友谊出现了裂痕。海婴先生来信，希望我重新回到撰写这本书的立场。现在本书的再版，用事实证明我的基本立场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我没有修正本书中的任何重要观点和史实，仅仅对个别提法进行了润饰，如将“国民党反动派”修订为“国民党当局”或“国民党政府”，以与《鲁迅全集》注释的文风保持一致。对于本书初版之后出现的一些新见解或新史料，在修订过程中采用加注的方式进行说明。

再版本删去了初版本中唐弢和周海婴先生的两篇序言和王永昌先生的一篇回忆，仅仅是因为尚未取得原作者或原作者著作权继承人的授权。又增添了三篇新作：《爱的思索》，《都是〈魔崇〉惹的祸》，《我读〈鲁迅回忆录〉（手稿本）》，以有助于读者了解许广平研究资料的新开掘以及由此引发的争议。新增补的文章史料性和可读性都很强，是对原作的充实和提高。

我撰写这篇《再版后记》的时候，正值农历辛卯年春分之际。往年的此时，南国已经草长莺飞，北国也蓓蕾初绽了。不幸的是，在这个美好的季节，邻国日本却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地震海啸核泄漏，距今整整十天。友人发来短信，说在生死转换的顷刻间，会泯灭是非功过，成败得失，爱恨情仇……回想近十年来因为鲁迅研究观点分歧而导致的恩恩怨怨，以及某些人士力图将我排拒于鲁迅研究、许广平研究大门之外的所作所为，不禁感慨系之。记得唐代诗人杜牧在七绝《题乌江亭》中，

追忆项羽兵败乌江的遭遇，发出了“包羞忍耻是男儿”的感叹。如果参透了上述短信中传达出的禅机顿悟，那还有什么事情是放不下的呢？那还有什么必要发出“包羞忍辱”一类的人生感慨呢？

此次修订再版，书名更改为《许广平传》。

是为跋。

陈漱渝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一

策划编辑：陈志明
责任编辑：银 河
陈志明
特约编辑：林少军
版式设计：陈淑平
封面设计：博凯设计
13910295729

许广平曾经谈到，每当回忆起关于鲁迅的一切，她都深为伤恸，时常被泪水蒙住双眼，以致搁笔。但为了鲁迅研究工作的需要，她仍然压抑住悲痛，为我们写下了《欣慰的纪念》、《关于鲁迅的生活》、《鲁迅回忆录》以及其它一些回忆鲁迅的文章。这些回忆之作表现了鲁迅崇高的革命精神和真挚的人情味，使鲁迅的音容笑貌跃然纸上。

—— 陈漱渝

上架建议 I 传记 · 畅销

ISBN 978-7-5115-0699-3



9 787511 506993 >

定价：38.00元